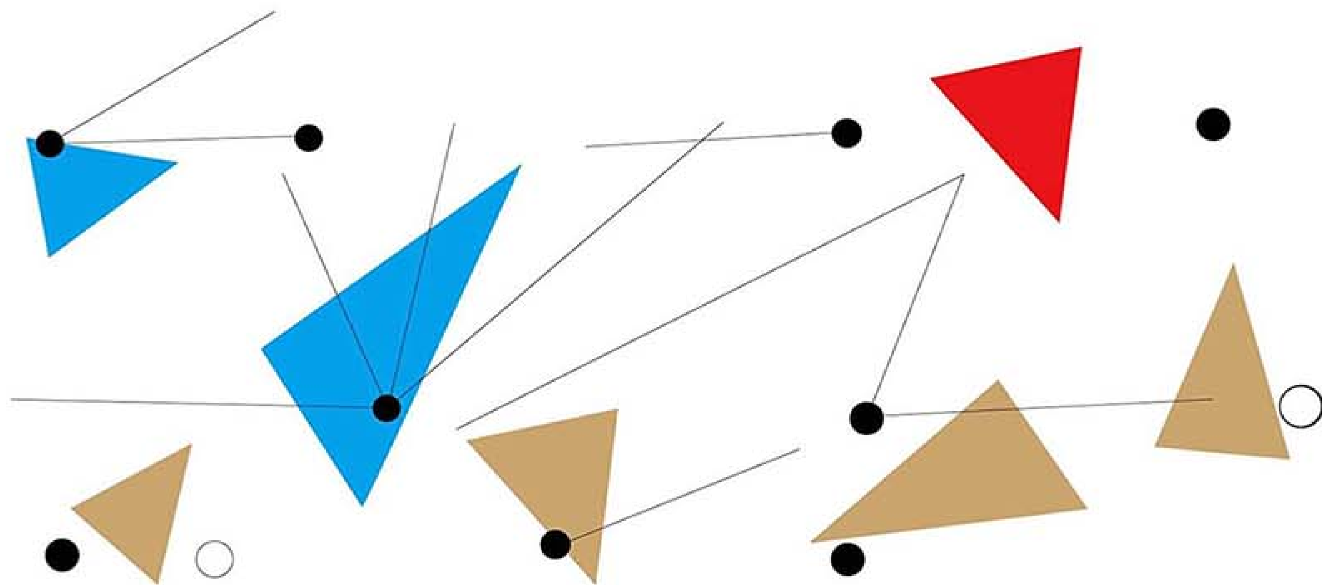


THE END OF NORMAL

正常的终结

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

《出版人周刊》力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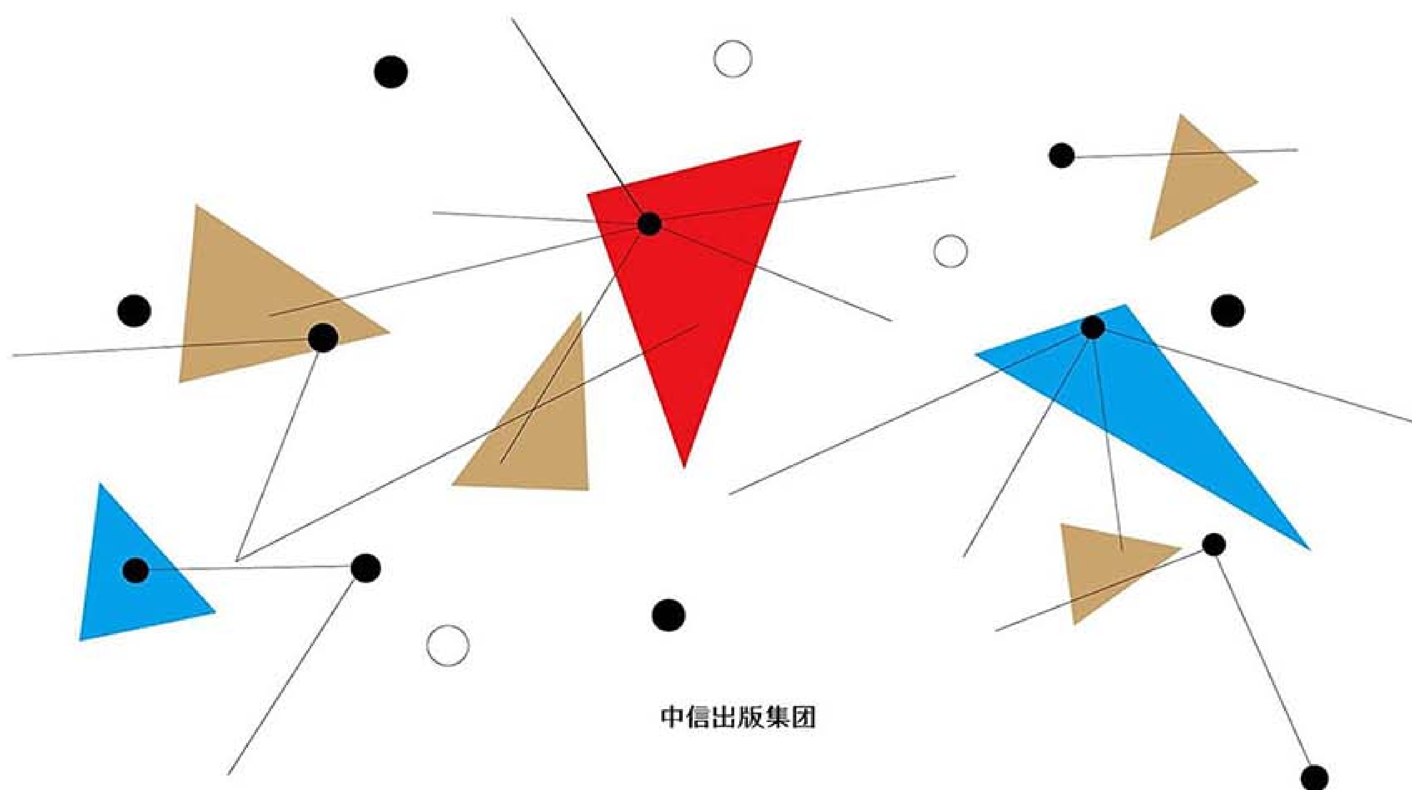
权威经济学家重新反思经济危机

深剖经济发展的历史与未来

[美] 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著

蒋宗强◎译

The Great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Growth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正常的终结：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

作者:[美]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

译者:蒋宗强

ISBN:978750866901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谨以此书献给道格、伊莱、克里斯塔、伊夫和埃玛

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它需要在灾难与逆境之间做出抉择。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序言
争鸣：单一主调的危机解读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今年，我们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而世人对此却感觉迟钝。"但2008年9月那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却没有出现凯恩斯所说的后知后觉，因为当众多金融巨头纷纷倒下，被美国政府收购之际，各路作家和分析人士做出了敏捷的反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20世纪30年代初那场大萧条爆发之后，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所以关于那场大萧条的历史论述很少。到1954年，家父用了一个夏天撰写的薄薄的一卷书最终面世，率先对那场危机进行了分析。现在，对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记者和经济学家们已经撰写了众多相关书籍，政治人物也出版了越来越多的回忆录，还有大量的官方报告，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料。

最早的一波著作，包括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的《我们相信美联储》（*In Fed We Trust*）和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的《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都把目光聚焦于银行高层和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后来，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的《骗子》（*Confidence Men*）和诺姆·沙伊贝尔（Noam Scheiber）的《逃脱艺术家》（*The Escape Artists*）把关注点放在了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出现了很多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包括前任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前特别监察长尼尔·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主要从人和政治角度切入，分析了人们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出的优点和弱点，阐述了危机背后的故事。

这类由个人撰写的政治性的著作通常不会具体地论述那些导致金融灾难的行为方式，而商业记者、一些法学教授和官方调查往往会给出重点论述。对于这些人来说，危机发生的关键在于当时美国的金融实体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的作品有，贝萨尼·麦克莱恩（Bethany MacLean）和约瑟夫·诺塞拉（Joseph Nocera）的《众魔在人间》（*All the Devils Are Here*）、马特·泰比（Matt Taibbi）的《诈骗乌托邦》（*Griftopia*）、凯瑟琳·恩格尔（Kathleen Engle）和帕特里夏·麦科伊（Patricia McCoy）的《次贷病毒》（*The Subprime Virus*）、马克·杰苏里克（Marc Jarsulic）的《金融危机大剖析》（*Anatomy of Financial Crisis*）。然而，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大空头》（*The Big Short*）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不同，描述了一群投机者，他们洞见了美联储和财政部都不曾察觉的市场疯狂，将赌注押在了美国金融机构行将崩溃上。开展官方调查的机构包括菲尔·安吉利德斯（Phil Angelides）领导的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领导的国会督查小组、卡尔·列文（Carl Levin）领导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以及尼尔·巴洛夫斯基领导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检察长办公室。这些调查都有翔实的证据，其中一些描述让人惊骇不已，就像一部恐怖电影一般。然而，它们只是叙述事实，一般没有解释出现这些事实的原因。

举个例子。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对政府和银行过失行为的详细记录，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记录了所发生的问题，但没有解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当然，对于一份政府文件而言，这份报告已经算是写得很好了，但这种报告又有什么意义呢？哪些理论能解释这些事实呢？即便故事叙述得再明确，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更无法有效地构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经济和金融环境。这些事实对于界定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是否遵循了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即便这些事实被完全披露，而且有关职能机构从中吸取了教训（其实并非如此），这份报告本身也不能指导我们如何去弥补损失以及如何不再重蹈覆辙。

这样一来，我们在论述问题时就必须实现一个跨越，从叙述“发生了什么”的阶段跨越到解释“为什么发生”的阶段。这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扮演了一个阐释者的角色，将事实置于某个理论框架之内，让人充分理解事实，必要时也能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借鉴和动力。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缺失的话，个人和商业历史将仍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经济学家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任务，谨小慎微地守卫着他们在这类事情上的话语权，唯恐被其他人乘虚而入。他们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论著，对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这类著作包括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的《黑天鹅》（*The Black Swan*）、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的《断层线》（*Fault Line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自由落体》（*Free Fall*）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现在终结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

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这场危机的原因，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恰恰相反，每位经济学家都提出了有别于其他经济学家的独到观点，这也体现了他们各自在精英云集的经济学家群体中所占的位置。这些不同观点相互竞争，尚无定论，但是饱含激情、政治盟友多和宣传能力强的平台对于宣传一种观点具有重要作用。简洁也至关重要，简单易懂就是力量。推销一条简单的理念要容易得多，但这条理念和其他理念的冲突未必能得到解决。

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出版的著作主要根据不同的主题来解读危机。这些主题包括黑天鹅事件、肥尾效应、经济泡沫、大政府、收入差距以及流动性陷阱。有的只是简单的比喻，有的则理论高深。一些是保守主义的观点，一些则较为自由开放。有些观点和主流经济学术圈一致，有些则标新立异。少数观点纯粹是误导性的、政治性的、机会主义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有些观点也包含一些真实的成

分。但这些作品都存在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很少有人对这些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而且似乎也找不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开展这种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一下这些主题，增进对它们的了解。

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指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能改变之前的一切。从“黑天鹅”的视角去分析金融危机，可能是最简单的一种解释，因为这种观点认为有些事情是不必解释的。如同黑天鹅一样，危机也是稀有的。未能预测一个稀有事件是不幸的，但它并不标志着科学的失败。虽然有的模型无法预测到某个稀有事件的发生，但这并不一定说明这个模型不好。“黑天鹅”观点让我们注意到，即便对于最好的理论框架而言，其预测能力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一些人确实预测到了2008年将要爆发金融危机，但有些人坚持认为“谁都不可能预测到”，这些人或许可以拿“黑天鹅”观点为自己做辩护。根据“黑天鹅”观点，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或许最好的预测就是“没有危机”，那些做出相反预测的人是杞人忧天，而就像一个停顿的钟表一天也会对上两次一样，这类杞人忧天者忽然之间却变成正确的一方了。

用这个特定的观点解释金融危机的一个问题在于，从全球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特别罕见，似乎算不上“黑天鹅”事件。对于美国和德国普通民众而言，全面的金融危机可能是新鲜的，但对于国际投资者和货币投机者而言，却是司空见惯的，不太稳定的国家的人们也将危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仅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统计，我们就能看到多场金融危机，发生地点包括拉丁美洲、非洲、墨西哥、俄罗斯、冰岛、亚洲大部分地区、日本、美国和欧元区。[注]那种认为金融

危机是稀有事件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只能反映出两个事实：一个是金融危机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于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另一个是金融危机发生于富国的频率低于发生在穷国的频率。

肥尾效应

与“黑天鹅”观点不同的是，肥尾效应承认极端事件并不罕见。在金融资产收益风险分布图中，某些金融事件的发生概率很小，为了便于从数学角度加以统计分析，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这种分布模式建立为正态分布模型，或者说高斯分布模型。这样可以了解极端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位于正态分布模型两个端点的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很低。比如，从人类的时间尺度来统计，与平均值偏差“六西格玛”[注]的极端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即便会发生，也是数千年发生一次。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时间围绕着平均值的分布模式很可能不属于高斯分布，危机发生的概率可能比统计学上发生的概率高得多。极端事件发生的频率也高于我们所想的概率。这类极端事件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将非常大，而且这一概率比通常作为分析基础的正态分布概率大得多，易为管理层忽视，形成著名的肥尾效应。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发生的频率是不可能预测的。从本质上看，肥尾效应理论认为人们无法测量这类事件的频率，你只能知道灾难的确会发生，但无法通过正态分布模型计算出它们发生的频率。

然而，在一个充斥着肥尾效应的世界里，一个不能预测危机的模型不一定是错的。无论在什么时候，普通人总是认为事情会一如既往地朝前发展，这也是一个预测模型最常做出的预测。在这个令人不愉快、备感艰难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准备着应对意外事件，我们知道这类事件肯定会发生，但不能实时预测出它们什么时候会发生，甚至无法预测出事情偏离正常模式的方向，即不知道未来是出现

繁荣还是出现萧条。从数学角度来看，肥尾分布模式是很奇怪的、不协调的，同样，在现实世界中，肥尾效应会给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很难预测，常常会导致投机者手足无措，蒙受损失，而那些不得不面对灾难的普通人无异于陷入了地狱。

泡沫论

“泡沫”这个词似乎更具体。泡沫的发生过程近似于一个机械过程。泡沫是一种物理现象。它缓慢膨胀，最后迅速破灭。这是一个重复性的过程。这些特征使得“泡沫”这个术语非常适合描述金融动态。泡沫概念被用来解释危机，并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所以泡沫几乎成了一个理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都使用这个术语，似乎它是一个易于理解的经济学理论，似乎你只需要确定泡沫是否正在形成，就能确切地知道灾难是否会接踵而至。其实并非如此，“泡沫”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一个隐喻，只是在金融灾难史上得到了长期使用，人们才非常熟悉它。

泡沫这个隐喻暗示了一种必然性。泡沫永远在膨胀，一旦一个经济体出现了泡沫，就没有出路了。人们可能会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可以刺破泡沫，让其缓慢地平息下去，或者实现“软着陆”，但这些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泡沫毕竟不是飞行器。

此外，从本质上看，泡沫是脆弱不堪、无足轻重的附带现象。泡沫活动在水面之上，其下面是庞大的水体，一个泡沫破灭之后，处于根本地位的水体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一切又恢复了泡沫形成之前的样子。如果我们对泡沫进行严格的分析，就会发现，泡沫破灭之后，世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糟，跟没有泡沫时一模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奉行的“格林斯潘主义”就很有道理了。格林斯潘认为，政府不应该试图预测、识别、预防或抑制泡

沫，这是因为中央银行不能准确判断资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即便泡沫破灭，并出现严重危机，事后收拾残局的成本也比较低，相比之下，为了挤出泡沫，事先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提高失业率，减少投资，导致较高的成本。格林斯潘这种观点与泡沫的特征是一致的，至少跟人们采用的泡沫隐喻具有一致性。

最后，这个词语暗示了某种天真的意图，因为生活中的泡沫是好玩的，会让孩子着迷，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经济中的泡沫破灭后也可能造成一定的破坏，但从长远来看，这个意象传达了泡沫无害的观点。泡沫不是炮弹或炸弹，当它们膨胀破灭时，不会夺走人的生命。从本质上看，这个隐喻告诉人们，破灭的泡沫留下的烂摊子并不是非常大。

黑天鹅、肥尾和泡沫这三个主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在描述经济体系时，都认为这个系统具有一个正常的、非危机的稳定状态，这种常态会被打破，但打破的时间、方式和程度是无法预测的。从本质上讲，危机是无法预防的，只能事后加以解释，而且针对某一次危机采取的补救措施也无法有效地预防下一次危机。这三个主题都暗含一定的宿命论，在放任自由的监管和一个糟糕状况时有发生的世界之间实现了一定的平衡与协调。它们也强化了一个更加危险的观念，即危机结束之后，之前被视为正常的情形就会自动恢复。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经济体系存在一个常态。这种想象力是根深蒂固的，几乎是潜意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和2010年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12年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内容如下：

> 如果对美国经济的潜在水平做出悲观的解读，那么，失业率仍比正常水平低2个百分点，就业岗位数量比潜在水平少500万个，国内生产总值比潜在水平低了将近1万亿美元。即使美国经济每个月

创造30万个就业岗位，并且增长率达到4%，也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因此，今年就回归到适用于正常水平的政策，仍为时尚早。

请注意，“正常水平”和“潜在水平”这两个词均用了三次。重复使用这两个词标志着萨默斯与其他许多经济学家秉持共同的信念。美国政府的官方经济预测也体现出了这个信念，众多议员和总统也秉持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经济体系天然地趋向于充分生产和高就业率状态。一次冲击或一场危机可能导致经济体系偏离正常状态，如果冲击很严重，那么偏离的程度也可能很严重。但当冲击过去之后，经济就会开始恢复常态，一旦恢复过程开始，就会趋向于完全恢复，除非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某个新的冲击或政策失误。

接下来我要探讨的两个主题——大政府和收入差距——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两个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会偏离常态，但一些具体的、原则上可量化的因素可能会妨碍经济恢复常态。这些因素就是所谓的结构性障碍。这些障碍，从理论上讲，可能会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永久存在。左派与右派都有人认为结构性障碍具有持久性。我从两派中各选一个代表性观点加以分析。一个代表性观点是大政府主义，另一个就是收入差距理论。在每一种情况下，描述一个阻碍经济恢复常态的因素，都是为了理清有关因素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的先后顺序，进而将原因与结果区别开来。这两种观点认为政府机构不应该怀有自满情绪，而应该不断地寻求公共政策的变革。如果你认同这些理论，如果你想追求一些改变，那就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大政府

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应该为这场大危机负责。第一个证据就是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要求银行满足所在社区的信贷需求，包括中低收入社区和借款人的信贷需求，这就迫使银行放松信贷标准，为日后贷款违约和次贷危机埋下隐患。第二个和第三个证据就是政府支持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机构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改组成了私有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但它们还是被称为“政府支持企业”，实际上享有“准国有”的各种特权。它们的主要业务是从抵押贷款公司、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并将部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打包出售给投资者。它们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资金来源，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5.3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美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它们的行为无异于公开为贷款者提供了一种担保，一旦蒙受损失，则由政府承担，结果滋生了“道德风险”（对冒险行为提供了不应有的奖励）以及“逆向选择”（没有资质的借贷者反倒被遴选了出来）。格莱金·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和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在《鲁莽濒危》（*Reckless Endangerment*）一书中就表达了对这种观点的支持。彼得·沃里森（Peter Wallison）在《金融危机调查报告》（*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中表达了异议，他认为：

> ……政府为了增加购置房屋者的人数，一直将资金投向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么在这场泡沫中，非传统抵押贷款在出现之后不久贷款人就会开始违约。然而，由于政府资金或政府担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抵押贷款市场，泡沫越来越严重，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更久，这就延缓了重大违约情况爆发的时间。回顾之前的历次泡沫演变过程，重大违约情况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爆发了，从而结束了泡沫。

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说联邦存款保险和“某些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言论为发放个人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担保，使其认为政府会为坏账埋单，从而鼓励了金融机构发放高风险贷款。如果政府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能够容忍最大银行的倒闭，那么市场的力量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机构将不得不考虑市场风险，在发放贷款时就会谨小慎微，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 Fisher）就公开支持这一观点。

人们可能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也不鄙视它。我们的教科书就讲过这种经济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就会自发地采取高效的做法，带来高效的结果。然而，政府时常会为了实现某个较为宏大的社会目标而干扰企业（有时候私营垄断机构或工会也会干扰企业）。这个理论有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假定了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上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企业通常会为了规避过度风险，将损失降到最低而做出明智的判断。换句话说，企业的判断一般都是明智的。公共政策有可能干扰企业做出明智的判断。在这个观点的背后，暗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政府官僚们像企业领导者那样聪明，他们就会成为企业领导者，而不是成为官僚。

有充分证据表明，政府为了鼓励国内低收入家庭购置房屋而干预了房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政府为了干扰房市而设立的。它们最初的使命在于支持优质抵押贷款，但后来逐渐偏离了初衷，开始资助非传统抵押贷款，结果这些贷款的大面积违约给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带来了灾难。如果你觉得需要更多证据，那么我能举出充分而明确的证据，政府为了促进房市发展而出台了不少法规和其他官方文件。基于这个清楚的理论和明显的事实，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们在起草报告时对政府行为提出了猛烈批评，持有这类批评意见的人

占据了大多数。沃里森在这方面严谨地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但其长篇大论招来了批评和嘲讽。

收入差距

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会导致金融危机的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一个版本可能来自马克思。他认为，资本家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劳动力沦为无产阶级，且机器生产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最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遭受周期性的“价值实现危机”。简而言之，就是商品太多，而购买者太少。收入差距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说消费不足，进而引发危机，结果将是大规模失业，除非资本家发现了外部市场来消化掉他们的产品。马克思以及后来的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都预见到这种迫在眉睫的形势会促使欧洲资产阶级去印度和非洲开创殖民帝国，并迫使日本和中国开放市场。

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初那场大萧条时，很多人经常提到收入差距，比如霍布森（J. A. Hobson）。近年来，家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也时不时地用收入分配方式不合理来解释那场大萧条。要增加社会总需求，就必须给老年群体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设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部分初衷就在于此。当时，一位名叫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的律师写道：“除非足够多的公民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收入，否则国民收入总量必然会惊人地缩小。因此，那些收入较高的美国人的命运与那些收入较低的美国人的命运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后者无法成功，前者也无法成功。”

大萧条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是其中一个原因，低收入者虽然有消费欲望，却无足够的消费能力，导致真实消费需求不足。他们还提出了家庭债务的问题。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爆发之前，家庭债务并非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大多数家

庭都是租房，而且大部分购房者在购置房屋时使用的是现金，不存在住房贷款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人们争论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之前争论的焦点是人们的收入是否足够满足必要的生活需求，而现在争论的焦点则是人们的未来收入是否足够支付非必要的购买行为造成的贷款利息。

制度经济学奠基人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哈佛大学消费理论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都认为收入差距会引发危机。杜森贝里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在他们之后，一些新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和富人阶层的收入差距导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嫉妒，即人们渴望富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很容易想象的，涉及的商品包括跑车、游轮和平板电视等。有些则是以区位因素衡量的，比如居住在空气更清洁、犯罪率更低、学校更好的社区。还有比较重要的涉及个人地位的问题，比如孩子考上了哪所大学。《奢侈热》（*Luxury Fever*）一书的作者、奢侈品经济学研究者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记录了人们的这些渴望。

拉古拉迈·拉詹在《断层线》一书中也提到了这种观点。根据拉詹的论述，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开始于工薪阶层的工资停滞。工资停滞会妨碍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催生沮丧情绪，之后，当他们看到少数人（比如在总人口中仅占1%的顶尖富豪们）的收入迅速增加时，嫉妒情绪就会越来越严重。由于工资停滞，收入不会增加，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便不得不通过借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情况在“二战”之后首次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因为银行愿意为家庭提供贷款，主要形式是住房抵押贷款。这样一来，私人债务和利息就会增加，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人而言，债务负担更重。一旦这类债务无法得到偿还，危机便接踵而至。

持有这类观点的主要是“温和的保守派”（用这个词来形容拉古拉迈·拉詹可能也是合适的）。这种观点与一些左派政治人士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托马斯·帕利（Thomas Palley）就提出了“结构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工薪阶层的工资中位数和家庭收入应该与富人收入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将有利于抑制收入差距，减少人们的贪婪和嫉妒，人们也不会为了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而借债，金融稳定就能得到维护，危机也不会发生。

如同《社区再投资法》、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说法一样，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有些现象似乎为其提供了佐证。第一个证据就是，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去研究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就会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际工资水平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了短暂的增长。第二个证据是，从统计学角度来看，1929年的大萧条爆发之前以及2000年的纳斯达克股灾爆发之前，收入差距都达到了一个峰值。从时间顺序来看，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与金融危机爆发至少存在这种简单的先行后续关系。这种先行后续的关系也存在于其他方面，比如，政府公开宣称要增加购房者人数，一小段时间内甚至将其称为打造“产权社会”，之后，银行便决定向那些收入水平较低、一般不具备贷款资质的人发放住房抵押贷款。

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这种基于时间关系的解释有说服力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不同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必然意味着工薪阶层的收入不会增加，并导致他们因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而产生沮丧情绪吗？其次，即便工薪阶层的收入增加，他们对收入较高者的嫉妒必然会缓解吗？通过举债来提升消费水平的意愿必然会降低吗？

如果读者稍微认真思考一下，就会慎重起来。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必然意味着工薪阶层的工资不增加吗？答案是：不，实际情况未必

如此。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个劳动力队伍。在这个队伍中，每一年，每个工种和每个工龄的工资都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劳动力总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唯一的变化就是劳动者随着工龄的增加，工资水平也会相应增加，每一年都会有所提高，以便反映出他们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工龄变化，也就是资历的变化，直到他们退休的那一天。每年都会有毕业生作为新劳动力加入这个队伍，拿的工资当然也位于最低档，此外，相应数量的老年劳动力也会退休。在这个队伍中，工资中位数永远不会变化，但每个劳动者的工资每年都会有相应的提升，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将整体性的工资中位数停滞与劳动者工资停滞混为一谈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即便工资中位数不变，工资增加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下当劳动力队伍变化的时候，也就是当女性、年轻人、少数族裔和移民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力队伍，而年龄较大的白人男性却因为年龄或产业变化而退出劳动力队伍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由于新参加工作的工人、年轻人、移民和弱势群体拿的工资几乎总是低于工资中位数，整体工资中位数就会随之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低于之前工资中位数的人越来越多，整体工资中位数就会被拉下去。然而，当这些人找到工作，开始工作之后，生活状况肯定比之前没有工作时要改善一些，而且每位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每年都会增加，直到他们因为工厂关闭、工作岗位被转移到海外而失去工作的那一天。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收入的工作岗位，比如普通的、工资低的服务类工作岗位，在整体就业结构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而那些收入高的、有工会保护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所占比例却越来越少。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人会受到冲击，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随着工作年限和工作经验的增加，收入都会相应增加，偶尔还能得到晋升。

用上述图景来描述美国劳动力队伍的变化合理吗？当然合理。在过去40年间，白人男性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1个百分

点，大部分情况都是老年人退休。制造业工人就业的份额已经下降了至少一半。除了白人男性以外，如果你看一看其他族裔和性别的劳动者的工资中位数，就会发现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所增加，而当时包括白人男性在内的整体工资中位数却是停滞不前的。因此，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去相信工人会比其他时期产生更多的沮丧或嫉妒情绪，进而选择举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很多人刚参加工作时，生活境遇的确可能不如之前那几代人刚参加工作时那么好，低收入工作岗位在整个就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的确可能越来越大。但从个体情况来看，这有什么关系呢？工资停滞会不会导致工薪阶层产生嫉妒情绪，并在举债情况下提高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其生活境遇是否能得到改善决定的，而即便起薪较低的人，工资也会越来越高，生活状况也会越来越好。

有人提出如果工薪阶层的工资增加，而不是停滞不前，那么他们就会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到满意，也不会为了攀比消费而背负过多的债务。实际上真是这样吗？虽然工薪阶层的工资在快速增长，但总是远远低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的巨富阶层的收入。促使工薪阶层举债消费的不是工资增长速度，而是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无论是经济形势大好的时期，还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时期，都一直存在，人们对富裕阶层的嫉妒、对更高消费水平的期待以及提前消费的冲动一直存在。为什么“二战”之前不存在背负沉重债务的问题呢？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银行信贷事业的发展。“二战”后，银行开始愿意为个人提供消费信贷，这就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人们举债消费的行为。

然而，很多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却忽略了银行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贫富差距的加剧引发危机”这一观点。这个观点没有认识到银行在危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观点认为无论个人为了什么目的，总是能获得贷款。在这个世界上，富人为穷人提供贷款的情况一直存在，有的人钱多，实际上却用不到那么多钱，而有的人钱少，实际上却需要更多的钱，银行只不过扮演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将钱

从前者转移到了后者手中。因此，虽然贷款会引发一些问题，但一切责任在于信贷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

拉古拉迈·拉詹就持有这种观点。他为银行家开脱责任之后，重点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人对贷款的需求持续上升，并以特殊的视角分析了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间变得如此严重。他认为："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没有重视孩子的营养问题，不重视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再加上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导致了美国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差距。"他进而指出，在一个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上，越是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低，而越是有优势的劳动者，找到的工作收入越高，这种情况就催生了一种"政治性的反应"，即"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均现象，政府采取的是扩大家庭借贷的措施，此举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于是，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就显现了出来，然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层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当作安抚剂。

因此，根据拉詹的论述，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美国人在孩提时代就营养不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公立学校教育也很失败。这些失败主要是政府的失败，这些问题催生了贫富不均，最终促使政府做出了为穷人发放贷款的反应，而这些必然造成"不可避免的账单"。这种看法听起来有些愤世嫉俗，但几乎没有考虑到银行的作用。虽然拉詹声称银行嫌贫爱富，迫于竞争的激烈而扩大贷款，缺乏道德，但银行不必承担责任，只是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

如果实际情况真的像拉詹说的这样，即工资差距的扩大导致了金融危机，那么从逻辑上来讲，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重新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以及调查金融机构失职行为的做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银行只是扮演了被动的角色，而那些中低收入家庭才扮演了主动的角色，

他们的工资水平并不足以支撑他们追求更高的消费，而他们却迫不及待地通过借贷提高消费水平。说到这里，道德风向突然发生了偏转，中低收入家庭成为批判对象，而金融机构却无可指责。保守派对金融危机的解读是，认为公共政策误导了银行决策，银行仍然对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拉詹等人提出的“收入差距引发危机”的观点却为银行开脱了所有罪责，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银行，根本没有提到银行的决策失误。人们不禁会怀疑，与保守派的观点相比，这种观点真的是进步的吗？真的能取代保守派的观点吗？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先暂停对这些单一基调的解读，我们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我建议，我们先看一看父辈们在“二战”后创立的经济学世界。

---

1. 此外，金融危机至少有800年的历史，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斯·罗格夫在其合作完成的著作中有详细阐述。

2. “西格玛”是统计学里的一个单位，表示与平均值的标准偏差，表示每100万次操作中发生多少次失误，西格玛的数值越高，失误率就越低。具体说来，一西格玛＝690 000次失误／百万次操作，六西格玛＝3.4次失误／百万次操作。——译者注

第一部分
乐观主义者的花园

第一章
当前与永恒的经济增长

要明白为什么会爆发举世震惊的重大金融危机，就需要先尝试着探讨一下经济学界领军人物在危机爆发之前多年里的思维方式。当今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都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但有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黎明时期与冷战时期，这种思维方式常见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和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当前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导思想正是发端于那个时代和那些地方。

简单地讲，这些思想引入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并在过去数十年间成功地引导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经济增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永恒的和可预期的，要解决大多数（而非全部）的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和失业问题，经济增长成为必由之路。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经济增长的文化氛围中。如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质疑，则会被视为反主流观念。人们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周期造成的波动。如果政府无法促进增长，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经济偶尔也会下行，现在这种情况经济学家们称为“衰退”，但他们认为，衰退之后，复苏进程便接踵而至，最终恢复长期趋势。这种趋势的特征是经济产出不断增加，就业率长期保持高位。这种状态被视为经济政策应该达到的一个标准。

要看到20世纪60—80年代形成的经济思想的新颖之处，我们就要将其同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描述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区分开，同时将其同人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共同经验区分开。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看来，

社会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实现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增长，而是实现资本的积累或投资。马克思在提及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时，栩栩如生地描述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动力及其追逐财富时的热情。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1920，p.11）中刻画了资本家倾向于积累资本的心理："欧洲在社会和经济上组织起来以便保证最大量的资本积累……这点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合理之处。如果富有的人把他们新的财富用于自己的享受，那么很久以前世界便会发现此种社会体制不可容忍。但是，富有者却像蜜蜂一样储蓄和积累。"

但积累的目标是什么呢？原则上，积累是为了追求利润和权力，甚至是为了生存。资本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积累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也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19世纪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抱很大的希望。"马尔萨斯陷阱"和"工资铁律"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题。这些理论认为，劳动供给的增加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导致工资水平不会长期超越生存水平线，即便资源越来越丰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压榨剩余价值的做法导致工人的工资不会持续增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包括机器的使用，会抑制对劳动力的需求，并压低工资水平。马克思认为：

> 如同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的意义也是降低商品价格，缩短工人花在自己身上的工作日，延长工人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简而言之，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vol. 1，ch. xv，p.351）。

然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凯恩斯指出，虽然提高的速度非常缓慢，但却是事实，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觉得是一个谜。凯恩斯认为，或许可以将这种改善归功于帝国

的扩张和新农业区与矿业的开辟，也就是说体现了殖民地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但在19世纪，经济学理论告诉人们这样的改善只能是暂时的，人口增长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很快将再次压低工资。即便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工资水平最后也会被压得很低，工人将陷入贫困。这种僵化的宿命论并不符合当时欧洲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悲观的科学”，原因就在于此。

后来，到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大萧条。人类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由于石油时代的到来，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大大减弱。尽管发生了这些变革，而且20世纪20年代还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在大多数工业国，平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却有所下降、停滞不前或受到了战时紧急状态的约束。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于英国，并在1929年后蔓延到美国的大萧条似乎预示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积累倾向的终结，不稳定的休战期以及“二战”前那些年间和谐共生的劳资关系似乎也戛然而止，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都面临着危险。

很多人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可以进行必要的积累吗？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一个挑战。这种社会展示了它的军事力量，能够激发穷人的能力，加快工业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计划”是一个新的选择。这个前景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感到万分惊恐，他在1944年指出“计划”和“极权主义”是同一回事。

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几乎统治了一半的世界。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再也不是问题了。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比如大学教育、汽车和房屋，如果拒绝让民众享受这些成果，则会引发非常危险的后果。然而，未来也不能忽视，特别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威胁的存在。在“自由世界”里，谁也不会认为我们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和更大的技术进步。因此，要协调推进物质消费和投资，既能大大增加当前的个人消费，又能提高技术能

力，在未来更好地促进消费。这是经济增长理论面临的一个新挑战，也是其魅力所在，也帮助了那些在冷战中表现活跃的政客们。

黄金岁月

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实现了总体平稳的经济增长，也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40年后，这一时期显得似乎短暂而遥远，但在当时，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达到了成功的巅峰。这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在多场战争中以及在对抗社会主义方面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威胁的存在为当时的政策注入了一定的实用主义元素，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冷战自由主义者获得的权力大大增加，而芝加哥学派，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主张的自由市场理论则被边缘化。几乎没有人认真思考美国能否应对好或是否应该应对社会主义的挑战。美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是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和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拥有众多强大的工业企业，并推动建立了一套崭新的、永久性的、稳定的国际金融架构。这些都是事实，如果有哪位胆大的经济学家敢否定这一点，就有可能重蹈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覆辙，将自己边缘化，并且遭到经济学界同人的孤立。

乐观和自信不仅仅是精英人士的专利，普通民众也具有这些精神。为了让民众保持对社会主义的惧怕，美国需要投入很多资源进行政治宣传。当时的经济形势得到了大幅改善。能源很便宜，食物很便宜，得益于政府的价格扶持政策，牛奶、玉米和小麦等主食供应过剩，利率低，有条件的人可以获得信贷，因此，住房（虽然按照后来的标准来看比较简单）对白人而言是相当便宜了。工会组织的纷纷出现，维护了工人的权利。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工资也随之增加。虽然女性普遍无法找到好工作，但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男性的薪水

足够供养家庭了。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税收也增加了，国家便有可能投入巨资兴建高速公路和建设郊区。儿童健康大有进步，很多疾病得到了遏制，尤其是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风疹、肺结核、维生素缺乏和龋齿等。在许多州，声誉卓著的公立大学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尽管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美国白人工薪阶层比现在穷得多，死于贫穷的概率也比较高，但当时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适合生养孩子，而且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好时代了。从1945年到1962年的17年里出现了婴儿潮，人口迅速增长，享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下，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良好的经济形势以及如何维持下去。之前，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笼罩在大萧条的氛围下，社会弥漫着绝望情绪，如果研究经济增长理论，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但此时此刻，研究这个问题似乎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持续增长所需的条件是什么？在不抑制消费和需求的情况下，可以维持多大的投资规模？在不透支未来的情况下，可以维持多大的消费规模？经济学家的回答是，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口增长、技术变革和储蓄。

这种理论不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而且其创建者们也没有说自己的理论多么深刻。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供的版本中，人口的增长率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人口增长率并非固定不变：当死亡率得到控制之后，人口会增加，之后，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纷纷开始想办法控制生育，人口将会再次下降。1799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理论，认为人口会一直增加，最终迫使工资降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而此时，马尔萨斯则被遗忘了。在如此富裕的世界上，他的理论怎么可能有道理呢？

除了在人口增长率方面做出了重大简化之外，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二个重大简化之处就是认为技术纯粹是科学和发明的产物，当其出现的时候，便会以近乎免费的方式惠及所有人。如此简化之后，经济学家们就不再考虑机械和技术从何而来的问题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新产品和新技术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之类的地方，主要通过资本投资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并受到专利保护。大政府建造了原子弹和核电站，大企业制造了晶体管。政府和企业相互配合，我们才看到了飞机、集成电路和其他技术奇迹。但经济学教科书讲到技术时，只看到个人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对于技术和产品发明过程的促进作用，只是将其归功于瓦特、爱迪生、天才男孩以及喜欢在车库里鼓捣一些小发明的人，即便到了当代也是如此，都是将技术归功于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人。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和大企业实验室的研发工作，这些产品就无从谈起。

由于人口和技术都被视为外部因素，所以经济学家们建立的增长模型只能解决一个变量，即储蓄率（或者说投资率）。如果储蓄率适当，增长模型便认为良好的经济形势会持续下去。增长模型认为稳定的增长趋势是存在的，要维持这种态势，秘诀就是将个人储蓄同资本存量、劳动力增加速度和发展速度匹配起来。储蓄过多的话，经济体将重新出现产能过剩和失业的问题。如果储蓄太少，用于投资的资本就会枯竭，经济就无法增长。但如果储蓄率合适，经济就会实现稳步的、无限期的增长，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会保持稳定。因此，政策的任务只是诱导人们保持正确的储蓄率。要计算出合适的储蓄率，也就是符合“黄金法则”的储蓄率，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也不是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为自己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他们通过设置一系列假设条件，将很多复杂变量排除掉了。因此，计算过程便具备了表面上的可控性，只不过人们对这一点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

美国这样一个在“二战”之后变得非常成功和乐观的国家，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能够实现无限的经济增长，能够无限地改善生活水平，让下一代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领导人也希望自己的民众相信这一点。事实上，这是支撑美国梦的一个前提条件。此外，美国人还认为，这种增长不是依靠特权和权力实现的，而是正确的储蓄、投资行为带来的成果，并不一定要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很多文献都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将工业化进程分为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几个阶段，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这样一个信息：每个人都最终会经历起飞阶段，到达高消费的阶段。那些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和福利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能为民众提供社会主义国家承诺的一切福利，而且能提供更多。

经济学家们发明的增长模型的一个特征是许多因素被略去不提。比如，“生产要素”被简化成了“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只是衡量工作时间的一个尺度，仅仅受到劳动力队伍规模的限制，而且预计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呈现出指数式的增长。经济学语境下的“资本”是一个有争议的要素，在20世纪50年代曾引发激烈辩论。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资本，仅仅指物质资本，即厂房、机械等物质投入，他们从不把人经过学习与训练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视为一种资本。经济学家们认为机械是由劳动力制造出来的，是制造机械所需的劳动力的综合体。正如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那样，如果Y是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力，那么就能得到这样一个方程：

$$Y=f(K,L)。$$

这个简单的方程说明，产出是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投入要素的一个函数。请注意，在这个方程中，资源和资源成本并没有出现。

因此，这就导致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生产”无异于“圣灵感孕说”，因为“生产”只是机械与人手之间的互动，忽略了必不可少的资源投

入。经济学家们，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时认为这种模型仅仅适用于终端产品为服务的经济，比如理发店和按摩店。事实上，这种经济理论是不现实的，但受其影响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不觉得尴尬，深入回顾一下，其传播方式的确算得上一个难解之谜。在物质世界中，如果没有资源，人们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而资源的作用可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被经济学家们的假定掩盖了。经济学家们假定资源可以从环境中免费获取，当不再需要资源时，也可以免费地将其处理掉。资源非常廉价，而且随时可以获取。当经济学家们刚刚发明经济增长理论之际，环境污染问题刚刚进入人们的视线。虽然科学家们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经济学家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在承认资源丰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然后考虑到这个理论可能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一回事，而在完全不考虑资源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土地”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的作用，是一个自古至今都存在的要素，而现在经济学家们的增长模型却忽略了土地及地租，没有提到土地所有者，也没有提到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这种简化导致开明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赞成其他国家开展土地改革，却忽略了本国的那些“外居地主”，而之前愤世嫉俗的经济学家们竟然注意到了这些地主阶层的存在。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结尾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思想，即或许可以对食利者和收租人实施“安乐死”。现在，经济学家们忘记了这些人，经济理论仅仅关注收入在劳资双方之间以及在工资和盈利之间的分配。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政府也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承认政府的作用具有必要性，尤其是在提供国防、教育和交通网络等“公共产品”方面。但由于经济学家们提出增长理论时，大萧条问题已经被治好，至少人们主观上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就没必要在赤字状态下投资于公共工程或增加就业计划了，至少不必为了创造就业岗位而背负赤字。但为了使经济维持在增

长轨道上，财政和货币政策仍然具有必要性，这类政策被称为“微调”或“反周期性政策”。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定一些法规来应对令人苦恼的问题，包括污染、垄断（比如大型钢企操纵价格）等，但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实现经济学家们竞相提出的理想状态，即经济维持平稳增长态势。由此，经济学家们认为，除了满足这些现实需要之外，政府制定的其他法规都是一种负担，会拖累经济，降低经济效率，只有在非常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可以接受政府这么做，但仍然要将其影响削弱到最低程度。

增长模型以两种互补的方式支撑了经济体系。它们描绘了一个稳定增长的世界，也是基本公平的世界。劳动力和资本根据对总产出的贡献获得相应的回报，这就需要做出一个特定的假设，即规模收益是恒定的。这意味着，如果你将所有投入要素的规模增加一倍，总产出也会增加一倍。然而，在真实世界中，“规模收益下降”（在农业领域）和“规模收益增加”（在工业领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通过数学计算就能看出这一点。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其作为特例来对待，这样做并没有多少意义，反而平添了不少麻烦。关于这点，我的老师、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卡尔多（Nicolas Kaldor）是个例外。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虽然基本的经济理论提出了稳定分布模式，但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绝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根据美国、英国的工业发展史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可靠的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在一个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会变得更加严重，但当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掌握权力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就会开始减弱。

这些不切实际的假设竟然成为一套新经济思想体系的基础，真是值得我们关注。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之际，大萧条已经过去快20年了，金融混乱、贫穷、大规模失业，甚至革命的威胁都远去了，世界似乎焕然一新。历史和经济史（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变得无关紧要了，某种用代数知识来点缀的思维方式则取而代之。在一

个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学家们不鼓励民众回首大萧条时期的苦难。虽然大萧条时期的政府与社会弥漫着悲观情绪，但在此时，悲观则被视为一个激进的特质。

其他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似乎还有人讨论的问题也遭到了经济增长模型的忽略，其中一个是垄断权力的作用。当时，市场垄断、买主垄断、寡头垄断等问题的作用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新的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们认为所有价格都是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决定的，不必专门去考虑垄断的特征。不仅凯恩斯的主张遭到了忽略，他的学生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不完全竞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被抛到了一边。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虽然也属于保守派，但他指出技术变化和垄断权力之间存在牢不可破的联系。产业组织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一个特定领域，旨在分析市场支配力量，但其对于政治和政策的影响遭到了增长模型的忽略，却成了博弈理论家们的专业研究领域。

另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却被更加严重地忽略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关键商品的价格以及关键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受到严格控制。这些价格过去、现在都是由政府法令或行业组织制定的，就像受控于“中央规划”一样。最符合这种情况的就是产业工人的工资。在汽车、钢铁、橡胶、铁路和其他关键部门，工人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会组织与资方谈判之后达成的集体合同决定的。服务业的工资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低工资标准决定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也是如此，主要是由政府制定的。所有这些契约为成本结构增添了稳定性，使得企业更加容易做出规划，不然就会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大规划难度。

除了工资水平被基本上固定下来之外，美国石油价格也受到了行业组织的控制。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可能对州内的所有油井实行“配额制”，只发挥出部分产能，限制油井出油的时间，控制石油产量，控

制价格，防止石油价格因突然供给过剩而出现暴跌的情景。这个体系是简单而有效的，税法规定的“资源耗竭补贴”对其提供了一定的扶持，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石油产业，使其具备了在国内进行再投资的能力，它们也的确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这体现了当时美国政府实行的“先消耗美国石油资源”的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削减石油进口量，从而保护美国的国际收支和世界货币体系。但经济学家们发明增长模型时，石油供应量非常充足，不存在石油短缺的问题。由于油价得到了控制，所有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石油的产品的价格便有了一定的可控性与稳定性。美国这种资源价格控制体系非常隐蔽而有效，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考虑它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除了少数领域的专业人士之外，经济学家没有对其开展讨论。

新的增长模型也没有考虑到货币体系，无论是国内货币体系，还是国际货币体系，都被忽略不提。这种模型没有提到银行，没有提到银行贷款、信贷市场、承销或保险等方面的混乱局面，更没有提到“信贷”的本质，即信贷本质上是在一个存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约束有关各方履行金融义务的契约。经济学家们认为，基于信贷合约的金融资产是简单的商品，就像苹果或鱼一样，是可以交易的商品。

之前，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法律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基础角色，但此时经济学家们在构建增长模型时也略而不提了，因为他们假定发达国家实施了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法规，从而确保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发地履行契约，这个公平、高效的履约方式减少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犯罪者将遭到惩罚，只要一曝光，就会给其声誉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因为企业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他们会谨小慎微，避免这样一种灾难。市场压力将会促使人们采取正直的行为。“法律经济学”这个分支学科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这个学科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增长模型认为政府在信贷体系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如果政府预算出现失衡，反而会对信贷体系起到负面影响，因为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源只能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分配，而储蓄的部分可能会被政府拿走，以至于影响未来的投资。这种趋势被称为“挤出效应”。这是公共财政模型的一个内在特征，甚至政府本身的预算预测也存在这一特征。

利率是一个连接现在与未来的参数，增长模型不能忽略它。但关于利率问题，存在多种相互矛盾的理论，而且每一种理论设计得都很精巧，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与利率相关的理论包括资本的边际产出理论、可贷资金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等。在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多种经济增长模型中，主流观点将利率同资本生产率联系在了一起。所谓资本生产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年内）单位资本存量创造的产出，产出越多，投资效率越高。但实际上，资本存量无法准确测量，这就意味着主流的利率模型只是一种停留在教科书里的抽象理论，学生们永远也不可能根据事实来检验这个理论的真实性。

由此可见，在利率问题上，理论是非常复杂的，让人觉得实际情况也很复杂，其实并非如此。五花八门的利率理论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真实情况是比较简单的。事实上，利率是建立在另一种管制价格之上的。这个管制价格就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即“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这个利率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制定的。之前以及现在，该委员会每年平均每六周就会在华盛顿开一次会，讨论货币、信贷等事务。之前，该委员会的操作过程存在一定的神秘性，只和一级交易商买卖政府债券，实现既定的利率目标，但现在这种神秘性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美国的核心利率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现在也是如此。其他利率，比如储户存款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利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核心利率，并受到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对市场施加的影响，同时政府也会加以监管。一般说来，金融法律法规

定，支票账户没有利息，商业银行在存贷款利率方面享有一定的小幅浮动空间。后来，这些法律法规的作用逐渐淡化，消费者面临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被金融市场垄断者主导，利率远高于真实的资金成本。

相似地，国际货币体系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很奇怪，因为经济增长理论刚刚提出的那些年间实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一批经济学家为解决之前多年间失灵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于1945年建立起来的，而且其中很多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者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同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联合国的两个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的。这是两个新建的机构，汇集了许多经济学家。这两个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主要由美国主导，而美国又是现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平衡机制下，各国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并设定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价。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便于美国政府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说到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被政府固定的价格，但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体系不得不忽略主导价格的因素，以防人们如梦初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市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

这时的经济学界完全是一个傻子的花园，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苹果”和一条“蛇”[注]却突然降临这个花园。

这个“苹果”就是所谓的“新经济学”。继凯恩斯主义之后，这种理论再次主张政府有责任促进充分就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凯恩斯的思想已经在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期间得到了检验。大萧条也证明了管理缺失会造成令人无法容忍的后果。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以一种仓皇狼狈的方式证明了至少在极端和紧急情况下，对经济采取管理举措是行得通的。1946年的《就业法案》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道理，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没有任何事情表明这个法案是务实的政策。直到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才开始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那是美国总统首次在和平时期公开宣称经济是一个需要管理的体系。这样一来，他就让政府承担起了管理经济的职责，并且宣布改善经济状况（根据经济增长状况来衡量）是政府的一项永恒职责。

虽然经济增长理论是肯尼迪自己的顾问发明的，但其并没有将政府的作用摆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不过从那时起，政府开始对经济表现负责了。人们再也不必为大萧条忧虑了，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遏制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比大萧条缓和得多。"衰退"一词的内涵是指经济暂时偏离了稳定增长的轨道。为了遏制衰退，政府可以实施减税措施，正如1962年和1964年的减税政策那样。这些做法开创了一个先例，后来，到了罗纳德·里根时期，共和党人也开始循例而行。鉴于人们普遍相信经济萧条、衰退、失业都可以克服，总统必须亲自做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承诺，甚至要为经济政策的失败承担个人责任。1962年，肯尼迪在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学位时发表的演讲就谈到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责任：

> 真正利害攸关的并不是席卷全国的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标签，而是对一个使伟大经济不断前进所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基本讨论……国家利益在于高就业率、稳定增加的产出、稳定的物价和强势的美元。这样的目标说起来简单……要实现（它），我们不仅需要自发响应，还需要苦苦思索。

巧合的是，随着"新经济学"思想的应用，有人基于经验提出了一个名为"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这是肯尼迪总统的两个经济顾问——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在1960年提出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经济管理者似乎需要做出一个权衡。你可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但前提是你必须愿意容忍通胀率也随之升高。总统必须做出取舍抉择，有时候一些外部因素可能会代替总统做出选择。

来到这个花园的“蛇”是越南战争。这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一个事实。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本身不是一件大事，与“二战”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当时，欧洲和日本正在重建，美国逐渐丧失了在国际贸易中的长期盈余地位以及在制造业的世界主导地位，美国的判断力和领导力从来不会遭到质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越南战争使美国出现了更高的通胀率和贸易赤字，其最严重的经济后果是动摇、削弱并最终颠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协定。

赤字和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元失去购买力。美国希望其贸易伙伴持有更多的美元，以期让它们也跟着卷入那场遭到多人强烈反对的战争带来的泥潭。但对于美元享有“过分特权”，欧洲人却怀有严重的不满情绪。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都曾经向美国提出要用美元兑换回黄金的请求，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宪章，他们有权这么做。

在这种压力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不下去了。一旦黄金储备耗尽，美元靠什么来支持呢？为什么美国要让戴高乐和威尔逊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回购诺克斯堡[注]的黄金，而放弃美国的优先任务（比如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对抗亚洲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观察得比较仔细的人已经看到“稳定增长模式”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945年构建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支撑很久了。

---

1. 此处的“蛇”为隐喻，意为对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理论构成挑战，并具有转折意义的新理论和意外事件。——译者注

2. 诺克斯堡是美国国库黄金存放处。——译者注

第二章
长达十年的理论争鸣

1970年，“经济增长理论”的花园闯入了更多的“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满将受到长达10年的挑战。这些挑战成功地推翻了人们之前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即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通胀率来管理商业周期和维持高就业率。然而，重新审视增长理论本身的努力并不成功。长达10年的理论争鸣结束之后，人们对经济增长所做的假定更加根深蒂固，对经济增长所抱的期待也更加坚定。不同的是，在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应该得到控制，而且能够被控制。在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很简单，即政府不能干预经济。无论哪种观点，都无法有效地处理70年代那些给人们带来巨大麻烦的经济事件。

第一条“蛇”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石油峰值论”。1955年，美国地质学家金·哈伯特（King Hubbert）综合考虑了石油产量与发现新油田的情况，认为美国国内大油田基本上在20世纪30年代就勘探出来了。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变化趋势呈现出钟形曲线的形状。他预言美国本土48个州的石油产量可能在1970年达到峰值。结果，他的预言不仅正确，连时间上也预测对了，这是一次地球物理学预测的胜利。

然而，石油峰值论几乎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怎么可能会引起关注呢？要知道，他们的经济增长模型甚至对资源的作用都略而不提。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正忙着关注越南战争的经济后果，石油仅仅

被视为一种普通商品。虽然很难找到完全不需要石油的经济活动，但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经济学家们认为石油生产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们继续固执地坚持不切实际的增长模型，认为一切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政府控制和管理的，没有意识到资源的作用，以至于忽视了石油产出可能达到峰值的细节，但这个细节却意味着油价可能会失去控制。

美国国内石油产出达到峰值并不意味着会出现石油短缺，也不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石油会短缺，仅仅意味着按照传统的开采方法，传统油田的可开采量可能会减少一半左右，之后的产油量会下降。但除了这些传统油田之外，美国还可以用非常规手段从其他地方开采和利用更多的石油，比如阿拉斯加、墨西哥湾海域、中东、墨西哥、委内瑞拉、非洲、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以及深海。美国能够从这些地方获得大量石油。

然而，当美国本土传统油田的产量下降时，美国消耗的石油中，来自海外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美国国内的机构将再也无法完全掌控油价。从外国进口石油，将不得不按照其他国家制定的价格支付，油价必然高出开采成本，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向其他国家支付更多的费用。此外，美国也会损失“租赁收入”[注]。这会影响到全球石油需求量、就业水平、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能力。之后不久，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点。当油价飙升时，西方工业国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促使石油消费国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点转移到了产油国和那些愿意从商业银行大肆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当时，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和美国领导人说在长远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会维持下去。但不久之后，这种预言也被完全抛到了脑后。

第二条“蛇”是经济衰退。1970年爆发的那次经济衰退打破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之前十多年间，从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衰退。它与国内石油峰值没有直接联系，其明显的原因是紧缩政策。随着越南战

争支出减少，财政政策的扩张性逐渐弱化，美国联邦预算在1969年进入盈余状态，这是30年里最后一次出现盈余，之后便进入赤字状态。同时，为应对当时的通货膨胀，利率也提高了。美国央行之所以提高利率，还有一个未经明说的理由，即限制进口，以便稳定贸易逆差，阻止黄金外流（这会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经济产出开始下降，失业率上升。

按照后来的标准看，1970年那次经济衰退并不算严重，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非常痛苦的。某些行业（特别是纺织品）和某些地区（东北）遭到了重创。此外，经济衰退并没有降低通货膨胀，这与菲利普斯曲线是相矛盾的。“新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就是商业周期问题可以得到遏制，实现所谓的“平衡增长”具有现实可能性，商业周期问题导致的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历史，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关系具有负相关性。但此时美国却呈现出高通胀率、高失业率的状态，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进行解释，于是忽然之间就被打上了问号，人们纷纷开始怀疑政府政策的合理性。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怀疑是不可接受的。在选民的心中，“新经济学”已经站稳了脚跟。根据“新经济学”的观点，经济衰退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出现经济问题，那么根源在于政策失误，尼克松总统本人也认同这一点，认为总统必须行使经济管理的权力，而行使权力，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当经济状况不良时，就可归咎于总统的失职，惩罚总统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因此，在尼克松任期内经济形势恶化，可以说是尼克松的责任，当时，人们的确也是这么想的。1970年，由于经济形势无法满足民众的新标准，无法让民众满意，尼克松总统面临连任失败的风险，这是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那该怎么做呢？当时显然没有出现战时紧急状态，但尼克松采取了一套之前适用于战时紧急状态的解决方案。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

宣布了一系列改善收支状况的措施，在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协助下，实行大幅削减利率的政策。他还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这一举动尤其鲜明地反映了“二战”期间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他还单方面宣布公开放弃金本位，结束了美元对黄金的固定兑换，使美元汇率在外汇市场上自由浮动，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削减对于大豆和其他对价格敏感作物的出口控制措施。通过这些方法，他为机械和其他制成品出口量的大幅提升奠定了基础，并将一批先进武器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盟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盟友里面包括伊朗王国。1972年初，尼克松还让国会增加社会保障福利。在竞选活动拉开帷幕之前，这些措施开始对尼克松产生有利的政治影响。

总体来看，这一系列举措在短时间内便奏效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双双复苏，通货膨胀受到了控制，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这有利于帮助尼克松实现狭隘的政治目标，但导致西方国家股价普遍下跌，严重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加剧了国际经济、金融的动荡。尼克松的举动告诉世界，在美国，政治是第一位的，尽管美国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但国内政治更加重要，为了实现国内的政治目标，可以忽视他国的利益诉求。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此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开始加速，欧元市场开始形成。对日本来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迫使其必须采取一套新的安全策略，后来对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巴西腹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石油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便意味着美国以外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调，低于正常情况。这激怒了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

从原则上来讲，石油公司遭遇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油价来解决，但它们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得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那样的垄断组织去操控世界油价。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赎罪日”这天突然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即“赎罪日战争”，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此为契机，采取了报复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制定了一个新的价格，是之前油价的四倍。在实行过程中，

首先实施禁运，然后实行生产配额制，导致了世界性的石油短缺，很多国家纷纷囤积石油，进一步推高了油价。美国人第一次尝到了依赖进口石油的滋味，这个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经济学家们将这一事件称为“石油冲击”。这个词表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只是遭遇了暂时的创伤，而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冲击是一种糟糕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这次石油价格的上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将这次冲击归因于1973年的阿以战争，而不是石油供需对比的变化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因此，他们预测这次只是暂时的冲击，很快就会过去。经济学界在分析石油输出国组织时主要考虑垄断组织运作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并普遍预测遭到操控的油价最后会崩溃。最后，在美国政策的强力冲击下，油价确实崩溃了，经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就业率回升，经济再次恢复增长。

很快，“石油是一种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商品”的概念逐渐弱化。经济赖以运行的资源基础正在发生着一种潜在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并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这点。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如何让经济恢复增长，并维持增长态势，这一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当时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现象，他们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释。政客们和公众注意到高通胀与高失业率长期并存，即我们所谓的“滞胀”，而且经济增长的趋势受到了诸多新因素的冲击，这些因素包括贸易逆差以及浮动汇率机制下的美元贬值。美国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这是无法逃避的，必须想方设法加以应对。

鉴于这种现实，20世纪70年代那10年间，经济学界出现了激烈的理论争鸣。在之前的60年代，凯恩斯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着高地，但现在这种主导地位却遭到了不

同思想的挑战，其中包括左派的干预思想和右派的放任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讲，当时出现了四个应对思路，而在20世纪70年代，其中三个得到了落实，只不过落实时间较短，而且也不是全面落实。

第一个思路是美国可以让美元贬值，通过收入调整政策来抑制工资增长，提高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扩大出口，通过关税、配额、创新和勤劳来弥补进口增加导致的经济损失。这是18世纪以来著名的重商主义战略。19世纪的德国、美国以及1945年之后的日本都曾经实行过这个战略。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另外一个石油进口大国——中国也实行了这个战略。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即尼克松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具有重商主义战略的元素，包括货币贬值和工资控制，但这个政策要长期实行下去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套战略与美国已经达到的生活标准、工人认为正常的工资制度和自由贸易是不协调的，与美国金融部门日益强大的权力和地位也是不协调的，而且金融部门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一些约束性监管措施早已不满。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一书中将这套政策称为"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民主、共和两党参与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无论是出于政治考量，还是出于意识形态考量，都强烈反对这套政策。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于1974年下台之后，这套战略戛然而止。但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然有很多人拥护和坚持这套战略，包括民主党的一些左派人士。即便到了里根时代，一些官员也是这套战略的支持者，其中尤其明显的是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他在20世纪80年代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来自日本的经济威胁。

第二个思路是将其他产油国同美国捆绑在一起，接受它们的高油价，然后通过军售和私人商业贷款实现美元回流。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时期和福特时期大力推动这一战略，得到了美国石油行业和金融业的支持。实施手段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缔结联盟和伙伴关系，而不

是强化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但这套战略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1979年，伊朗革命的爆发对其造成了沉重打击，后来，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不可靠性也给这套战略造成重创。为了对产油国直接实施干预，美国在安哥拉和其他国家发动了秘密战争，但之后这种直接干预的信心趋于弱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之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才得到巩固，干预他国的信心也恢复了。许多精英人士一度认为，美国这种超级大国地位至少能再维持15年。

第三个思路是美国可以通过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减少石油进口量。美国可以削减石油消耗量，用其他能源（尤其是核能）来替代石油，选用其他交通方式，通过税收杠杆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尽量在减少碳氢化合物消耗量的前提下维持良好的生活标准。由于欧洲卷入的军事行动较少，且亚洲的日渐崛起迫使欧洲提高自身发展战略的竞争力，所以，欧洲国家更加倾向于支持这套战略。核能、公共交通、紧凑型城市在欧洲越来越多，但欧洲也不顾美国的反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越来越多。在美国，卡特总统最初也推荐了这套战略，但由于多重政治因素的影响，再加上游说集团的反对力量非常强大，又赶上了1979年的三哩岛核事故，后来这套战略没有得到落实。

但美国毕竟是美国，它还有第四个思路。这就是想方设法在不真正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就得到石油。也就是说，美国制定一套体系，以美元作为石油的计价货币。美国进口石油时可以先不支付现金，形成以美元计价的债务，通过国内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美元价值，进而直接影响甚至操纵国际油价。也就是说，美国只是用信用卡去购买石油，却一直推迟支付，或者说从来不还信用卡债务。当然，这种解决方案从各个政治派别的立场来看，都是非常理想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就变成了主导性的解决方案，这是里根时代的秘密。

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位美国总统一直着力解决能源、资源、竞争力和美元的问题，但最后都没有解决好。尼克松于1971年打破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又于1973年实行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机制，导致20世纪70年代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美国国内物价攀升，实际工资停滞，通胀引发了长期忧虑。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而于1974年到1975年提高了利率，结果引发了一场深度衰退，福特总统也为此丢掉了总统宝座。事实证明，尼克松打造的联盟体系也是不稳定的。武器出口市场虽然繁荣，但军售收入无法抵消进口石油导致的美元流失。石油美元的回流主要是流向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足以支撑美国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卡特总统试图通过能源政策减少石油进口，鼓励研发替代能源，以期降低美国人对石油的依赖性。但卡特的能源政策收效甚微，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贸易逆差、美元贬值和通胀上升的局面。每一个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之后都会面临这些传统的局限性。在任期后期，卡特实行了一套以预算紧缩、提高利率和控制信贷为特征的改革方案，却导致美国于1980年出现了一次看似短暂、政治后果却十分严重的经济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讲，卡特本人也是“新经济学”理论的牺牲品，因为这套理论为政治人物的经济才能设定了很高的标准，要求他们必须实现令人满意的经济表现。

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石油市场震荡催生了错综复杂的经济政策，而“新经济学”理论又未能提出妥善的解释和对策，因此，这套理论注定走到了尽头。在学术界，那种认为“政府可以在不引发严重通胀的情况下降低失业率”的观点变得声名狼藉。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鉴于资源成本的极度动荡，经济体面临的通胀风险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们所想的要大得多，而这些凯恩斯主义者们当时却忽略了资源对经济的影响。但如果通胀风险仅仅是由经济体系以外的“冲击”造成的，那么通胀未必会给凯恩斯主义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冲击”本质上具有不可预期性和短暂性。只要将这些“冲击”归咎于阿拉伯国家的酋长们，就能为糟糕的经济政策开脱罪责。

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凯恩斯主义者为了挽救自身声誉，纷纷将通胀归咎于石油输出国组织。但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机会，他们希望抓住这个机遇，彻底埋葬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他们需要从国内政策的角度重新解释通胀，将其归咎于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决策者的失误。

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亦称“芝加哥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货币学派宣称无论在任何地方，通胀往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有在央行决策失误的情况下，通胀才会发生，不然永远不会发生通胀，因此，通胀可以归咎于政府。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胀是国家公共政策，尤其是央行货币政策引发的结果，而且央行完全可以控制住通胀。另一方面，货币学派还对失业现象进行了重新解读，宣称失业并非市场失灵导致的，而是市场驱动的现象，劳动力的供需对比会导致失业率达到一个“自然值”，这个“自然值”就是“自然失业率”[注]。当时，经济学家们普遍估计自然失业率在7%左右。央行的货币政策失误容易引发通胀，从而促使失业率趋向于自然失业率。这样一来，芝加哥经济学派就创立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政府只对通胀负责，而不对失业负责。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浪潮已经退去，“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饱受批评的术语。同样，长远来看，“欧佩克”（OPEC）这个缩略词可能也会沦落到如此境地，经济学家们可能某一天再也不会提到了。

奇怪的是，这些对经济管理思想的攻击并没有损害人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相反，这些攻击为一套研究经济波动的新理论打开了大门，这个新理论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因素，例如内燃机、计算机等技术进步的冲击，而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不是

政府的公共政策，政府无法控制经济体系以外的因素的上升和衰退，但只要储蓄率适当，长期增长态势是毋庸置疑的。凯恩斯学派通过干预措施来推动经济增长或抑制经济周期，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弊大于利。真正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物价是否稳定（这由美联储负责）以及政府是否让市场自由运行。

这个时期，另外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就是“供给学派”。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应该以税收政策为杠杆，刺激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将税负从储蓄环节转移到消费环节。很多公共财政方面的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税收，除了人均直接税（人头税）之外，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在涉及税收政策时，要使税收政策尽量接近于现代版的人头税，以便将税收政策对私人储蓄决策的干扰作用降到最低。这批经济学家们大概忘记了一个事实，即在历史上，真实的人头税的作用是为了阻止美国南部贫穷的黑人参与投票，而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储蓄。今天，“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以及很多类似的反对政府调控的组织都把这套注重税收激励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们支持自由市场，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纯粹是人们储蓄的结果，而税收政策和政府监管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引发资源错配，因此大力反对增税，认为高税收会打击储蓄和投资意愿，减少就业机会，导致经济状况变差。

如同20世纪50年代那些过度简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一样，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忽视了资源与资源成本的问题。这就导致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系统分析师或运筹研究者之间存在一个深刻的分歧。对于那些在物理学或工程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而言，“系统”的本质是不同的物质、工具和能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研究范围涵盖了所有相关因素，而经济学则采取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忽视了诸多物质因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而过度注重市场心理的

研究，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主要参数是“可信度”、“信心”、“期望”和“激励”，这个学科最终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们的“行为”。但那些接受工程学训练的人却不能轻易地忽略众多的力量和物质。

早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冲击”之前，就有一些人对当时那些假定资源免费、规模效益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型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理论模型不可能正确。1970年，罗马俱乐部召集了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计划专家在位于罗马的林西学会（Lincean Academy）召开会议，探讨资源枯竭以及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这批人的研究成果就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该书是关于人类发展困境的报告，非常有名，影响力很大，但论证简单，存在一些缺陷，容易遭到反驳，招致了很多非议。[注]该书的观点是，如果一种资源的价格是固定的，供应最终会下降，成本会上升，最终将会出现没有资源可用的情况。罗马俱乐部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支持他们这种观点。事实上，他们无异于提出了一个不太令人惊讶的观点，即当一个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的经济体遭遇一个固定障碍时，肯定要发生碰撞而出现滞胀。在计算机上模拟经济增长过程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作，但终归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这个计算机模拟过程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预先提出了诸多假定，为计算机程序预设了诸多条件，从而得出了他们那个可怕的结果。

但经济学家们不理会这些挑战，在经济模型中继续忽视资源的作用，假定资源的供给是不会枯竭的，并且认为那些利用计算机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忘记了新储备、新技术和资源替代的力量。回眸历史，在人类能源消费结构从木材、水力过渡到煤炭，从煤炭过渡到石油，最后从石油过渡到核能和天然气的过程中，发现新资源、发明新技术以及能源替代往往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上充斥着大量关于资源耗尽的预言，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应验。因此，经济学家们断言这类预测永远不会成真。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们通过历

史归纳得出的结论的确占据着上风，而罗马俱乐部通过计算机模拟过程得出的结论则没有应验。在经济推理方面，像这种历史推理压倒计算机模拟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增长的极限》的论断被推翻了，而且直到今天，如果经济学家希望破除人们对于资源耗尽的恐惧和谣言，仍然可以把这本书的观点拿来作为批判对象。

因此，当卡特总统的能源战略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远去，经济学家们在忽视资源作用的情况下提出经济增长理论将会继续主导30年。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经济能否实现持续、无限的增长，要看政府是否会通过监管措施来发挥阻碍作用。对于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经济理论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然科学家认识到了获取物质资源的成本将会上升，最终还存在气候变化的威胁，这些会给经济增长施加诸多局限，因此，他们感到惊慌和焦虑。经济学家与那些研究能源、生态、气候及物理系统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一向都不是很容易，目前，只有在少数专门提倡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地方，比如美国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可以就一些复杂的理论进行反复探讨，但除了这些地方之外，这种沟通已经完全中断了。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资源成本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但经济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仍然没有恢复这样的交流。“环境经济学家”的确也存在，但他们只是经济学界内部一个很小的群体，并没有控制大量的学术资源（尤其是人事任命权），在经济政策讨论过程中很少发出声音。研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学家并不参与关于金融事务或宏观经济表现的讨论。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在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即便那些崇尚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仍然宣传20世纪50年代经济理论的“灵丹妙药”。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只要政府监管部门不采取扭曲的监管政策，技术创新和私人储蓄仍然是通向繁荣未来的必由之路。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仍然觉得“资源成本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关联性”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一方面，资源价格高涨会直接影响经济运行，另一方面，资源价格高涨会诱发市场动荡、金融投机和投资不确定性，从而间接影响经济运行，而且这种间接影响比直接影响还要大。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再次思考我们的经济是否肯定能恢复持续增长状态。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去了30多年，犹如梦幻一般。那10年可能不是外部冲击、管理不善和政策失误诱发的短暂插曲，相反，从某些方面来看，那10年反而预示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经济局面。我们或将无法轻易地摆脱当前这种局面。

---

1. 此处的租赁收入指油田、矿产持有者出售特定时间内的采油权、采矿权而获得的收入。——译者注

2. 自然失业率，指充分就业下的失业率，是一个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也是劳动市场处于供求稳定状态的失业率。——译者注

3. 这份报告招致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预言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并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引发了世界性的大辩论。——译者注

第三章
大幻觉

1979年8月，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开始了强势美元时代。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这两个人将恢复美国权力，维护广泛意义上的美国生活方式，奠定美国到20世纪末的经济扩张道路。1981年1月出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的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二人指责我不遗余力地给他们制造障碍和干扰。如同许多民主党左派人士一样，我也同情工人、工会和制造业的利益，怀疑当时的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自由市场魔咒。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接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产系统的物质基础，我不懂沃尔克与里根的政策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和公共关系的烟幕，沃尔克所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他将美国仍然能够控制的一个战略性价格（即世界利率）作为武器，去控制美国无法控制的一种战略性商品（即石油）的价格。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负债状态，主要债主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因此，世界大多数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容易受到利率武器的攻击。两个明显例外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刻意规避了商业银行债务。但在1980年之前，这两个庞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算不上重要力量。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将会改变。

在高利率的压力下，通过贸易加权汇率来衡量的美元实际价值上升了60%。高利率导致那些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长达20年的萧条，致使它们无力参与对世界资源的争夺。国际经济的不平等迅速

加剧。债务国的反应就是商品倾销，而这进一步使得富裕国家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买物质资源。

高利率、强势美元和资本流入解除了美国进口面临的限制。因此，里根政府实行了减税和增加军事开支的改革方案，无论石油价格和贸易赤字达到什么程度，美国经济都恢复了增长态势。最后，甚至石油垄断组织也无法承受全球经济萧条和两伊战争的压力，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石油这一最关键的资源再次以低廉的价格流向了北半球的富裕国家。几年后，债务压力、高利率、世界能源价格长期保持低位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加速了当时的能源供应大国——苏联的崩溃。苏联崩溃后，其内部对钢铁、镍、天然气、石油等其他许多资源的需求也出现了暴跌，不得不寻找买家，以至于进一步压低了资源价格。

之后，出现了新的商品供应国，满足了美国对轻工业品的需求。首先是墨西哥。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成为美国轻工业品的主要进口国，但这种状况很快就结束了。墨西哥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启动边境工业化计划，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5年初生效之际，墨西哥已经经历了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轻工业品供应国。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情况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规模、财政独立性、政府能力和国内优先原则，向美国市场提供轻工业品的作用逐渐下降，首要供应国的地位被中国替代。此时，除了大宗商品过剩之外，消费品供应量也十分巨大，而且质量不断提高，价格一直没有攀升。之后，美国也开始将计算机编程、后勤辅助活动、呼叫中心等服务业外包给了讲英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消费品与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低成本使得美国再也没有遭遇通货膨胀的威胁。

这是美国央行的银行家们能够引以为豪的一大功绩。他们打破了美国国内外操纵商品价格的力量，打开了全球化的大门。但如果要承

认这个成功，就意味着这些银行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便无事可做了，因为到这个时候，他们似乎已经完成了消除通胀的任务，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没有出现通胀，该做的都做完了，人们相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样一来他们就无事可做了。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宣称这一成功是暂时的、短暂的，要维持这一成功，就需要持之以恒地保持警惕，以免某个神秘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件再度点燃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的经济学家们纷纷表示赞同这种观点。当时，经济学家们刚刚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到人们的心理预期上。货币学派宣称的警惕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持续了一年又一年。艾伦·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动荡的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一书中承认通胀的终结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苏联的崩溃和中国的崛起。对于一位央行行长而言，承认这一点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作为美联储主席，他这种说法等于承认其任期内物价长期稳定的功劳并不能归功于他。我不清楚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里根减税、日益增长的军事预算和坚挺的美元恢复了美国的国民消费能力，投资和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种令人苦恼的经济衰退阴影中得到了恢复。世界其他国家由于早已失去了从美国回购黄金的权利，不得不继续持有美元，或者更准确地说，持有美国国库券和债券。中国最终成为最大的持有者。这样一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与每年的赤字只是增加了外债。大量进口商品有助于维持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抑制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生产率也恢复了增长。美国劳动者的愤怒越来越少，几乎完全不存在了，美国民众对共和党充满感激，共和党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握着总统大权，这令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感到沮丧。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信心也恢复了。20世纪70年代成了一段糟糕的回忆，但会逐渐淡化。

有一点需要注意。当前，美国生活方式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工资和个人收入的增长，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人、家庭和企业借贷的增加。每个家庭拥有更多收入的同时，也会背负更多的债务。里根和沃尔克完成了从多边化、结构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向浮动的、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过渡，而且新体系的核心仍然是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这个过渡过程非常成功。美国国库券事实上成为整个世界的一种储备资产。但与此同时，只要美国家庭愿意不断借贷（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且美国就业形势不断好转，那么美国家庭将继续成为世界范围内需求增长的动力之源。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通过金融化实现更好的生活。

1991年，这个新秩序遭遇了一个明显的威胁，但很快威胁就解除了。当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指责科威特偷采伊拉克石油，大举入侵科威特。虽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一举动损害了美国利益，但这冒犯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秩序。老布什总统发动了持续42天的海湾战争（地面战争仅用了100个小时），重新宣示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主导地位，好像越南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就这样，老布什完成了从里根时期就开始存在的夙愿。

最终，克林顿继承了一个显然十分理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一个军事大国，美国的金融业雄踞全球之首。这两个条件组合在一起才真正构成了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内繁荣的基础。国际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股市欣欣向荣，新技术投资规模庞大，使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首次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连续三年降至4%以下，而且通胀形势并没有加剧。在税收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联邦预算意外地出现了盈余。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成为一个类似于民族英雄的人物：一方面，当很多经济学家声称将会出现严重通胀时，他让经济繁荣局面维系了下去；另一方面，他根据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预测不会发生通胀，赢得了人们的赞誉。

鉴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挑战和争议，在大多数普通美国人看来，“新经济时代”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神奇的。[注]虽然美国很多地方的工厂大量倒闭，工会解散，很多产业要么转移到海外，要么在外国企业竞争压力下倒闭，很多曾经繁荣的工业腹地陷入深度衰退，有些工业区甚至成为荒芜之地，但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日常生活水平总体上并没有降低（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降低过一段时间，但到90年代末又迈上了新的水平）。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降到了历史新低，食品和能源超级廉价，人们可以在随处可见的折扣店里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服装、鞋子和电子产品。当然，这些廉价商品主要来自亚洲。随着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光纤通信技术蓬勃发展，通信成本大幅降低。在联邦政府支持的信贷计划的作用下，购房者人数不断上升。股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多数美国人过上了非常美好的生活。

随着20世纪以这种高昂、幸福的基调走向尾声，经济学家们在思考什么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只是坦然接受新闻描述的情景。形势看起来很好，因此他们也乐于接受。20世纪70年代的风暴没有留下永久的痕迹。这些经济学家们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传统主义下接受的教育，因此，对于此时的大好形势，他们只能顺应形势地说——好政策、好运气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好结果，不然他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甚至创造了一种经济上的“新范式”。“新范式”是艾伦·格林斯潘很喜欢用的一个词，用老式的术语解释，就是说生产率已经恢复了增长（原因总是略超出理解），美国已经满足了踏上“稳定增长道路”的条件。2001年，两位曾在20世纪90年代供职于政府部门的著名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与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联合出版了《令人惊艳的十年》（*The Fabulous Decade*）一书。这本书里提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围绕着功劳分配问题的争

端：里根大力改革，其继任者克林顿坐享改革成果，那么，经济奇迹应该归功于谁呢？这不应该有太多的争论，因为两者似乎都有功劳。

回首20世纪80年代，不难发现那10年间，很多人展现出了英雄般的眼光。沃尔克在里根的支持下纠正了货币体系的方向，恢复了美联储的公信力，消除了通胀。这些明智的政策纠正了20世纪70年代的错误和野心，让尼克松、福特、卡特、阿瑟·伯恩斯和威廉·米勒等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显得相形见绌，承受了猛烈批评，并且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充分就业的原因并不是信贷繁荣或任何引人注目的公共政策干预。只是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经济体的各个方面恢复了平衡。然而，在石油垄断组织造成石油冲击之后，运气不会反复出现。与此同时，在主流的观点中，正是得益于美联储的监管和警惕，通胀预期才不至于再次显现，进而导致长期利率下降。人们再一次假定经济能够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稳定增长。在2005年的一篇回顾艾伦·格林斯潘长期供职于美联储的论文中，前文提到的经济学家阿兰·布林德和里卡多·赖斯（Ricardo Reis）提出了一个问题：格林斯潘是历史上最优秀的美联储主席，还是最幸运的美联储主席？他们回答道："都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格林斯潘开始出任美联储主席，同时，世界经济也进入了"大缓和"的传奇时代。经济学家不是第一次将好消息转换为道德寓言。在经济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一直在竭力修正美国的主流经济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摇旗呐喊，实际上也是为他们自己呐喊，并且提出低失业率和高通胀之间的微妙权衡是可以容忍的。在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主义者，即那个时代激进的保守人士，将1980年后经济稳定增长归功于不干涉主义者负责任的财政姿态以及着力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2003年，来自芝加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几十年。"这

一评论出奇地类似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30年前的评论：“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大缓和”一词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本·伯南克。2002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被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4年2月，伯南克在美国东部经济协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列举了“大缓和”时代已经来临的证据，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即“经济结构变化”、“政策改善”和“好运气”。伯南克的言论值得认真审视，因为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主流经济学家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那些年的看法。

根据伯南克的定义，经济结构变化可能包括企业库存管理方式的改善，这种改善因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他还提到了其他可能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金融市场日益发达，政府对多个行业放松管制，美国经济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更加自由等。他认为，这些因素增加了宏观经济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他只是表示这些因素可能属于结构性变化，却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也没有说哪个因素非常重要。有点奇怪的是，他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好运气”。他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如果突出运气的作用，政策的重要性则会降低。因此，伯南克重点论述了剩下的那个因素，即“政策改善”。在开始论述时，他采用了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惯用手法，即开门见山地引用一下其他经济学家对他要讲的内容的普遍赞同。他说：

>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总产出和通胀率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货币政策表现很差的时期……很少有人会否认货币政策在稳定通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总产出和通胀率的波动性同时下降的事实表明货币政策或有助于缓和产出的波动性。

这段讲话似乎告诉我们，经济学家们怎么说，事情就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解读伯南克在这段话里表达的观点：如果央行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胀，那么经济体在外部冲击面前也更有可能维持更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伯南克表示，随着通胀率的降低，经济的动态性将会改变，可能会变得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此外，他还认为，发生石油价格上涨等“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将会降低，因为这些问题其实是经济体系的内部问题，而非外部问题。因此，他写道：“20世纪70年代，名义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是因为之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并非真正是由外部的政治或经济事件引起的。”

这句话透露出来的思维方式非常值得关注。这句话接近于历史事实，但伯南克没有进行详细探讨。比如，我们无法准确地得知伯南克所说的“之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越南战争，还是指1972年尼克松连任竞选？或许二者都有可能。人们觉得可能有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能源供给的变化（国内石油峰值）或世界权力对比变化（苏联崩溃、中国崛起）都没有得到探讨。这些因素既有助于缔造过去的辉煌，也有可能造成令人忧虑的未来。前面提到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政府对多个行业与部门放松管制，是自由市场理论首先倡导的政策变革，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伯南克的探讨仅仅局限于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并仔细地区分了经济模型的结果与外部事件。他先是提到了一些有利于达到论述目标的政策主题，比如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自由贸易，为整个讨论设定范围，然后通过逆向归纳方法，根据改善的结果推导出理想的结论，即政策的改善导致了结果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略了其他一些具有替代性的因素。

结果如何呢？又回到了基本的增长理论！只要有好政策，没有冲击，经济持续增长就有可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的就是实现正确的储蓄率。资源、环境、法治、国际金融结构等因素都忽略不计

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像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那样维持长期增长态势应该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困难的。

在这个世界上，危机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除了一些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不可预见的因素或央行在履行货币管理职能时严重失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因素会引发一场全面的、持久的危机。此外，央行行长们还承诺他们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不会重蹈覆辙。

根据当前盛行的理论，除了外部冲击之外，经济形势可能出问题的唯一原因是中央银行的政策错误。由于中央银行的职能仅仅是控制货币和信贷的总体流动情况，政策错误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放得太松，要么收得太紧。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和过多的货币流通量会导致通货膨胀。反之，过于紧缩的信贷政策和过少的货币流通量则会导致通货紧缩和物价整体下跌。货币主义理论认为，这些是央行需要保持警惕的危险情况。此外，无论哪一类型的政策错误，都是容易发觉的。它们首先表现在货币量的增加上，紧接着会表现在价格变化上。如果物价基本稳定，事实上就意味着央行的工作是正确的，央行行长不需要劳心费力地去掌握更多的信息，比如产业盈利水平、工作机会的增加与减少、私营部门债务的增加以及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更不会去关心私营银行是否存在失职问题。

伯南克的言论充分地透露出官方的看法，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他和其他经济学家没有（至少在他们正式的推理中没有）预料到2007年到2009年发生的事情。根据货币学派经济学家们赞同的理论，这些事情属于外部冲击，其原因超出了理论探讨的范围。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的是，它们不可能是政策缺陷的结果，因为政策已经改变了，错误已不再出现，负责任的政府已经吸取了那10年的教训，现有的经济体系内部不可能存在尚未发现的结构性缺陷。如果经济体系存在这类缺

陷，无异于意味着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存在问题。因此，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灾难只能来自经济体系外部。

此外，有些可能给经济体系带来灾难的问题根本没有被纳入经济思维的范围之内。比如，放松管制和监督可能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欺诈、滥用职权和不法行为，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但经济学家们不屑于考虑这些风险，因为这些风险被排除在经济模型之外，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它们。请让我在这里再说一遍，具有这种心态、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的人过去以及现在仍然被赋予了监管金融部门的重任。

因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没有人能提前知道”这句话便回荡在官员云集的华盛顿和银行家云集的纽约。要预知未来，当然存在一点困难，但事实上一些人很久之前就预见了未来事件。迈克尔·刘易斯在《大空头》一书中描述了一群投机者，他们兴致勃勃地拿出数亿美元的赌注，去赌美国金融机构行将崩溃以及灾难即将到来。但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们则一口咬定谁也无法预料这场灾难。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自己视为职业认同感的守护神，如果你能提前预料到将要发生危机，或者说确切地知道一定会发生危机，那么他们就认为你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是排不上号的无名之辈，你的观点无论多么有道理，他们都会置若罔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外部冲击是无法被预见的，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它们能够被预见，那么市场体系就会采取行动来预防冲击，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就意味着这些外部危险是无法预料的。人们可能会问，如果经济学家们这么想，那么要他们有什么用?

要按照经济学家们这种方式来分析世界，事实上就需要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对人类经验进行再定义，这种语言的词汇必须局限于能够在经济模式内部进行处理的概念。如果你接受这些局限性，就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如果拒绝摒弃更为宽广的视角，顽固地坚持考虑更加广

泛的事实或坚持采用不同的理论，那么你就不会被其他人视为经济学家。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只需要与自己的同行交谈就行了。他们谨小慎微地封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讲述着他们自己才能懂的规则，建立了他们内部的排名和等级，并说服自己和他人相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价值。

按照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一个群体和一套理论不大可能为金融危机之类的事件做好充分准备。

---

1. 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繁荣、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新景象，被称为“新经济时代”。——译者注

第四章
经济学派别的异同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界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的那些年间完全没有分歧，也是有失偏颇的。相反，他们也有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内容是什么呢？2009年9月，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周末版上发表了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文章，名为《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研究了主流经济学家在危机之前是怎么想的以及为什么没有预料到危机。

克鲁格曼的文章将主流经济学家分为两类：淡水派（Freshwater）和咸水派（Saltwater）。他们往往自称为“新古典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实他们既不是古典主义者，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人们也可能会将其分别称为芝加哥学派和麻省理工帮。后者松散地分布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一方面继承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知识，另一方继承了保罗·萨缪尔森的知识，但这两位大师的鼎盛岁月结束之后，他们之间存在大量的交流。

最重要的是，淡水派和咸水派构成了两个学术部落。虽然他们之间曾经存在非常重大的差别，但最近来看，这些差别已经变得次要和模糊了。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视角，倾向于用相同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并且将自己的知识局限在由同行组成的小圈子里，在这个小圈子里，他们自己的判断力不会受到外界的挑战。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在错综复杂的排名体系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克鲁格曼介绍说，这种本能是“经济学家们过于想要提出一个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又能显示他们专业知识的方案，同时这个方案还可以对外界展示他们的数学造

诣”。这种描述是准确的，也是可怕的，因为那些时常出入咖啡馆的经济学家们思考的只是优雅和炫耀，而不是如何解决更大的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未能预见、警告或阻止这场危机是这两类经济学家的共同之处。在经济形势恶化之前的那些年里，经济学家们之间并不存在卡珊德拉和潘格罗斯[注]的区别。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几乎不存在争论，他们不会去争辩全球化、金融化、不平等或中国崛起等世界经济新动态引发的危险、风险和挑战，也不会去争辩采取哪些政策比较合适。在他们眼中，历史和法律发挥着类似于地球物理和政治地理的微小作用，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作用。相反，他们会通过友好的对话去探讨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模拟理性人的行为，即模拟理性人在有效市场上的互动。如果你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那么，好吧，其他经济学家就不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难道不是吗?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误将优美当真理”。这里所说的“优美”是指直到大萧条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科学家——更不用说整个科学界——在“优美”表象的引诱下忽视了真理，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客观性的角色、证据的作用、真理的本质、经济学在科学界的地位等等。比如，生物学家们会花时间去幻想生物界是一个完美体系吗?地质学家会担心岩层是否完美吗?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很不可思议。

资本主义一般被视为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而经济学家们却认为它是完美或接近完美的。这种幻觉有什么美的地方吗?克鲁格曼并没有说为什么经济学家得出了这样的观点，也没有说为什么有人愿意接受它。相反，克鲁格曼之外，经济学家们用来描述所谓完美体系的数学知识“令人敬畏”，并且“用一些充满想象力的方程式来美化”。相对于“优雅”的概念，克鲁格曼所用的这两句话也经过了精挑细

选。人们通常不会将“令人敬畏”和“美化”与米洛的维纳斯联系起来，这两个词只会让你想起高中时期的校长和皮加勒广场（红灯区）。

经济学家之所以借助数学手段来装点关于市场体系完美性的言论，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很有美感，但局外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实没什么美感。他们的理论远远脱离了经济生活中的棘手问题和丑陋现实，但凡有一点美学意识的人都不会将经济学论文中那些烦琐复杂的数学运算视为美丽的杰作。经济学家采用数学手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澄清问题，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论证过程增添魅力，而是为了恐吓别人。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一个观点在英语中本来非常简单，但经济学家们非要用一连串的希腊符号去表达，让论证过程看起来“令人敬畏”。如果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抱怨，那么经济学家们驳斥起来也会非常容易，他们索性认为抱怨者不懂数学。

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一个重要原因是方法论出现了问题，金融危机后不少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反思。经济学家们用这些数学知识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里卡多·卡巴雷罗（Ricardo Caballero）在美国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刊物《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一篇为中等水平的专业人士所写的论文，题为《危机后的宏观经济学》。他在这篇文章里反思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认为对经济危机没有成功预测并不是经济学的失败，宏观经济学的失败在于目前其核心方法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创造了一个脱离真实世界的自我世界。这种经济学家趋之若鹜并自我欣赏的模型貌似非常科学和精确，却使得经济学变得狭隘并且提不出有用的政策建议，甚至提出具有危险性的政策建议，而对经济危机做出预测和较好解释的反而是宏观经济学认为边缘化的研究（比如对心理、投机、泡沫、传导等的研究），经济危机使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他还提出了一个应该引起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问题，即经济模型与其理应反映的现实世界是什么关系？他

呼吁人们关注复杂的方法论在经济学界所占的控制地位。他说："然而，我这个学科令我担忧的地方就是它当前的核心方法论，即所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过于陶醉于自己的内在逻辑，混淆了这一方法论在模型世界中的准确性和在真实经济中的适用性。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克服，宏观经济学界试图融合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效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充满的各种复杂互动关系限制了我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而这正是我们应该在分析过程中时刻放在心上的重要事实。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考虑这种复杂性对于经济人行为和反应的影响，从而寻求在这种巨大不确定性面前依然具备稳健性的分析工具和宏观经济政策。"

那么，究竟什么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呢？这个经济理论模型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将理性预期纳入基础方程之中，并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黏性为假设前提，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该模型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微观市场主体纯理性预期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符，标准模型没有考虑金融因素以及在处理外部冲击因素时存在不合理性。比如，在预测未来的通胀率时，该模型假定所有人的经济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存在一定的随机误差。随机性、动态性以及一般均衡性是其三大鲜明特点。动态性指个体考虑的是长期选择，使得经济体各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随机性指经济体受到不同的外部随机因素的影响。一般均衡性指经济体中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推动市场体系达到均衡状态。

对于一个简洁的经济模型而言，如果以认真的态度将所有潜在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似乎太复杂了。因此，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者们采取了一种极端简化的方式。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体系中，存在着不尽相同却相互作用的主体，而经济学家们假定所有主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在"代表性主体"的基础上构建了这个模型。在最简单的版本中（当然，也存在一些较为复杂的版本），假定所有主体掌握同样的信息，具有同样的推理能力，因此，被视为几乎一模

一样。在这种前提下，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就可以假定经济体内只有一个主体，而且这个主体根据一个精确模型通过错综复杂的计算来预测未来，仅仅会受到一些随机的、不可预期的冲击和误差的影响。由此可见，虽然这个模型声称自己拥有微观基础，但其实这种微观基础是骗人的，在研究复杂的经济体时，孤立地考虑个体行为的某个部分并不能推导出宏观行为，因为个体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

由于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引用卡巴雷罗的原话是最好的：

> 以这一核心方法中颇受偏爱的资本供给量的微观基础为例。一个关键参数……是代表性主体的跨期替代弹性。这个弹性是有人根据微观数据评估出来的，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数据，这些文献缩小了参数范围，只考虑少数几个参数，而这个方法会被任何想就“现代”宏观经济学发表见解的人使用和推崇……中国官僚、海湾地区独裁者等等类似的因素对货币供应量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典型的答案是不要担心，因为这些都是“如果”，未必会发生。

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现实中，经济主体存在方方面面的差异，比如财富、观念、必须遵循的法律和习俗等，而卡巴雷罗所说的“代表性主体”则忽视了这些差异，从一开始就假定这些差异无关紧要。第二，这段话重复使用被动语态，给人传递出一种被动思维的基调。当卡巴雷罗提到这个方法“颇受偏爱”时，人们可能会问：谁偏爱？为什么偏爱？当他提到“会被任何想就‘现代’宏观经济学发表见解的人使用”时，人们不禁会问：是哪一个隐藏在幕后的人命令这么做的呢？“典型的答案”又来自谁呢？似乎有一个隐藏在幕后的手拿着指挥棒指挥着这一切。

分析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弊端之后，卡巴雷罗接着分析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否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么美好。这个模型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技术变革引起的，因为技术变革降低了某些要

素（马匹、轻型马车）的收益，而提高了另外一些要素（柏油路、汽车）的收益。工人会对此做出理性的反应，即当环境有利时，他们就愿意多工作，而当环境不利时，他们就会少工作，因此，失业是工人们出于想削减工作时间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克鲁格曼在《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中坦率地说他认为这种说法太愚蠢了，并且反问道："大萧条真的成了大休假吗？"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确与技术史有关系，因为技术变革的浪潮的确是一波波地袭来，这一点姑且算是这个理论的一个美好之处。但卡巴雷罗没有看到这一点。相反，他写道："事实上，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其美好之处就在于它的简单性。它非常连贯地描述了一个没有摩擦的世界的均衡状态。"

一个之前没有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用呢？"描述一个在多项假定的前提下幻想出来的世界，描述一种不会变化的状态以及描述一个互动过程完全没有结构性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技术变革导致旧事物迅速终结，而新事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立下来，从而促使经济体系出现混乱，怎么能一味地认为技术变革"没有摩擦"呢？因此，这个不考虑摩擦的模型是令人困惑的。在现实中，人都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如果将所有人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视为类似于重力的同质性的活动，有什么价值呢？打个比方，这就像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人转而去研究行星的自然条件。当然，从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讲，研究结果可能是有趣的，甚至你可能认为研究模型很美，但这种研究远远偏离了人们真正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即地球上的生命，因此也不会为揭开生命之谜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你一开始就拿着显微镜、培养皿和一份沼泽水样本去研究，就不会获得你想要或预期的结果。

缺陷与摩擦

“纯粹派”或者说“淡水派”经济学家(注)主张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作用就在于设定一个关于经济生活的理论框架，引导人们在开展经济学讨论时不要突破这个框架。坦率地讲，这个框架是极端的。即便那些反对这种框架的人也不能完全摒弃它。它的复杂性，也就是这一派经济学家主张的微妙之处，需要人们付出很多脑力之后才能了解。既要表达异议，又不被视为异教徒，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在讨论过程中，如果你赞同理论模型的几个基本出发点，就会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鼓励，反之则会受到惩罚。这样一来，一切探讨仍然局限于经济学界的内部，纯粹主义者虽然有时会遭到围攻，但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凡是得到经济学界认可的异见人士都是那些喜欢往淡水里加少许盐的人。卡巴雷罗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克鲁格曼也指出，如果经济学想要赢回声誉，它就必须接纳一种不那么诱人的景象，即市场经济具有很多优点，但也充满了缺陷和摩擦。这两位咸水派经济学家都赞同“充满缺陷与摩擦的经济学将从经济分析的边缘走向中心”。

他们往淡水里加盐的办法就是在无缺陷、无摩擦的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一个让情况变复杂的因素，通常是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的因素。最著名、最原始的就是宣称“工资是黏性的”，因此无法及时适应新情况，无法恢复充分就业。那些将缺陷和摩擦理念引入均衡模型的老一代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和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了“工资黏性”的概念，作为对凯恩斯关于大萧条期间失业现象的观点的解读。对于这种在理想模型基础上增添轻微偏差的方法，现代社会最有名的实践者之一就是年轻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批判了正统的经济理论。他认为，因为一些人掌握的信息比较多，而另一些掌握的信息比较少，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正统理论所假想的人人掌握同样信息的完美世界泡汤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通过往传统的理论模型中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颠覆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近年来也做过类似的工作，即引入了“动物精神”(注)的概念。

通过引入一个缺陷或摩擦，主流经济学家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现实世界的某个特征，让自己的理论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又能维持纯粹主义的经济模型的权威性，不至于损害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

按照这个思路，面对现实中的经济危机（一个的确需要解释的事件），卡巴雷罗提出了几个可能的想法：可能大范围恐慌导致形势的复杂性突然加剧，可能出现了某个消极的冲击，导致债权人对信息异常敏感，也可能是市场主体考虑到了“奈特不确定性”之后，改变了合理预期的观念。奈特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具有确定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就是常说的“风险”；另一种是没有确定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其主观概率是不确定的，称为奈特不确定性或模糊。具有奈特不确定性的事件既不是黑天鹅事件，也不是肥尾事件，而是完全不可知的。如果人们突然认识到有些以前认为可知的事情是无法预测到的，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之前的概率计算还不够好，信心随之被摧毁，从而可能会催生行为的剧烈变化。

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呢？不是来自确凿的证据，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类证据。不是通过将备受经济学家们青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对比得出来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家不承认这类替代模型的存在。也不是通过引用历史事实，看哪个模型能解释一系列历史事实得出来的。经济学家们的目标是在忽略一切缺陷和摩擦的理想前提下建立一套最简单的理论，勾勒出一个大体上能够解释现实事件的行为模式。一旦某个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理想的行为模式——也许它会被称为“泡沫”，那么争论可能会暂时平息，直到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更加简单的理论。

“淡水派”与“咸水派”经济学家共同的研究方法使他们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小圈子，其他人则遭到了排斥。然而，这两派之间的争议有时也是非常激烈的。比如，他们经常会争论某个缺陷或摩擦是否会打破“市场具有自发调节功能，政府无须干预”的理

论。那么，如果政府以“黏性工资”、“信息不对称”、“动物精神”或“效率工资”为由而增加公共开支、创造就业机会呢？淡水派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各个时期的失业都可以归因于市场自发调节过程不完整，导致市场暂时无法适应均衡状态的改变，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这种调节过程继续进行下去，直到这个过程完全结束，政府不能出台刺激计划加以干预。

咸水派经济学家则不赞同淡水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咸水派认为，“刺激”有时是一种针对经济衰退的有效补救措施。在咸水派的一些人（尤其是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看来，如果市场的缺陷和摩擦非常大，而且影响范围广泛，那么政府完全有理由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来保障市场正常运行，不然市场失灵的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在其他人（尤其是萨默斯和伯南克）看来，短暂的、临时的刺激是有益的，有利于促进最终必然会发生的经济复苏早日实现。

虽然淡水派与咸水派之间的分歧总体上并不严重，但一直贯穿于2008年那场危机爆发后的政策辩论。最初，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无摩擦的均衡状态下，即使出现了一些“随机干扰”，也不至于爆发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从这个理论出发，要爆发现实世界中的这场危机，经济体必须遭到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其冲击力相当于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流星撞击地球时所产生的冲击力，也许是某种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技术横空出世，也许爆发了一场战争。淡水派的经济理论的逻辑就是这样，但冲击在哪儿呢？这一派完全没有头绪，也提不出任何能够产生如此强大冲击力的因素。因此，芝加哥学派甚至无力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那些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功能、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人暂时沉默了一阵子。

他们的沉默使得咸水派乘虚而入，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广播、电视和报纸上一时充斥着关于市场缺陷和摩擦的言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斯蒂格利茨看来，这场危机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未能提前认

识到市场缺陷和摩擦其实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使得那些掌握内幕消息的内部人士能够利用不知情的局外人，导致合约履行过程走向失败，从而催生爆发银行挤兑、市场恐慌与崩溃的风险，这些事件可能蔓延到全球各地，从而需要政府部门采取干预措施，调节轻率的行为，抑制市场的流动性偏好，支持有效需求。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场的坠落》（*Free Fall*）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写道："代理问题和经济外部性问题意味着政府要承担起管理经济的角色。如果它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会减少，即便出现问题，代价也会比较低。出现问题时，政府将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

这段话体现出了咸水派的观点：市场的确会出问题，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体系需要政府机构出手相助。政府就像一个有耐心的家长一样，需要帮助市场收拾残局，但从根本上来讲，虽然存在缺陷和摩擦，市场只是偶尔出问题，只能从整体上进行预测，而无法具体预测何时何地出问题。这样一来，斯蒂格利茨既在某些方面批判了淡水派的观点，为自己所在的咸水派赢得了声誉，又不至于损害淡水派经济理论的核心地位。如果没有其他目的，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需要把芝加哥学派的同行作为抨击对象。

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体系最终的正常状态是完成自发调节过程，实现充分就业，到那时，经济体系的复苏潜力得到发挥，并且能够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因此，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尽管我们目前面临严重的困难，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的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想这场危机和衰退不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伯南克主席完全有理由期待他这番讲话不会受到任何经济学家的质疑。

但这场危机是否会构成一个转折点，为我们带来一个不同的未来呢？从那时起，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再也无法发挥出来。我们应

该如何评估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呢？要评估这种可能性，我们需要探讨一下其他经济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非常危险，提出者可能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挤。这类观点有很多，但或许最有用的着手点是那些历史悠久、体系完善的观点，这类观点能够最有力地驳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完美、近乎完美或美丽”的论调。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就对资本主义提出了这种强烈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济观

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可以分为不同的派别和潮流。在长达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美国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系都存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传统的兴起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的遗产。1970年之后，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阿瑟·麦克艾文（Arthur MacEwan）等对资本主义体系提出猛烈抨击的激进主义经济学家被逐出了哈佛大学。在他们之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也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批判。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坚持挑战主流经济学界的增长理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可能会发生滞胀。当然，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时会通过学术渠道传播到美国。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将资本主义的“稳定均衡”特征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但马克思、巴兰、斯威齐、鲍尔斯、金迪斯却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是不稳定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爆发危机的风险是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决定的。这种观点认为存在另外一种稳定性较强、危机风险较低的社会经济体系。然而，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一

个弱点，因为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没有爆发什么拖垮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大灾难，反倒是苏联先崩溃了。虽然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没有人赞成苏联的政治经济体系，但人们仍然认为肯定存在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矛盾，终将有一天会崩溃。

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南非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邦德（Patrick Bond）总结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论点。他认为这类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激烈的竞争，另一个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前者导致资本主义企业无法控制自己的市场，后者导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过于注重追求提高效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这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利润率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投资、生产以及就业形势的严重恶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分析逻辑中，阶级斗争和劳资权力失衡通常位于核心地位，并认为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是历史的驱动力。一个多世纪以来，“利润率下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利润实现危机”一直是这一派的常用说法，邦德的论文也指出这些说法目前仍然处于核心地位。此外，在危机中，投资、生产和就业下降，故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利润实现危机”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当危机真的发生时，他们并不感到惊讶。

但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与现实情况的契合度有多高呢？换句话讲，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说法能让我们详细了解现实中的经济危机吗？或者说如果事先不存在这些说法，而是先发生了经济危机，那么我们能从危机中总结出这些说法吗？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金融业的作用。当前这场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吗？如果是的话，金融业发挥的作用符合我们现在的理解吗？我们在

前面讲过，主流经济学界在其经济模型中一直忽略了金融业的作用，并没有专门提出金融业的作用机制，认为金融业只能对经济体造成短暂的冲击，这些冲击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预料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会发生危机，而且并不总是回到复苏轨道。由于银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因此，危机最先体现在金融领域并不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其经济理论过于注重劳资关系的紧张和企业利润实现危机，而没有将金融业视为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反而认为金融业的作用只是肤浅的和表面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深层次的，包括阶级斗争、劳资权力失衡、过度积累资本以及资本家以技术为武器去对付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才是危机的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银行的运作会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在一定时期内给人造成一种繁荣的表象，私营部门通过借贷扩大消费和生产就是出现这种繁荣表象的一个原因，因为随着借贷规模扩大，生产状况和就业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改善，而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大，私营部门逐渐无力支撑，以借贷维持繁荣的过程便失去了可持续性：当表象破碎，每个人都意识到无力偿债时，危机便接踵而至。在一篇详细阐述金融史的论文中，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简明扼要地指出：“这场危机不仅是一场‘二战’后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而且凸显了实体经济并未解决的严重问题，而过去几十年间这一问题一直被债务所掩盖。”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掩盖”一词，这个词十分贴切地揭示了金融业与背后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咸水派及淡水派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注重超越金融业，去探寻深层次的关系结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金融业掩盖了深层次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主流经济学家们虽然也承认资本主义

经济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摩擦，但总体上持有一种和谐的论调，认为这个体系具有可持续性。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危机不可避免，最终必将走向崩溃。这三派都认为金融业只是附着在实体经济上的一个部门，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或动力之源，只能改变深层次问题引爆危机的时间，有可能改变引爆危机的概率，因此，很难让他们认为这场危机就是金融危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会复苏”的观点。在《无休止的危机》（*The Endless Crisis*）一书中，他们表达了与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类似的观点，认识到了金融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但他们认为，严格来讲，当前这场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根据他们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融会拖累经济体系，因为它会促使收入差距拉大，再加上工资增速偏低的作用，容易导致家庭债务超出正常的偿债能力。他们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垄断、过度资本积累、金融部门作用过大、生产部门作用过小以及制造业外迁导致的。他们在这本书里几乎没有分析金融部门内部发生了什么、遭遇了哪些外部冲击以及采取了哪些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属于偶然因素。

当然，金融业的运作的确有可能掩盖实体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这种思维去分析问题，金融体系的崩溃就被轻描淡写地视为一种具有表面性、次要性和附带性的现象。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会引导人们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分析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竞争等几乎无法直接观察到的问题，这场危机的主要责任被归咎为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本该受到追责的市场参与主体却被置于分析范围之外。

如果我们利用这种分析模板去分析事实，很容易得到一个正确的总体趋势，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出现错误。比如，邦德早在2004年就曾经预言美国在不久的未来会爆发一场危机，但他所说的危机是由“帝国过度扩张”引起的。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帝国过度扩张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会严重到无以为继的程度，引发美元暴跌；第二，美国将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这些事件导致人们对美国丧失信心，美国将逐步丧失在全球权力体系的支柱位置。这类危机的确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场危机完全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的，是由私营金融部门的崩溃引发的，肇始于美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国家，包括欧元区那些规模较小的外围国家。美元也没有崩溃，反而呈现出了总体走强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的直觉是正确的，与主流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预测这个体系注定会发生一些不利的事件。可以说，他们预测到了历史长河总体上的流动方向，却没有预测到具体的河道。

---

1. 卡珊德拉（Cassandra）是希腊神话中一位悲观主义的典型人物，认为世界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潘格罗斯（Pangloss）是伏尔泰笔下的一位乐观主义的典型人物，认为世界已臻于完美，并且也只会变得更好。——译者注
2. 淡水派经济学家由于主张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学科，因此也被称为纯粹派。——译者注
3. “动物精神”概念最早由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其基本出发点是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译者注

第五章
预言家

2009年，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周末版上发表的《经济学家为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指出，除了淡水派、咸水派经济学家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经济学家。他写道：“当然，除了坚持这两个取向的经济学家外，还存在其他倾向的经济学家，少数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质疑了金融市场可信的观念，并且指出了曾经破坏经济成果的金融危机的漫长历史。但是，他们是逆流而行的，在与一个影响广泛而回想起来却纯属愚蠢的自鸣得意的对抗中，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这两句话透露出来的事实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这两句话在全文中的作用却有些奇怪。纵观这篇长达6 500个单词的文章，除了另外半句话以及三次一带而过地提到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之外，只有这两句话讲到了成功预测这场危机的经济学家。其实成功做出预测的人还有很多，但克鲁格曼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没有引用他们的著作，也没有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不是因为没有人做出过准确预测，也不是因为这些人近期没有针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原因发表过作品。这类经济学家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们不是淡水派，不是咸水派，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而是湮没无闻的一派，我们姑且称之为“死水派”（Backwater）。

在经济学领域，死水派经济学家属于被冷落的一派。早在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就倾向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缺陷（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以至于遭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被排挤到了经济学界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文章只能发表在

二流期刊或时事通讯上，甚至只能发表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Naked Capitalism）和“赤裸裸的凯恩斯主义”（Naked Keynesianism）等博客上。许多在职业生涯早期质疑过主流经济学家的人都在学术圈受到了排挤，甚至有主流经济学家劝他们退出学术圈。虽然有些人继续留在了学术圈，却被“发配”到了众多影响力较小的州立大学和文理学院。在那里，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授课负担，而且即便他们想方设法发表作品，也会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学术界的这一边缘地带，尝试探讨一下那些做出正确预测的主要学术观点。我不打算全面探讨，只探讨三类观点。第一类比较务实，以统计数据为基础，是围绕着泡沫概念建立起来的，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当危机将要爆发时，某些指标能够帮助我们提前判断到即将发生危机。另外两类更多地使用了理论框架，也就是说，它们试图根据一个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去预测危机。

务实的泡沫探测法

在死水派经济学家们采用的传统方法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通过统计方法研判是否出现泡沫，因为他们认为，金融泡沫是灾难即将爆发的征兆。华盛顿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迪恩·贝克（Dean Baker）就是这一方法的主要践行者之一。在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们丝毫没有感知到危机征兆之时，他就明确宣称自己预见到了楼市泡沫。早在2002年，他写道：“如果房价随着整体物价水平而下降，正如之前往往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将蒸发掉2万亿美元的财富，严重加重经济衰退。如果楼市泡沫破灭，还将严重危及房利美、房地美等其他多个金融机构。”这个预测是非常准确的，而且在危机爆发五年之前就做出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为什么有效？

正如我们在序言中讨论过的那样，泡沫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经济暂时偏离正常的基础状态，其特点是首先逐渐膨胀（偏离常态），接着突然爆裂（回归正常状态）。“泡沫”这个概念不能与基础状态相分离，经过膨胀之后注定回归基础状态。从这个定义上来判断，永久性地偏离之前正常的基础状态则不是泡沫。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一切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泡沫，要避免问题，就要防止泡沫形成。允许泡沫形成就相当于允许随后发生危机。虽然一个孤立的泡沫可能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一连串的泡沫和泡沫破灭就会导致比较糟糕的结果。如果接受“泡沫”的说法，那么就会认为只要某个经济政策能防止泡沫形成，从而维护实体经济内在的、基础的常态，就是正确的政策，而且与泡沫相对的概念就是经济维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要防止泡沫，就要找到一个泡沫探测方法，在泡沫出现时立即发现。这个方法就是观察某些指标的变化。通常来讲，判断泡沫的指标是选择一个相应的比率，看这个比率是否严重偏离其历史正常水平。一个例子就是股票市场上的股价与收益的比率，即市盈率。20世纪90年代末期，纳斯达克技术股的市盈率就严重偏离了历史正常值，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股价继续上升的可能性显然不大了。因此，要么收益水平大幅提升，要么股价大幅下降，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股票与其他金融资产相比才具有竞争力，才值得投资。但这只是我们根据客观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当时很多决策者和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这么认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迎来了一个“新范式”，在这种范式下，收益率将会继续升高。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和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在其臭名昭著的《道指36 000点》（*Dow 36,000*）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个观点。然而，到最后，真实情况却是泡沫破灭，股价下跌。在21世纪前10年里，美国房地产市场上也存在一个类似的比率，即售价租金比。研究这个指标后得出的逻辑是一样的：要么租金必须上涨，要么售价必须下跌，不然市场就不会回归合理状态。这个指标已经严重偏离了之前的正常水平，而且房屋存量非常大。通过

这两点，我们就能窥见楼市泡沫的规模。迪恩·贝克估计，从2002年到2005年，美国的房屋建设规模接近于历史最高水平，泡沫创造了8万多亿美元的房地产财富。

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过分析某个指标来探测泡沫的方法是可行的，但如同一切特定的方法一样，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每一种情形，即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泡沫探测法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这个方法有两个前提：第一，我们要分析的指标在历史上必须是正常的，并且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正常的水平不一定会永久持续下去。事实上，即使某些指标当前的数值偏离了历史水平，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当前水平是不正常的，也许我们的经济果真出现了一个“新范式”，谁知道呢？要判断市盈率或售价租金比是否正常，要兼顾各种相关因素的变化。有些因素的变化会对整个市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改变相关指标之间的正常比率，比如税法或利率的调整。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要判断一个指标是否处于正常水平，我们需要有一个论证过程，或者说一套理论，来解释我们当前研究的这种趋势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如果无法维持下去，则处于非正常水平。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两组经济学家在危机之前就了解经济体系的不可持续性。他们在分析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以及本章所讲的“务实的泡沫探测派”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即他们注重从金融视角去观察经济生活。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本质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常态”。金融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扩张，而在某些条件下则会达到扩张的极限，继而走向紧缩。金融扩张期与经济增长期是同时发生的，这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因为金融扩张与经济增长是一回事。金融扩张到极限之后，信贷政策就会趋紧，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从而引发了危机。为了更好地描述这两派经济学家，我们挑选出相应派别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深入分析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为其派别内其他人提供了灵感，塑造了其派别的理论框架。我们选

出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韦恩·戈德利（Wynne Godley）和提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金融理论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

韦恩·戈德利与国民收入恒等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工作与我们所称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有一定的联系。这个会计架构是西蒙·库兹涅茨在凯恩斯主义颇为流行的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来的。(注)在这个账户中，总产品就是经济体的支出流，支出流的增加就是我们所谓的经济增长。支出流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主要部分，包括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在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特定的理论，这些理论解释了哪些因素决定其增加或减少。

会计关系反映的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事实。更确切地说，它们塑造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特别是，国民收入恒等式简单地认为总支出就是各个要素的总和。这就意味着，无须进一步的证据就能断定公共赤字与私人储蓄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公共赤字每增加一美元，私营部门的储蓄也相应地增加一美元。这不是一个理论，也不是一个猜测，而是一个基于记账方式的简单事实。政府以税收的形式从私营部门抽走一部分收入，之后，每当政府以支出的形式向私营部门投入一美元，私营部门的账簿上肯定比之前多出一美元。

我们可以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一点。国内私营部门的盈余（即国内家庭与私营企业的储蓄减去投资）必须等同于政府预算赤字与净出口顺差的总和。在贸易平衡状况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会导致国内私营部门的储蓄出现相应的增加。基于同

样的原因，贸易顺差的增加也会导致国内净储蓄的增加。反之，私营部门净储蓄的增加会导致预算赤字的增加，这是因为储蓄越多，消费越少，收入越低，可以用来征税的经济活动就越少，随之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和公共赤字上升。

韦恩·戈德利与利维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这些会计关系的基础上对美国经济开展了一系列的战略分析。他们的论点集中在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上，认为这种地位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美国的贸易逆差实在太大了。他们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公共预算盈余相当于私营部门债务的积累，也就是私营部门的投资多于储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他们认为，偿还这些债务的最终代价促使私营企业和家庭进入了金融紧缩的状况，从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相应资产的价格崩溃，税收随之减少。到最后，公共预算赤字趋于上升，进口减少，进而导致贸易赤字降低。经过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之后，一切趋于停滞，便出现了2000—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和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

戈德利与贝克采用的方法存在一个类似之处，即如果某个指标（比如股票市场上的市盈率）偏离了之前的正常水平，就会出现一种不可持续的情形。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戈德利的方法完全内置在了核算体系之中，选择的变量都是系统性的，而非随机性的和针对性的。这就会导致人们集中关注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比如私人储蓄率或经常账户收支情况。因此，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些账户的某些状态在某种政治环境、履约环境或行为环境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也仅仅局限于我们在描述宏观经济环境时需要分析的某些账户。这种观点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们那样认为金融背后存在着实体经济的根基，也不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那样认为经济体系存在一种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政府预算连续三年实现了盈余。当时，多数评论者高度评价克林顿的经济政策，特别是1993年为了削减赤字而实施的增税政策，但至于盈余究竟是否归功于这些政策，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当时的预算预测报告并没有预测到这些温和的措施会产生政府账户的盈余。

戈德利的方法让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公共盈余是由私人债务驱动的。这种会计学意义上的盈余反映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即信息技术行业的繁荣。当公司纷纷借贷投资于技术时，它们便创造了财富，获得了收入，需要交的税相应地也增加了，从而增加了公共收入，催生了预算盈余。两个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能持续多长时间？一旦停止，会发生什么？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官方意见认为这种“新范式”可以再持续整整10年，美国也能偿还所有国债。但戈德利的分析却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种税收收入的增加赖以实现的前提是私营部门的借贷与支出日趋活跃，而这会消耗掉私营部门的金融资产。在一定时间内，资本收益可以弥补金融资产的减少，但到了某个特定时刻，资本收益继续增加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因此，道琼斯指数不大可能达到36 000点。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企业和无数家庭走向破产，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终结了之前的预算盈余。

相反，在低迷时期，庞大的公共部门赤字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私营部门净储蓄的增加导致的。只要私营部门急于积累金融资产和修复其资产负债表，支出就会减少，公共赤字就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无法改变私营部门的行为，他们也无计可施了，只有当公共预算赤字扩张到足够大的规模，使得私营部门能够达到他们期待的金融积累目标，也就是去杠杆化目标之后，他们才愿意增加支出，公共赤字状况才能有所改善。

如果说公共盈余因为私营部门的债务而具有不可持续性，那么公共赤字则存在一个不同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者们往往对私营部门的宽容度比较低，他们一般看不到或不明白私营部门的账面上发生了什么，也不愿意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往往认为公共赤字是他们能控制的一个政策工具。如果决策者按照这个观点行事，在私营部门对资金的渴求度较高之际削减开支和提高税收，那么私营部门就会进一步削减开支，这样经济就会走向崩溃。这就是紧缩政策面临的尴尬处境。

外国人持有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储备资产的意愿也会影响美国的公共预算赤字。外国人通过贸易顺差赚取美元，然后购买美国国债和债券，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利息，而仅仅持有美元是没有利息的。他们愿意持有美元资产，则会支撑美元的价值，进而有利于美国增加进口和减少出口，进而导致美国财政部的税收收入减少。只要世界其他国家增持美国国债与债券，无论世界经济是增长还是波动，美国预算赤字都难免会增加。根据戈德利提出的恒等式来看，只要美国政府想消除预算赤字，就相当于想削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作为金融储备资产供给者的地位。然而，理解这个道理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或新闻工作者似乎微乎其微，即便有人明白这一点，也不愿意承认，因为这有悖于主流经济学界和决策者们的观点。

明斯基与金融不稳定性假说

海曼·明斯基对金融内在脆弱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与戈德利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这两个分析框架都没有预先假定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金融体系有可能稳定，也有可能不稳定，既不会必然地趋向于均衡状态，也不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都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分析者的任务就是利用分析框架去判断某种情况是继续维持

一段时间，还是会引发危机。正是由于这个共同特征，戈德利与明斯基之间的分析才有价值。

明斯基的核心观点是“稳定性滋生不稳定性”。经过一段平静的、发展的、持续增长的时期之后，金融市场参与者们开始不满足于正常回报率，而寻求更高的回报，不惜承担更大的风险，通过举债经营去下赌注。在一个经济周期开始时，大多数借款者属于“套期保值型”借款者，这类借款者的预期收入不仅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而且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然而，当经济从扩张转向收缩时，借款者的赢利能力缩小，逐渐转变成“投机型”借款者和“庞氏型”借款者。“投机型”借款者的预期收入在总量上超过债务额，但在借款后的前一阶段，其现金流入小于到期债务本息，而在这段时期后的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大于到期债务本息。第三类是“庞氏型”借款者，在每一时期内，其现金流入都小于到期债务本息，只在最后一期，其收入才足以偿还所有债务本息，因此他们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以致债务累计越来越多，潜伏的危机越来越大。这是庞氏骗局，一旦有人认识到存在的风险，这种骗局必然崩溃。

因此，明斯基指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虽然不存在无限延续的均衡增长之路，但临时的、偶尔的稳定却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时金融体系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稳定增长，公共部门的责任就是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限制投机行为，使经济增长阶段尽量延长。公共部门决策失误及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成功的政策也肯定会受到市场参与者鲁莽行为的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审慎和良好的管理没有意义。明斯基的处方是首先要保持警惕和谨慎的态度，然后处理决策失误引发的后果，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央行的能力变得非常强大，当市场崩溃时有能力采取稳定经济的举措。

如果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与主流经济学家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做个对比，就会发现明斯基的观点存在一个根本特征，即它的一切分析自始至终都是在金融体系之内开展的，从没有超越金融领域，没有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区分开。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投资和技术变革的步伐都受制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决策，金融是理解经济的唯一途径。在经济生活中，一切都会受到金融政策的影响，不存在非金融事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就是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就会波及普通企业和工薪阶层。明斯基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他认为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而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戈德利的区别在于他在更大程度上从金融视角去审视经济生活，他没有将金融与经济体系内的其他组成部分区别开来，而是认为金融不稳定就是经济的不稳定。

近年来，彼得·阿尔宾（Peter Albin）、巴克利·罗瑟（Barkley Rosser）和陈平等经济学家日益倾向于运用非线性动态系统来研究经济问题。明斯基不是一位数学理论家，但他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倾向存在非常明显的联系。非线性动态系统模型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简单的方程式，通常只有一个方程式。非线性动态系统的方程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们考虑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那些线性经济模型忽略的因素。第二，它们将每一阶段的产出作为下一阶段的投入要素，因此，它们模拟了一个经济体系在不同时间段的演变情况。

非线性系统的一个关键属性在于认识到了经济系统的“相变”，即某个控制参数变化时给经济系统造成的质变。这些相变类似于水在特定温度条件下从冰到液体再到蒸汽的变化。在某个控制参数出现时，系统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稳定均衡状态，这就像水在一定温度下实现了冰冻状态。但当控制参数变化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随之出现相变，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状态，经济体系从一个结果过渡到另一个结果，比如从高产出状态过渡到低产出状态。经济体系出现两个结果之后，这两个结果就会作为两个控制变量影响到

下一个阶段的相变，从而催生出四个结果，依次循环，结果会越来越多，最终推动经济体系进入一种所谓“确定性混沌”的状态。在这种混沌状态下，即便下一个结果是由方程式提前决定好的，经济体系的真实变化方向却是很难预测的。即便你知道自己处于哪种状态，即便你了解之前所有的投资经历，也无法预测自己接下来会遭遇什么情况。

相变确定了不同状态之间的界限。跨越一个界限标志着经济系统从一个行为模式转变到了另一个行为模式。这种转变可能是从稳定到不稳定的转变，也可能是从不稳定到崩溃的转变，没有必要到系统以外寻找“冲击”。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会出现不同阶段，稳定的繁荣从来不是一种“新范式”，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状态，可能维持下去，也可能无法维持，这取决于经济体系运行环境的变化。

非线性系统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在于用数学手段模拟历史、进化，甚至是机械系统的行为，虽然有规则可循，不同阶段也存在相应的界限，但无法让我们预测到最终结果。即便我们能很好地理解经济系统的特征，但下一次灾难的性质和爆发时机却无法预知。你只有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能知道。已故的经济学家彼得·阿尔宾在1998年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论述。

用明斯基这种方式去思考经济问题是比较抽象的，似乎没有必要，但这对政府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政府的职能在于监管市场，监管的意义在于让一个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经济系统运行在安全界限之内，使其维持在稳定的、相对合理的阶段，即维持在“套期保值型”或“投机型”阶段，尽量远离“庞氏骗局”和崩溃阶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好像你分析汽车发动机、飞机发动机和核反应堆的区别时，虽然明明知道它们之间的动力水平存在一定的界限，但你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个界限究竟在哪儿。越接近这个界限，它们的性能就越高，而一旦超越这个界限，则会引发灾难。安全界限的选择需要卓越的判断力。

这样来看，非线性动态系统与各类发动机的情况比较类似。这些发动机一般具有三种状态。一种是关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阶段的状态与当前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种是正常运转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阶段的状态与当前的状态具有一定的联系，可能继续正常平稳地运转，也可能加速或减速。如果加大油门，使其达到正常水平的极限状态，发动机就会表现出最佳的性能。然而，一旦超越了正常的界限，发动机就会过热，甚至会坏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修理好之后才能重新启动。当然，试图操作一台接近于极限状态的发动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金融系统更加类似于一个核反应堆，因为一旦控制参数错误，金融体系的运作突破了正常状态的极限，引发的后果将比发动机过热的后果严重得多。

如果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政策指导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即远离危险区，尽可能地留在安全区。但咸水派和淡水派经济学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经济体系注定会自发地恢复正常状态，无论政府是否立即刹住经济运转的发动机，无论经济系统是否会走向崩溃，其最终都注定能够依靠自发调节功能恢复正常状态。

政府之所以在危机爆发之前无所作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了这种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宿命论的误导，以至于盲目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放弃了理应承担的监管职能，放任市场去主导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漫不经心的经济学家喜欢使用“市场纪律”，而不是政府监管去调节储蓄和贷款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政府消除了一系列本来有助于金融体系远离庞氏骗局的因素，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只能购买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他们还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年12月通过了《美国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导致信用违约掉期（CDS）摆脱了政府监管范围。这些经济学家们还反对托宾税（Tobin Tax）。这一税种是美国经

济学家托宾在197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的，是指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以便“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车轮中掷些沙子”，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也许最荒唐的情况是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在21世纪伊始公开鼓励金融机构大规模地发放投机性的抵押贷款（浮动利率、有分期付款的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那些肩负着维持金融系统安全与健康职责的官员们不仅默许了私营部门过度膨胀的信心，还将整个金融体系推到了危险的边缘。

明斯基的分析框架仅仅将“安全界限”的概念应用于个别公司和银行，也许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制定的监管政策。但要理解什么情况算安全的，我们还需要了解风险的本质，需要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个更广泛的了解。

---

1.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使得政府认识到建立全面度量国民经济宏观变量的统计系统的重要性。为此，美国商业部委托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开发了一套国民经济账户。这是最早的国民收入账户，也是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的标志。——译者注

第二部分
毁灭经济增长的四大因素

第六章
能源与经济：项圈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没有提到资源、资源成本、收益递减以及资源租金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人认为，在交通运输和家庭取暖方面，石油已经取代了煤炭，美国所需的石油主要来自得克萨斯州和周边其他几个州，油价非常低廉。波斯湾地区储藏着巨量的石油资源，即便欧洲和日本经济逐渐复苏，国际石油供给仍将非常充足。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需求是比较小的，因为苏联在能源方面是自给自足的，而中国经济力量还十分薄弱，只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小角色。

当时，美国人没有理由预料这种情况不久之后会发生变化，谁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谁就会不受欢迎。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断有人预测石油供给会出现短缺，但事实证明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因为当已知的油田枯竭之后，总会有新的油田出现。一般来讲，最大的、最容易开采的油气资源储备开始开采之后，技术会不断进步，现有资源储备的开采效率越来越高，而且新的、更好的能源会取代原有的能源。比如，在大量煤炭资源尚未得到利用之时，石油已经取代了煤炭资源在交通运输和家庭取暖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人类历史上新技术与新能源的分布情况，会发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改变着人类的能源利用方式，总体来看，大方向就是能源成本越来越低，人类的生活标准越来越高。“二战”结束后，人们围绕着《增长的极限》开展的争论似乎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份报告只是机械地预测能源会枯竭和短缺，而事实一再证明了这种预测的错误。

在一片乐观情绪的背后，也有一些人认真地思考问题。按照美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美国的能源消耗量是比较多的，这是美国生活水平高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政府对这个事实也是心知肚明的。这种状况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是不公平的，但美国政府却一心想要让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在20世纪50—60年代，为了确保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能够一如既往地优先获取石油、铜、铀、木材，甚至是糖、香蕉、牛肉和咖啡等资源，美国政府在伊朗、伊拉克、刚果、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地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后来，美国政府决定对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军事干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经济学界很少讨论这件事，很少有人会将这些事件与能源争夺联系到一起。

“二战”后发展起来的那种经济学理论以理所应当的态度看待资源，忽视了资源租金，也忽视了金融机制对资源市场的影响，这既反映了“二战”后人们在自由主义思潮高涨的状态下的自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挑战时的胆怯。马克思当年就谈了很多关于帝国主义的事情，阐述了帝国主义对于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这是其思想深受第三世界欢迎的一个基本原因。在冷战时期，面对社会主义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人士做出的回应就是试图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区分开来。比如，库尼贝特·拉弗尔（Kunibert Raffer）于1987年在《不平等交换与世界体系的演进》一文中就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自由平等的贸易为基础的，而帝国主义是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按照美国对于自身形象的描述，美国非但不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毁灭帝国的国家，当代美国政治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虽然美国曾经发动越南战争，以至于很多越南人并不认同美国对于本国形象的描述，但美国将这类事件视为细节性因素，认为美国政治总体上是反对殖民主义的。

因此，社会和经济评论家如果希望自己能在美国当代政治中发挥影响力，不被边缘化，就必须采取一个非常微妙的路径，认清并区分

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界限。自由主义观点试图分享和扩大经济增长的成功，让贫穷国家也分享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对外援助项目，帮助他国发展经济。只有那些不受欢迎的边缘人士才会宣称资源有限以及分布不均的言论。如果谁宣称美国这个国家依靠过多地攫取世界资源而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那么无异于给美国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挑战了每一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这种言论的提出者。

在这些问题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没有发表过自己的观点，戈德利与明斯基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见解。凯恩斯学派之后的经济学家们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经济学领域内部的因素上，包括会计准则、金融不稳定性以及组织结构，但没有大胆地探索经济运行与更为广阔的物质世界的关系，没有探讨资源利用模式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没有认真考虑资源成本的问题，更没有注意到生态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限制。在20世纪50—60年代，探讨这些问题的人都是非常边缘化的，包括科罗拉多大学的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以及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后者在1971年出版了其杰作《熵定律与经济过程》（*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乔治斯库–罗根发现，主流经济理论的推理方式不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伟大的定律，认为熵总是在不断地增加，热量总是从温度较高的物体转移到温度较低的物体，时间总是向前移动，而永远不会向后移动。熵是不可逆的。

乔治斯库–罗根坚定地认为经济活动与其他各种有机或机械的活动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即都需要集中有用的能源来满足某些特定的需求，然后将残留物作为废物排放出去。效率被定义为利用资源满足需求的程度和浪费资源的程度之间的比率。如果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资源，那么这个过程就可以重复。如果资源无法得到补充，或者排放的

残留物污染了环境，那么这个过程就必须结束。固有的资源只能使用一次，一旦利用之后，就成了既定的历史事实，利用过程一旦完成就无法恢复。正如著名的波斯数学家及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在《鲁拜集》中所写的那样："那动着的手指在写，写过了又写下去。不管你有多么聪明，有怎样虔诚的情绪，都不会唤回他删去半行，所有你的泪水也不会洗掉它的一字一句。"

有机体在将资源转变成它们可以利用的形式之前，需要先形成相应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生物结构、机械结构或社会结构。这些被称作"固定成本"，因为所需的结构必须在生产过程开始之前就准备好。你必须先制定好一套生产策略，准备好一种技术，然后才能开采和利用资源。在这套生产策略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成本也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时期内，随着生产水平增减而呈现出正比例变化的资源被称为"可变成本"。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下，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会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当生产过程处于停滞状态时，可变成本为零，但固定成本仍然必须支出。

总体来讲，在一个经济体系内，如果资源的总价值超过了开采的总成本，那么这个体系就能运作起来。资源的价值与成本都是以能量单位来衡量的。这是一种"能量盈余"。要获得这些盈余的能量，你必须进行先期投资，不然可变成本就等同于产出了，净收益也就无从谈起。比较大的生物体和比较大的企业在先期投资中就投入了大量资源，它们往往存在时间较长，成为各自食物链顶端的"猎食者"。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迂回生产方式[注]虽然需要事先投入更多资源，但当资源成本较为低廉时，其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一般来说，一个效率较高的系统需要的固定成本也较多：想要变得更高效，就要增加投资规模。但反过来看却未必正确。固定成本高的系统可能是高效的，也可能是低效的，这取决于这个系统的设计方式和工程技术，取决于一个系统的环境与其采用的技术是否能够完美

匹配，取决于系统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在资源丰富、环境稳定的时期，自然选择和经济政策通常会加大固定成本投入，增加投资规模，逐步积累资本。只要资源成本一直保持在低位，那么经济系统运行的效率就有提高的潜力。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一个稳定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下，增加固定成本投入规模才具有合理性，才能在长期内获得收益。因此，资源成本提高和环境不稳定是对经济体的重大威胁，能够毁掉盈余，导致固定成本高的系统失去可持续性。

我们不妨以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在农业技术方面的差异为例，具体地思考一下上面所讲的内容。在贫穷国家，农业劳动通常依靠人力和畜力完成，作物生长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土壤肥力和阳光照射，获取的能量几乎不会多于获取这些能量所付出的成本。由于这个原因，贫穷国家的农民往往非常贫困瘦弱。生产和消费都是在本地进行的，都容易受到干旱和洪水的影响，容易爆发饥荒，因此，土里刨食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贫穷国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农业是非常稳定的，它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持续了几千年而几乎没有变化。虽然自然灾害会对农民个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不会威胁到基于农业的生活方式，一旦灾难结束，农民就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耕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固定成本很低，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源就能完成重建。

在富裕国家，农业对庞大的工业体系具有较高的依赖性，因为工业为农业提供了农用机械、化肥和便捷的运输条件，能够将最终的农产品运输到遥远的消费者手中。此外，在富裕国家，农产品市场（包括期货市场）非常广阔，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良好局面呢？因为除了汲取太阳的能量之外，富裕国家的农业生产活动还得益于其他能源的补充，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些额外的能源为机械运转提供动力，并被转化成肥料，提高了土壤肥力。由此可见，产业分工可以让农民高效地利用额外的能

量。至关重要的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获取这些能量的成本一直远远低于它们创造的价值。

但如果能源成本上涨呢？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要么是因为固有的陆地油气资源已经开采殆尽，不得不转向深海或油砂，要么是因为能源开采与配送环节遭到了某些市场力量的干预，人为制造了能源短缺的局面，从而抬高了价格，消费者手中的财富被迫转移到了生产商或中间人的手中。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不依赖外部能量的农民只是受到轻微的影响。但对于那些对工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农民而言，因为肥料、运输和农业机械的成本都会上升，则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工业化农场的盈利能力最初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会迅速下降，而那些自给自足的农场最初的盈利能力比较低，反而下降得比较慢。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发展规划、经营规模和适应能力都会影响到其效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述的那样，体形较大的动物在转化能量方面往往是比较高效的。它们寿命较长，生活区域广泛，食物来源多样，但这类动物的数量不是很多，反应不灵活，繁殖缓慢，因此，如果生存环境改变，可获取的能量减少，喂养幼崽的难度加大，将会面临灭绝的风险。另一方面，小动物的数量则非常多，它们寿命较短，适应能力强，喂养幼崽所需能量较少，因此，小动物能够大量繁殖，而且当生存环境变得较为艰苦时，这类小动物幸存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规则也适用于企业。当资源廉价，而且市场环境长期稳定时，大企业往往能够实现蓬勃发展，小企业适应能力强，环境变化之后，它们能及时做出调整，即便破产了，很快就会出现新的小公司取而代之。小企业主很少会变得非常富有，除非企业做得很大。大企业虽然能汇集大量财富，但在市场变化面前不易做出调整，容易出现严重的萧条。

企业越大，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网络、基础设施、人才、管理、研究和固定设备等都属于固定成本，企业为员工交的养老金也属于固定成本。每小时生产活动所需的劳动和材料是可变的。一个企业、项目、行业或技术所需的固定成本越大，越需要存在长久一些（这样才能收回先期投资），越需要以长远视角谋划未来，预先考虑好如何应对多重因素的变化，包括政治稳定性、资源成本、竞争情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只有在乐观、安全和给人信心的时代里，私营企业才会上马大项目，因为只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企业才能预见到这些大项目会带来大回报，才能以低廉的成本获得长期融资。我们可以断定19世纪是乐观时代的一个著名例子。当时，大英帝国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军力，以强势的态度到世界各地掠夺资源。英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营造了长期稳定的环境。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外扩张与投资的部分资金是依靠没有偿还期的债券支撑的，这种债券被称为“永续债券”[注]。在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永续公债这一金融工具之所以能够产生，绝非偶然，它是以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为前提的。

第二个和平时代的例子就是美国在1945年之后拓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营造了美式和平。战后国际秩序的第一个目标是对之前的帝国开展清理和扶持，尤其是遭到重创、濒于破产的英法两国面临的烂摊子。第二个目标是遏制新帝国的崛起，特别是苏联。第三个目标是挫败革命势力创建独立国家的企图，弱化他们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前两个目标几乎完全成功了，第三个目标在中国、越南、伊朗和古巴之外也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结果就是确立和巩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金融霸主地位，从而使得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巨额的国际贸易赤字而不必付出什么重大代价。即使在后冷战时代和危机时代，这种优势也得到了延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除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之外，其他替代性的体系更糟糕。因此，在美国金融霸权下，美国才能够毫无困难地出售30年期的国债，这就表明，尽管这个国家

面临着重重困难，人们仍然相信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会继续存在下去。

但当资源变得稀缺和昂贵时，当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时，投资周期就会随之缩短，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就会受到限制，总体盈余或盈利水平就会低于经济环境稳定时的水平。因为利润减少了，那么利润在工人、管理层、企业主和税务机关之间分配的矛盾便有可能变得更为激烈，市场的投资信心也会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上马的大项目就会变少，也许一个项目都没有。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会购买备用的发电机和瓶装水，预期恶化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没有人喜欢这样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只是依赖备用发电机和瓶装水，那么它永远不会达到依赖输电线和输水管实现的生活水平。

为了说明不确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水电站的发展历程。在美国，水电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当时美国军事强大，能够确保美国的安全，能够确保大坝不会毁于战争。德国在“二战”爆发之前修建的很多大坝后来都被炸掉了。在拉丁美洲，正是得益于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三国缔造的全面和平局面，在巴拉那河上修建伊泰普水电站才具有了可能性。在埃及，阿斯旺大坝一直承受着巨大的风险，直到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这种风险才趋于弱化。在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大型水电项目遭到美国或苏联攻击的风险仍然是非常大的。在此之前，中国电力的发展严重依赖煤炭，这类火电厂的效率比水电站的效率低得多，但如果它们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不至于像水电站那样给下游地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当这种攻击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消失之后，中国才开始考虑开发水力资源，建设水电站，其中最著名的是长江三峡水电站。

政府的政策会影响到经济体系的结构，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济绩效[注]。较低的利率使得大规模先期投入具有了经济上的可行性，使企业对未来现金流产生乐观的预测，因此往往能够鼓励企业加大先期投入的规模，即提高固定成本的规模。提高税率往往也会鼓励企业增加固定成本的投入，因为可变成本适用的税率往往比较高，而固定成本适用的税率往往比较低。比如，投资于大型机械装备，一般还会得到税法的大力扶持，因为一旦修建了一栋建筑或一座大坝，或者制造了一台机械，就能长期使用，只有修建或制造过程涉及的经济活动被征了税，且之后不再有税收。相比之下，劳动力则是一项需要长期纳税的资源，劳动者的收入越高，适用的税率就越高。相反，低税收和高利率则会引导人们增加可变成本的投入。富裕国家通常实行高税率和低利率，而贫穷国家则通常实行低税率和高利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要实现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先进行大规模的固定投资。有了先进技术，很多之前并无多少经济价值的资源就能得到高效利用。比如，新出现的水平钻井技术和水力压裂技术使天然气公司能够大规模开发页岩气。但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资源密集程度”往往也比较高，即要利用一项先进技术，你必须先投入大量资源。比如，要利用水力压裂技术，就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技术对资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资源消耗的速度超过资源更新速度或发现的速度时，资源就会变得稀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较高，那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支撑这些技术，结果导致水、燃料以及能够用于制作生物燃料的原料（比如玉米）等可用于消耗的资源可能会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坚持采用一项超越其资源承受能力的先进技术，那么该国的生活水平会降低得更快。

如果一个公司或经济体的资源不能产生盈余，那么它就会选择动用现有的资源储备，有时会选择从外界借入资源，以此来缓解自身能

源紧缺的局面，等待日后生产出了足够的能源之后再加以偿还。这样一来，债务就形成了。在资源稀缺或被挪用的情况下，除非资源供需形势出现好转，否则原来签订的合同就无法得到履行，资源也无法偿还给外界。纵观历史，这是诱发战争的一个常见因素。

在能源稀缺的情况下，最后的应对之策就是吃老本，消耗掉现有的资源。这样一来，虽然当前的生活标准得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会减少未来的投资规模，未来的生活水平肯定会下降。活在当下的人肯定也能预见到这种可怕的情景。因此，掌握公权力的人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通过强制手段减少当前阶段消耗的资源，宁愿降低当前的生活标准也要保留用于投资的资源，要么允许当前这一代人透支未来几代人赖以生存的资源，以便维持当前的生活标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当前这代人面对迫在眉睫的需求和欲望而做出的民主决策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后代人长期生存下去的概率。一个非常不幸的结论是，当前这代人可能会选择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导致未来社会的经济趋于崩溃。

社会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全球化背景容易催生出跨国公司。在稳定的环境下，这些公司会上马一批大型技术工程（铺设管道、修建核电站、构建全球航空网络、完善通信网络），这些大项目的投资周期长，对稳定环境与持续增长的需要尤为强烈。当资源廉价、运营成本低，市场空间就会持续扩大，企业也能够扩张，而一旦资源稀缺，市场就可能趋于萎缩，企业的增长潜力也随之消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某些垄断组织或政府机构可能会故意控制某些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人为地造成经济衰退的假象，以此排挤竞争对手，控制成本，或者为新投资开拓市场空间。

通常来讲，市场上还存在关税、专利等保护性措施，存在技术壁垒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市场上并没有为了压制竞争对手而频繁设置贸易壁垒。当时，亚洲国家日益崛起，在国际市

场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角色。它们还掌握了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并且在美国培植了强大的游说力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亚洲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最初，美国只是在资源成本方面存在劣势，但后来这种劣势竟然导致了持久的贸易逆差。我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平衡行为》（*Balancing Acts*）的书，详细讲述了这个转变过程。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工业领域的优势地位逐渐遭到后起之秀的蚕食。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这些发达国家开始走上了一条金融化之路。在一些国家，少数几家大银行的规模占据了本国银行业的半壁江山，在银行业的巅峰时刻，银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占据全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10%，创造了全国总利润的40%。这并不令人惊讶。大银行都是固定成本最高的社会组织，它们在为自己赚钱时效率很高。

与实体经济的产品相比，金融产品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且数量很大，但生产成本几乎都是预先支付的。一旦把先期的大规模投资做好，金融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这种投资总是非常划算的。例如，指数套利是利用现货和期货市场之间的差价获取盈利的，本质上是无风险的，利润可能会非常丰厚。但套利机会可能在数秒之内就会消失，指数套利需要快速计算，并快速执行计算结果。速度最快的套利者几乎把所有的利润都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因此，根据真实需要开发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就显得尤为必要，但这是一项极其昂贵的工作，而且需要延揽大批顶尖人才来操作计算机系统。如果你在这方面成为第一名，得到的回报就是将绝大部分盈利据为己有。摩根士丹利或高盛就是这样的大赢家。

固定成本高的系统往往存在多个问题。从企业层面来讲，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市场空间里存在多个高效的竞争对手。以美国制造业市场为例，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企业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

份额，尽量压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资源成本可能因为技术原因而上升，也可能因为战争和革命而上升，因为战争和革命催生的政治环境会提高资源获取成本，1973年和197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利润率下降时，人们往往会将赌注押在商业环境的持续恶化上，这种做法是正常的，但赌错也是常见的事。

期货市场就利用了人们对未来形势的预期。未来资源主要存在两种可能性，即要么丰富，要么稀缺。当市场普遍预期未来某种资源丰富时，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降低，逐渐接近于效率最高的供应商的可变成本，价格较高的供应商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但如果价格持续降低，可能导致市场不稳定。这是卡特尔出现的原因之一。这些卡特尔想方设法支撑价格，使其不至于跌到固定成本以下，从而使得那些成本较高的供应商能够继续运转下去。但卡特尔的作用也可能导致市场不稳定，因为一旦它限制住了某种商品价格的下行空间，就可能产生过度生产、过度供给的局面，从而损害了卡特尔自身的利益。得州铁路委员会以及欧佩克等石油卡特尔就曾经造成过这种局面，致使油价持续下跌，以至于破坏了卡特尔内部的团结。

当一种资源稀缺时，价格动态恰恰相反。价格将趋于上涨，甚至会上升到生产成本最高的生产商的价格水平。最高的情况下会有多高呢？最高价格不是满足市场需求所需的基本成本，而是消费者能够承受的最高价格，也就是消费者在不削减自身需求的情况下能够支付的最高价格，期货市场会推动这种商品的价格迅速向这个极限靠拢。交易商对某个商品或指数基金做多头仓位，在交割日即将到来之际展期交割。由于未来价格会更高，生产商和投机者持有资源是比较划算的，它们可能选择停止采油，减缓油轮速度，补充储油量。监管机构通常会努力挫败这种做法，打击期货市场上的投机头寸。如果缺乏有效的限制，期货市场会为这种投机性质的博弈创造便利条件。

在一个资源稀缺，而且资源金融化的世界中，最终的结果不是无限期的价格上涨。相反，关键的资源价格和经济活动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态势。在投机的压力下，价格会逐渐上涨，从而抑制消费者的需求，价格会下降，之后消费者需求会增加，再次导致价格上涨。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久之后，这种周期性变动的态势会导致市场产生焦虑情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目前价格处于什么水平，都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焦虑情绪削弱了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很多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后果，比如，企业不愿意再投资建设新的炼油厂，因为尽管价格在短期内可能走高，但考虑到长远的油价变动，谁也无法保证油价会保持高位，从而使得投入巨资修建新的炼油厂可能并不划算。这样一来，资源稀缺的局面一旦形成，可能会长期维持下去，直到某种全新的技术出现，形势才可能有所好转。

资源长期稀缺对企业盈利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资源成本的持续增加会削减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的固定成本普遍较高，如果资源价格持续高涨，就会直接削减企业的盈利。比如，当石油价格上涨时，所有使用石油的企业都将付出更多的成本，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然而，石油公司的盈利却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不过，石油公司的数量毕竟远远少于石油消费者的数量，而且很多石油公司都是海外的，石油公司抢走了石油消费者的盈利之后，这些盈利并不会自动地返还给消费者，如果会返还的话，也是基于特定的商业条款，但这类条款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引发经济衰退，长此以往，企业盈利水平的持续降低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其偿债能力，引发债务危机。

其次，对资源价格周期性变化的预期会引发市场焦虑，从而削减投资性支出的规模，导致市场萎靡不振，以至于减少企业的利润。因此，尽管能源的直接成本在一个经济体的所有活动中所占比重并不高，甚至很低，但能源价格一旦上涨，就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对所有企业的盈利水平产生巨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

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引发了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油价上涨会严重减少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而是因为会削减企业的盈利水平，导致市场对未来盈利前景产生焦虑，从而减少了投资，就业率和经济产出也会受到影响。

关于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项圈效应”，即如同套在小狗脖子上那种能够收紧的项圈一样，资源价格的波动会对经济整体运行状况产生制约作用。这种效应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某种关键资源出现了稀缺情况，在常规价格水平下，该资源的总需求超出了总供给；第二，这种资源的供给会受到囤积居奇和投机行为的操纵。能源对于经济体的项圈效应并不一定中断经济增长的步伐，但一旦能源资源的使用量增加，这种资源的价格就会迅速升高，而企业的盈利水平则会迅速降低。这种情况会抑制投资，导致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可能会促使监管部门采取其他政策工具加以调控。这时，只有降低经济增速，减少资源使用量，才能缓和这种项圈效应。

1970年之后，能源成本的周期性变化在美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留下了十分浓重的色彩，因此，无论是谁，如果要描述美国经济在这段时间的运行状况，都不可能不着重提到能源的作用。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也是这样。北海油田的发现对英国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该油田的产量已经趋于下降，对英国经济的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可能还会注意到石油对于挪威、天然气对于荷兰以及核能对于法国的作用。当石油价格上涨，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能源时，这些能源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缓冲作用。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在能源战略方面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给，这也是无须赘言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显然旨在尽可能长久地稳定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供应和成本。因此，尽管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考虑到能源对于经济的制约作用，恰恰相反，而是忽略了能源的作用，但实际上，所有的决策者都能认识到能源的作用，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水力压裂技术会缓解油气供应紧张的局面吗？在很多人看来，压裂页岩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很快就会让资源再次变得廉价，能源供应和企业盈利状况很快就会好转，经济也将迎来持续增长的前景。到我写这本书为止，在美国，水力压裂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这种技术获取油气资源的行业欣欣向荣，美国似乎将要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此外，美国天然气价格还不到欧洲天然气价格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技术进步已经解除或即将解除能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项圈效应呢？

从当前来看，要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虽然页岩里蕴含着大量的油气资源，有些人很乐观，但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企业家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去判断哪一方是正确的，显得无所适从。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现有的油井的耗竭率，即在失去压力之前还能开采多久。耗竭率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水力压裂技术太新了，人们无法准确地得知油井能持续多久。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然而，事实上，在很多人眼里，美国的能源形势之所以好于欧洲的形势，就是因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和北达科他州存在页岩气，这表明——至少含蓄地表明——资源成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没有对这种争论产生什么影响。如果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减少碳排放，或许能够避免全球变暖引发的灾难。但就短期来看，无论人们是否会采取这些减排措施，如何减少企业的能源成本仍将是人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只有当大力减排措施改变了企业的预期和规划时，减排才可能占据上风。要把减排工作作为优先事项来考虑，公共政策必须立足长远，考虑到气候变化给企业造成的代价。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气候变化究竟会造成多大的代价，是未来才可能确定的问题，目前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大力减少碳排放对于未来人类的生存具有必要性，但减排给当代人造成的代价却是非常高昂的，当前这些能源消耗量非常大的企业就会变得无利可图，就会遭到削弱。

在生态遭到威胁之际讨论经济问题，可能因小失大。但事实是，企业的决策是在当下做出的，所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都离不开低成本资源的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必然压缩资源使用者的盈利空间。2008年夏季，由于一波又一波的囤积和投机，每桶石油价格达到了空前的148美元，之后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油价也逐渐回落。这很好地体现了能源对于经济运行的项圈效应。在我写这本书之际，每桶石油已经降到了100美元左右。从长远来看，当资源需求量迅速增加时，资源对于经济运行的项圈效应必然会再次显现。

据我所知，在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将资源成本问题摆到核心地位，或者接近于核心地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继续忽视能源的作用。然而，资源成本的作用已经摆脱了之前那种得不到认可的状态，一些见多识广、讲求实际的人现在开始明白资源成本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从资源成本角度出发去思考经济问题可能是最简单、最清楚的路径，比如，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危机，为什么后来出现了通胀，而通胀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消失了。资源成本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00年之后当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之际（同一时期，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则没有出现大幅增长态势），世界经济又陷入了困境，而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产油国却没有出现什么金融危机。谁都没有提出仅仅资源成本这一个因素就足以解释金融危机，但无可否认的是，资源成本是危机爆发的一个内在因素。现在，能认识到这一点，已经足够了。

---

1. 迂回生产方式指先生产生产资料，再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捕鱼的时候，放弃今天的收获，先来编织渔网，以便今后能捕到更多的鱼。砍柴之前先磨刀，放弃今天砍伐的木材，才能在以后“磨刀不误砍柴工”。——译者注

2. 永续债券是一种不记载到期日的特殊公债，购买这种政府公债的人，等于同意无限期地每年接受利息的支付，但不收回本金。——译者注

3. 经济绩效主要是指对经济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的评价。——译者注

第七章
武力的无用

如果说工业世界的资源成本先是推动了发展，后来又制约了发展，那就有必要审视一下军事力量的角色，看看军事力量是否能够真正地将资源成本维持在可接受的低水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掌控在那些能够获取资源优势的国家手中，比如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而那些缺乏廉价资源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和中国，发觉自己实力弱小，相形见绌，不断衰退。德国人和日本人曾试图创建帝国，赢得享有资源的特权，但在重要战争中失败，未能成功。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美式和平”之下，在1970年全年，资源都很便宜，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拥有丰富的资源，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确保它能够在波斯湾等地持续获取资源。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越南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再次得到检验，从冷战结束到2001年9月11日那次恐怖事件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美国都未曾受到过任何挑战。

如果读一读关于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初期势力范围和角色的大量书籍，你会发现无论书中观点是支持还是否定美国是一个“帝国”，它们都很少质疑美国的实力。美国在军舰、飞机、基地、军费开支等方面体现出的实力优势不言而喻。有假设说，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实力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假设是没有依据的。但也有与众不同、出人意料的观点：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无论具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通常都无济于事。美国不能再用军事力量主导世界。更确切地说，面对经济危机，军事力量已经变成了次要角色，已不能单靠军事力量解决问题。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2004年出版的《巨人》（*Colossus*）一书中，对“帝国主义”这一理念提出了原则上的支持，尤其是支持美利坚帝国。弗格森对美国国外干涉的历史做出了客观的评判，但他还是认为国外干涉是有必要的。从美菲战争到越南战争，弗格森没有想美化历史。他并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力图证明美国的世界使命不是帝国主义，与早期欧洲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他的论点很务实，包括两点：管理世界事务的工作必须有人做；无论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看起来多么恶劣，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还算是好的。

弗格森认为有论据可以支撑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弗格森说：“大家普遍倡导秩序。当然，自由是更崇高的目标，但凡是那些见识过混乱的人才能意识到秩序是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层意义上说，支持美利坚帝国同时又是反对全球无政府状态，或者确切地说，反对地区权力真空扩大化。”

这里我们不考虑上述言论中那些隐含假设。没有帝国，就一定会导致国际无政府状态吗？自治是现代骗局吗？国家独立只是幻想吗？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力量，更确切地说，没有美国这一帝国的力量，“地区权力真空”就一定会出现吗？如果真的出现，会出现什么情况？真的会那么糟糕吗？世界其他国家也会像美国那样，以温和的态度看待美国动机吗？弗格森这种以偏概全的写作风格不是为了讨论这些问题，它对于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也并不重要。在“9·11”事件之后，这些问题有了答案。

动用军事力量将秩序强加给另一个无政府世界实际上表明了秩序是可以被强加的，而且武力也能维持秩序。这种说法在以前是正确的吗？如果搁在以前是正确的，那现在依旧如此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统治是实现统一世界秩序的有效途径。这要追溯到19世纪早期，那时

机械时代的优势与公共管理的技巧相融合，赋予了帝国力量，而这种力量是防卫动机与武力优势结合的产物。

机械时代与公共管理的发展唤醒了一种消失的政治形式。欧洲全球帝国（不同于广阔却有边界的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墨西哥、秘鲁帝国）是从环球航行开始的。环球航行促进了欧洲与美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联系。然而由于全球性，加之不确定的交流时间，这种联系必然不太紧密。全球帝国是海上航行和发现新大陆的成果。在最初阶段，该帝国建立在人口衰减（由于疾病）、奴役、掠夺之上，包括掠夺手工艺品、矿产资源、土地和劳力。而公共管理的另一个目的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维持基本秩序和拯救灵魂之上。

在全球帝国初期（16世纪至18世纪），中央政权的操控依赖于被派驻到殖民地的那些精英是否忠诚于中央政权。这种操控受到了距离的限制，也受到了横跨大洋供养军队所需开支的限制。此外，殖民地人们对于纳税产生了极端却合理的厌恶情绪，也影响着中央政权对殖民地的操控。因此，不难解释为何在18世纪时，英国第一个殖民地，即现在的美国分裂了，也不难解释为何在19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的统治会渐渐式微。

相较于全球帝国初期，第二阶段的帝国有所不同。到了19世纪中期，将工业投资和现代政府引进殖民地均成为可能。丘吉尔在描写他远征阿富汗马蒙德山谷的《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一书中这样说道：

> 19世纪给这个幸福的世界带来了两个重大的产物——后膛枪和大英帝国。前者是一种奢侈品，而后者是一件麻烦事。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是个典范。他的军队举着革命与法律的旗帜，在一定程度上与中欧封建主义抗衡。然而，他踩在了饱受争议的

土地上，踩在了隶属或者靠近其他欧洲帝国的领土上，踩在了过去帝国总督（西班牙、葡萄牙）的领地上。一个世纪以后，希特勒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印度、阿富汗、非洲属于另一种情况，如同由沙皇统治的西伯利亚或者美国的“西部荒野”（Wild West）。

19世纪的帝国霸权抢占了领土，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没有必要通过武力从相对强大的一方来赢得领土。对于欧洲来说，这种抢夺方式在印度、东南亚、东印度群岛（在这些地方，贸易统治让位于集权统治）以及非洲很是盛行。对于美国和俄罗斯来说，这种扩张首先是在毗邻的辽阔领土上发生的。那么，为何这些掠夺会出现？为何它们会在早期掠夺失败后取得成功呢？

答案在于铁路、电报、机关枪、轮船以及欧洲政治改革的出现，而这个政治改革也为掠夺提供了一些正当理由——为了西方文明的进步，至少在帝国主义者看来是这样的。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期，西方一直存在敌对势力，但在许多情况下，西方工业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很多敌对势力都被镇压或收买了。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与当地之前的政府相比，殖民者建立的新帝国会给当地精英人群带来一些好处（但有两个例外，比利时人没有给刚果地区的精英人群带去好处，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的白人也没有给北美印第安族群带去好处）。在19世纪，当殖民统治遭到当地原住民反抗时，当时的道德观念和种族歧视使得对民间起义的暴力镇压显得无可厚非。在旁遮普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和美洲原住民看来，新的帝国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抵抗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实用主义的心理让人们不仅接受了新的帝国，也推动了帝国的繁荣。

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后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个帝国之间的对抗，是各个工业体系之间的碰撞。所有的参战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战争没有所谓的赢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为了防止纳粹德国和日本建立诸如几十年前的英国、法兰西、美国、

俄罗斯之类的帝国——这些帝国根植于殖民扩张、暴力镇压，甚至种族灭绝，并将殖民地当作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次战争导致帝国主义名誉扫地，导致非洲和亚洲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走向了独立，而且联合国的建立又保障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独立性。并非所有殖民地的独立都来得那么容易。“二战”后，法国殖民者仍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耀武扬威，英国殖民者又在马来半岛和肯尼亚挑起了战争（当时英国殖民者没有在印度燃起战火，因为印度对英国财政贡献很大）。然而，独立的浪潮终究还是席卷了全球，不过苏联和葡萄牙这两个帝国属于例外，因为苏联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却又是“二战”后出现的唯一帝国，而葡萄牙帝国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残留物，它既非财富之源，也非产品市场，在“二战”后又苟延残喘了3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葡萄牙都是中立国家，虽然穷，但在战后也并未破产。

在欧洲全球帝国再次衰落之际，弗格森预见了一个类似的帝国的兴起，只不过它打着联合国和民族自决的幌子——这个帝国就是美国。与之前的帝国一样，美利坚帝国植根于工业力量、军事力量和高效的公共管理模式。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得益于其领先世界的科技，得益于建立了一支专业性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承担起了四处征伐的任务。

弗格森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是美国帝国成功故事的一个体现。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动机可以追溯到一种经典的帝国主义理念，即一个帝国必须巩固其遥远的边界，以对付其对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要对付的对手是苏联。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二战”的结束是对帝国主义理念本身的挑战，弗格森却认为“二战”的结束构成了不同帝国之间的桥梁，将不同的帝国凝聚到了一起。根据这一点，弗格森推出了一个颇有嘲讽意味的结论，即1945年以后的民族独立和全球治理架构只是一个假象。

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军事与政治能量的第一块“试金石“并非战败的轴心国，而是朝鲜半岛。在那里，美国险些败于朝鲜人和中国人之手。10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了越南。

弗格森对越南的分析鞭辟入里，甚至听起来有些残酷，很值得关注。他认为，在越南战争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其实即将赢得胜利。他认为，如果美国投入更多的力量，拿出更大的决心，就能夺取越南战争的胜利，而军事上的胜利就能维持一个独立、友好、反共的南越。根据当时的战争态势来看，他的分析有可能是正确的。弗格森指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的军事技术持续改进，逐渐适应越南的环境，作战策略也更加有效，而且当时美国空军已经遏制住了北越军队对南越的攻势。从军事角度来看，战事可能已经陷入胶着状态。

越南战争进展非常困难。北越军队在柬埔寨和老挝都有隐秘的藏身之地，而且他们的物资供应线路很难阻断。然而，越南战争也具有很多殖民战争的特征，比如，交战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主要战场为农村地区，且美国投射军力的潜力是无限的。因此，弗格森认为，美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输掉越南战争的，因为美国政治领导人丧失了战斗到底的决心，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过战斗到底的决心。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治因素占了上风呢？如果美国投入更多的军力就能赢得战争，为什么没这么做呢？如果事实真的表明政治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事实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虽然弗格森的这个分析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无可否认的是，越南战争的确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政治考量的确是必要的。在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了。1950年美国在鸭绿江的那段经历依然历历在目，而且美国总统深知在中国边境发动越南战争的风险非常大，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时刻萦绕在美国总统心头的新因素，即原子弹。当然，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愿意招致原子弹袭击的风险，而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愿意面临必须动用原子弹的情

形。比如，法国人在奠边府的驻军被困之际，美国不可能为了解救他们而动用原子弹。由于这些政治原因，美国领导人根本就不打算加紧推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没有入侵北越，没有炸掉红色大坝，也没有攻击海防港的舰船。

电视普及是一个新的影响因素。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曝光率明显低于20世纪下半叶的战争曝光率。当时，南越地区发生了罄竹难书的暴行，而这些暴行根本无法完全掩盖起来，美国国内民众通过电视能了解到南越的真实情况。一旦这些严重背离道德准则的暴行被曝光，势必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抗议运动。因此，战争进行的方式对其持续的时间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方式过于穷凶极恶，灭绝人性，那么这场战争必定会戛然而止。在此之前的帝国几乎都没有面临过这种窘境（数年前，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那场战争可能算是例外，虽然残暴，仍然持续了8年之久）。

正如所有前殖民地国家一样，越南本国的政治形势业已发生沧桑巨变。50年前，越南人可能会合理地认为法国人不会离开越南，认为“帝国”就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法国殖民政府是稳固的，除了殖民政府之外，没有其他能够促进国家进步的好方法，甚至连胡志明先生都曾负笈巴黎。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世界模式就消失了。驻越南的美国人不仅是，也将只是昙花一现。我们曾信誓旦旦地声称，我们的目标是“训练越南人干好‘本职工作’”。因为每个人，每个在越南的同胞都了然于心，这一天终将来临——我们将无法再庇护我们的同胞们——这一事实将会挫伤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积极性。

随后，直升机撤离日终于来临。

越战失利之后，美国军方的确对自身的局限性做了反思。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国事安宁；虽然里根总统骨子里有种牛仔的血性，而且他执政早期也确实增加过军费预算，但他毕竟也是不愿直接诉诸武力的；在里根时代，除了在贝鲁特反恐战中遭遇过一次短暂的

溃败之外，美国政府要么以“傀儡战”的形式发起战争（例如安哥拉战争和尼加拉瓜战争），要么以“速决战”的形式发起战争（例如格林纳达战争）。根据约翰·蒂尔曼（John Tirman）在《战争的滥觞：美国军火贸易的人力成本》（*Spoils of War: The Human Cost of America’ s Arms Trade*）一书中所做的描述，即便在速战速决的格林纳达战争中，那个小岛上武装力量的抵抗也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导致美国民众陷入了一阵恐慌。1989年，老布什总统下令发动了入侵巴拿马的战争，这场丑恶的战争导致数百人死亡，但在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中，美军大体上掩盖住了肮脏的暴力活动，美国民众无法了解实情。

直到1991年，美国才再次试图发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以期将伊拉克从科威特沙漠上驱逐出去，从科威特城驱逐出去，并最终摧垮伊拉克军队。由于距离遥远，再加上对手似乎具备明显优势，因此，这场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就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需要部署大量的兵力。但战事进展得很轻松：战场是辽阔空旷、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占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伊拉克军队非法入侵科威特，过度消耗，士气低落，装备陈旧，而且很多士兵在战争打响之前就已经放弃战斗了。（1991年，萨达姆的军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库尔德人，由于萨达姆长期压迫甚至屠杀库尔德人，导致这些库尔德士兵不愿意为萨达姆而战。）

这一次海湾战争的轻松取胜使美国摆脱了多年来一直影响自己的“越战综合征”。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但这场战争并没有证明美国军事力量在普通条件下的打击能力。10年前，苏联从阿富汗战场的艰苦战斗中学到了经验，而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战争中学到类似的经验。在20世纪末，美军在科索沃与米洛舍维奇的军队战斗时，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检验，而且科索沃战争的空袭行动出人意料地持续了70多天，却没有摧毁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从这场战争中，认真的观察家们会发现一些简单原始的反制措施就能挫败空中轰炸行动。很多人都认

为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会成为一个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但由于美国军事实力并没有在这几场战争中得到充分的检验，因此，那些希望印证自己想法的人恐怕不得不先等一等了。

后来，到2001年，就发生了“9·11”事件，堪称“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新保守主义团体——“新美国世纪计划”组织在此事件爆发之前就做出了预言，小布什总统在当天夜里的日记里也是这么认为的。“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大幅提升军力，增加军费，甚至远远超过了后来的阿富汗战争的实际需要。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期摧垮基地组织，颠覆塔利班政权。当美国及其盟国于2001年底进军喀布尔之际，五角大楼的军费开支基本上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限制了，军事规划也不受任何有效的约束。

但阿富汗战争的规模太小，至少从前几年来看是这样，无法对美国人的战争观产生深刻的影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2007年的数据，在2001年和2002年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军费仅仅在之前的基础水平上分别增加了140亿美元和180亿美元。因此，由此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真正重要的是五角大楼在筹划未来战争时享有了无限的自主空间，而且阿富汗战争的轻易取胜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自信。换句话讲，阿富汗战争只是一场催生幻觉的速决战。

到了2003年，美国又开始入侵伊拉克。最终结果表明，美国面临的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要征服和占领像伊拉克这样一个大国绝非易事。这场战争检验了美国人关于超级大国的假设，即美国可以通过震撼与威慑去统治世界。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一波战争狂潮，而那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要么被奚落，要么被忽视。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伊拉克战争的最终结果。这场战争爆发10年后，据估计，美国付出了8 000亿美元的直接成本和更多的间接成本（未来肯定还要继续付出更多的代价），却仅仅实现了最直接的目标，即推翻萨达姆，之后便从伊拉克撤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认真

探索背后的原因或许是有用的。早在法国撤离阿尔及利亚时，“帝国模式难以为继”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而这次美国撤出伊拉克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以征服与占领为目标的战争就变得这么困难呢？

第一个原因是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的非洲和印度，空旷辽阔的农村地区堪称理想的战场。你可以从高耸的山头上或者从空中随意开火杀戮。一个村庄可能会被烧光或夷为平地。此外，这种地形更加方便军队行军和扎营，方便站岗放哨，保护自己。而另一方面，城市则是钢筋与混凝土的世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下通道和地下室。除了原子弹，其他武器不可能完全摧毁一个城市。城市的街道限制了车辆的行动，容易使车辆成为攻击目标。由此可见，在空旷地带交战的优势到了城市地区荡然无存。

第二个原因是武器的进化。据说，在帝国主义如日中天之际，各大帝国的工业化程度大幅提高，任何遭到征伐的国家都无法阻挡或反制帝国军队的强大火力。正如法国诗人伊莱尔·贝洛克（Hillaire Belloc）在19世纪晚期所说的那样：“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然而，那样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现代的聚能药包可以集中烈性炸药的威力，炸穿墙壁或坦克装甲，威力巨大，价格便宜，还极易隐蔽。作为恐怖袭击首选武器，聚能药包对攻占部队毫无用处，但是对防守部队来说却是无价之宝。对于普通炸药来说，汽车是绝好的运输工具，因此，汽车部队也被称为“穷人的空军部队”。如果不采用汽车运输方式，也可以采用人体运输，即自杀式人肉炸弹。这种炸弹灵活多变，非常奏效。我们已经见识过很多诱使别人充当人肉炸弹的方式，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则是被迫的。

第三个原因是现代媒体和现代通信方式的存在。今天，它们扮演的角色已经远远超过了越南战争中的电视摄像机。今天，几乎每一个场景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并得到广泛传播。虽然费卢杰袭击事件[注]和哈迪塞屠杀事件[注]表明人类的行为准则在战争中从来不会得到完全尊重，但因为有了数码相机、手机、脸谱网和推特，军队的残暴屠杀必定会受到全世界瞩目。这就意味着人们对暴力的容忍度低于过去。系统性地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去征服被占领区的人们已经基本不可能。同样，监狱里折磨囚犯的情况也基本上消失了。正因为如此，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似乎震惊了美国军方。

第四个原因是，在现代战争中，占领部队的服役期相对较短。士兵和军官很少在一个驻地待上一年以上；就算之后回到同一个驻地，一般也是为了执行另一个任务。他们来来去去坐的是飞机。这也与一个世纪以前不同，当时受命于帝国的大部分军人实际上把整个人生献给了军队。而现在的这种情况只能造成部队中人际关系淡化，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下降，因此占领军与当地人之间来往的情报可靠性也降低了。甚至，占领部队里的文职管理人员也不再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承担的职业。在伊拉克，它成了非专业人士的专属领地，而担任这些职务的文职管理人员在美国拥有其他职业，或拥有政治野心。从一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一无所知的短期士兵中选拔有领导能力的精英是天方夜谭。

第五个原因是，在现代战争中，占领常常是短期行为。再没有人为了兼并他国领土而去占领。位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可以算得上是当今世界上的唯一例外了，因为违反准则，已经被世界大部分国家所不齿。被占领地区的人们清楚，有一天，总有一天，当敌军离开的时候，就是他们解决通敌者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当地找永久性代理人的行为已经消失。那些为占领方效力的人要么同时与另一方小心地联系着，为自己留条后路，要么寄希望于在此之前把家人安全地转移到美国。

第六个原因是，占领军的士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珍稀。他们不再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农民之子，不再是刚刚摆脱农奴身份的阶层，不再是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可以轻易取代的人。志愿兵役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士兵全靠招募。战争中需要掌握和维护精密设备带来的要求是，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培训。在由大众媒体负责监督的民主制度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他们不幸伤亡是具有不良政治影响的大事。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可以取代的。即使在半个世纪以前，以上的这些问题还都不存在，那时当炮灰就是军人理所应当的归宿。

这些因素导致了战争结构发生永久性的改变，改变了发动以占领和控制他国为目的的战争的成本和收益，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伊拉克战争并没有随着巴格达被征服而结束，为什么接下来的五六年里双方陷入极度僵持状态，最终化解僵局的是政治手段而非武力。如果这场战争的教训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个教训能够深入人心，那么以彻底征服一个大国为目标的战争或许就能够避免，可能任何大国都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而美国几乎不可能再发动侵略战争了。同时，以农村地区为主战场、整体来看比较低调的阿富汗战争还在继续着，但可能会持续更久。本书写作之际，人们讨论的主要内容是2014年全面撤出阿富汗的可能性。

战争已经结束了吗？非常不幸的是，并没有。但就当今世界以及未来很有可能爆发的战争来说，主要战场会是在非洲，会是那些从未经历过工业化并且未来也不会被工业化的土地，会是那些世界媒体都不会注意到、发达国家也不会直接派驻军事力量的地方。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战争”的时代似乎已经落幕。2013年10月初，武元甲逝世，享年102岁。到此，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位在传统战争中奋战过的伟大将军和军事领袖。武元甲将军在一系列的战争中抗击过日本军队，战胜过法国、美国的军队，据统计，这些战争中的遇难者数量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现在，除了非洲，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几乎不可能发生此类规模的战争，也几乎不可能会再出现这样一位军事领袖。

因此，虽然暴力仍旧阴魂不散，但我们曾经所熟知的战争却将一去不复返。很快，我们将有可能诉诸经济意义上的战争。首先，由于有些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内的经济，所以有必要说说伊拉克行动的实际规模及其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发展，美国的军费总额一路飙升，达到了之前的4倍，2003年达到了800亿美元，2004年达到880亿美元，而2005年和2006年则平均达到900亿美元。2003年军费的增长占到了当时美国年度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约0.6%。2003年第二季度，由于大量美军被派驻伊拉克，美国国防支出将美国GDP增长额拉高了1.45%。

这个数额并非微不足道，它比自1971年以来任何一季度中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要大。但除了2003年第二季度外，伊拉克战争对美国GDP的直接可测算影响都鲜为人察觉。2003年全年增长的军费开支对GDP的直接拉动率仅为0.36%，在2004年为0.26%，而在2005年和2006年则均低于0.1%。2008年，由于总统选举引起的经济增长，这一拉动率再次升高到0.36%。根据乘数理论，考虑到个人消费的下游效应，这一经济拉动率可能增长50%到100%。但是就算会发生这样大幅度的乘数增长，它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推动作用仍然很小，而且很快就会过去。

虽然伊拉克战争一直在持续，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很快消散，究其原因，是因为要想对经济增长起到持续性的积极作用，军费开支必须每年都有所增长。在支出总额上每一次增长（在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大约是每年900亿美元）将对GDP起到一次且仅有一次的拉动作用，即使增长后的支出总额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然保持增长后的水平。即使能够一直将支出保持在某个水平，也不会对经济增长率做出任何贡献。因此，虽然伊拉克战争的支出总额远远超过了战前极具误导性的预算，但和美国的经济总规模相比，它仍然只是个小数额，对美国经济增长所起的直接推动作用更是昙花一现。所以虽然伊拉克战争持续了整整8年，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从美国经济表现的角度来

看，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花费的开支从一开始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就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根据国民收入账户的测算来看是这样。自2004年之后它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经济推动作用了。

在21世纪前10年的中期，从伊拉克战争中逐渐清醒过来之后，另一轮经济论证开始兴起，争辩美国是否因其“过度的帝国扩张”而将自身的世界地位置于险境。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威胁。人们担心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国家会寻求对美国“震撼与威慑”策略做出“不对称”反应，通过停止持有美国政府债券作为金融储备，转而选择欧洲、日本、俄罗斯甚至中国的债券，以抵抗美国的军事力量，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将会贬值，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会上升，国民生活水平也会下降。这将是世界因小布什政府的傲慢及其所犯罪行而对美国做出惩罚的方式，对此，将有人欢喜有人忧。

然而上述情况却并没有发生。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略受挫并没有造成明显的金融后果。在战争和占领行动上花费的巨额财富对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似乎并无影响；虽然在伊拉克获得石油特许权和在阿富汗铺设天然气管道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但似乎金融后果也不大。这种新型帝国主义行动来了又去，并没有带来明显的金融损失。当然，损失还是有的：一些社会投资泡了汤，公有资本没有得到保护或修复，战争中也有不少伤亡。但这些损失都会被个体及他们所处的团体自行吸收，只有从特定的角度，你才能看到这些损失。

但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即美国经济的内部和私营部门出现，而非由政府的暴力行为引起。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结果就是，在危机中，美国政府债券一如既往地算得上是安全资产。整个反恐战争，在其发起者看来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永恒特质，而在其诋毁者眼里则是对美国世界地位的威胁，但这一战争此刻却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除了在恐怖行为的实施者和其受害者的心上，并未

给人留下一丝痕迹。一切都只是一场小小的余兴节目，但它却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点，即对于美国所面对的危险，特别是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所遇到的障碍来说，使用军事手段只能是死路一条。

---

1. 2004年9月13日，驻伊拉克美军从地面和空中袭击了巴格达以西约50公里的费卢杰市，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另有20多人受伤。——译者注
2. 2005年11月9日，美军在伊拉克哈迪塞镇遭到简易炸弹装置攻击后，作为报复，杀害了24名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平民，包括妇女和下至两岁的小孩。——译者注

第八章
数字风暴

技术变革会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大多数人看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加快。反之，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随之放缓。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就是数字革命。因此，很多人认为，如果要摆脱经济停滞的状态，技术必然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在。虽然我认同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当前技术变革的速度非常快，但我认为借助技术摆脱经济停滞的愿望是错误的。相反，当前这场大范围的技术变革反而成为经济恢复增长、恢复高就业率的第三大障碍。

经济学家们喜欢讨论技术对收入差异、就业、增长的影响，而且他们经常宣称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然而，如果你问他们什么是技术以及如何度量技术，他们则无法告诉你。技术变革没有固定的定义和度量单位。有时，经济学家计算的指标是专利，将专利数量视为度量技术变革的一个单位。如果你追问这方面的证据，这些人往往给不出证据。事实上，专利发布的速度只能用来衡量专利局的活动。

然而，增长理论的框架坚持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技术是增长过程的一个元素，其作用是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提供质量更好的产品，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如果技术变革的速度放缓或停止，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根据我们的直觉，没有新技术，那么经济增长的潜力将会大大受限，只能通过增加相同类型的机器来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停滞不

前的社会很快就会遭遇资源成本上升和规模收益递减的障碍。除此之外，经济增长的结构也是非常单调的。

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视为一种“剩余因素”。技术进步会推动产出增加，而这种产出增加无法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规模的增加来解释。这种方法假定劳动力、资本和产出都是可以度量的，从而规避了以往在衡量技术对经济所做贡献时的弊端，但事实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只是其中两个因素，除了它们之外，还有很多因素，而索洛剩余理论的一个弊端就是容易将除了劳动、资本之外的因素都当作技术进步来处理。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总产出大约70%的变动可以由索洛剩余的变化来解释，因为当时测算出来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了人口与资本规模的增速。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技术”的力量——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技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

这类增长能够继续吗？按照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论述，只要技术不断进步（且不管什么类型的技术），经济增长就能继续。考虑到最近几十年间数字技术设备日新月异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那么从索洛的观点来看，经济增速应该一直在加快。然而，在现实中，一些经济学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经济趋于停滞，并且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停滞的时代。因此，当你听到这种论调时，可能感到十分惊讶。更有甚者，这种观点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理论领域一个最具权威的人提出的。这个人就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

2012年，戈登在一篇名为《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的文章中比较了数字时代的创新成果与之前工业时代的创新成果。他指出，工业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玻璃窗户、冲水马桶、飞机、高速公路、自来水、暖气和空调。工业技术带来的成果利用了之前那个“发现时代”的效率，因为在“发现时代”，材料、工程、卫生和能源使用等领域的技

术进步为工业时代打下了基础。然而，工业时代的技术变革都是一次性的变革。比如，就窗户覆盖物而言，最初是蜡纸和布料，到工业时代，出现了改进，玻璃取代了蜡纸和布料，但数字时代就不会出现比玻璃更先进的替代品。再比如，就飞机发动机而言，最初是螺旋桨，后来出现了改进，涡轮风扇发动机取代了螺旋桨，但数字时代不会出现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更优越的替代品。戈登指出，基于这类工程效率来看，我们现在可用的机会枯竭了，时间将证明这等同于增长的结束。

戈登认为，技术变革与工业革命的浪潮是分波推进的，而最新一波，即数字革命，不会大幅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或经济福利。比如，智能手机只是电话、传真、邮件、电脑、日历、计算器、指南针、报纸、电视、电影院和扑克游戏的整合，它们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的东西，它们取代的东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从“实际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智能手机不能大幅地促进经济增长。据我理解，这是戈登论据的要点。

但在这种语境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功能“浓缩”到一部袖珍的手机里，但如何准确判断“实际生活标准”的改善幅度呢？如果说戈登有一个用来衡量人类满意度的具体指标，那么这个指标似乎是人们为了生存而付出的体力。根据这个标准，智能手机的得分很低，因为它几乎没有为人类的生存、健康和舒适做出什么贡献。

但拿智能手机与玻璃窗户做对比，并不是以人们的持续体验为基础的，因为在数字时代，直接经历过窗户覆盖材料从蜡纸或布料向玻璃过渡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哪一项技术更多地提升了自己的福利，即便有少数人能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也没必要将这个人的证词作为倾向性证据套到别人头上。

经济产出完全是由人们愿意支付的商品和服务构成的。在衡量经济产出对人类福利的影响时，除了“货币”这个尺度以外，其他尺度似乎都只是猜测，本质上具有主观性，一代又一代的福利经济学家们都曾经指出过这一点。所以，尽管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实则不然。毕竟我们不能拿物资稀缺时代的改善与物资丰富时代的改善做对比。我们无法得知脸谱网和推特对人类福利的贡献更多，还是铁路或电动水泵对人类福利的贡献更多。因此，我们不得不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本身的优势去考虑新技术对人类福利的影响。

经济增长核算理论根据人均产出的波动来衡量技术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而，纵观经济思想史，“一战”前后的主流观点存在很大差异。“一战”前盛行的古典经学理论对技术是什么以及技术发挥的作用持有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当前的观点。古典经济理论没有意识到技术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更没有意识到技术对心理学的影响，仅仅认为新技术的主要作用是提高人类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并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尤其是降低劳动力成本，认为技术只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一个工具，其目的是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卡尔·马克思所说的“榨取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创新使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利用妇女和儿童从事制造活动，并加快生产过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马克思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对“机器减轻了人类工作负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如果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数字技术，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数字技术实际上有什么作用呢？比如，现代社会的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数字技术有利于促进分布式生产和外包，导致廉价劳动力直接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展开了竞争。如果没有卫星、光纤传输线路和电子开关，发达国家就不可能在印度建立呼叫中心，今天的时尚产业和电子产业也无法建立跨国生产网络。在19世纪，蒸汽动力系统的出现导致英国十几岁的少年就开始走上流水线，接受机器的“驯化”。在今天的世界中，虽然中国农村15岁的村民能够借助先进的通信技术

与美国圣何塞、加州或纽约的人建立即时联系，但这些村民是否会因此而受益却值得怀疑。

新技术的一个功能是节约劳动力成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新技术能够使人们利用远方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取代了昂贵的劳动力，或者是因为新机器能够取代劳动力的角色，其实这两个原因产生的最终影响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比如，得益于技术进步，读卡器取代了收银员，自动柜员机取代了银行柜员。随着手持设备集中了通信、信息和娱乐功能，随着零售店日益让位于电商，书店和音像店可能会逐渐消失。当这些科技进步逐渐显现时，生活水平是否实现了整体的提升则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收入无疑集中在科技大亨们的手中，那些失业者的收入则大为减少。虽然有些人勉强在遭到新技术冲击的行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与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薪酬、受信任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都有所降低。

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技术是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一种工具。熊彼特认为，技术的破坏作用不亚于创造作用，只有摧毁旧市场，才能释放购买力去支持新市场的盈利水平。因此，在熊彼特看来，经济衰退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旧的结构、企业、市场和工作岗位必须被摧毁，新的才能出现。新产业未必会重新雇用旧产业的失业者。一般来说，旧产业的失业者不会得到新产业的雇用。在一场技术革命后，购买力和生活标准的提升未必会缩短毁灭阶段所需的时间。

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个词语，以此描述技术变革如何颠覆了经济生活的结构，从而导致很多大型工厂和生产系统灰飞烟灭，引发了大范围的失业现象。但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这些变化有可能提高某些人群的生活水平，还看到了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的一个内容，即如果资本主义想方设法制造出了工薪阶层能够负担得起

的商品，那么资本主义有可能依靠工薪阶层而取得欣欣向荣的发展。或许是因为熊彼特早在1932年就从奥地利移居美国的缘故，所以他能看到相对与世隔绝的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突出强调的一个现象：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也存在具有“创造性破坏”作用的技术变革。

拖拉机对美国农业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这些机械装置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大范围推广，导致很多用于农业耕作的役畜纷纷下岗，之前那些照料和使用这些役畜的人也丢了工作。1920年，美国的马匹和骡子约有2 500万头，到1950年减少到了约800万头。（总体来看，这种趋势对马匹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根据美国农业部1950年的数据，随着役畜数量的减少，大约7 000万英亩用来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粮食作物了，与当年用于种植小麦的土地面积是一样的。除了上述这些变化之外，美国在化肥、农药和农作物杂交技术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有这些变化都大大增加了美国农民的农业产出。然而，这些变化也导致很多农场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被迫到城市和城镇谋求生计，而城市居民没有足够大的购买力去消化新增的农业产出。所以，当时农业领域萧条景象的本质是生产过剩，最终导致农产品价格和利润双双下跌。

在农业变革的背后，石油作为运输燃料的重要性日渐突出。190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斯平德勒托普（Spindletop）油田开始产油，1927年，产油量达到了峰值，到1930年，美国又发现了东得克萨斯油田，这是美国第二大油田。当时，这些发现以及其他一系列发现使得美国得克萨斯州一跃成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主要产油州。液体发动机燃料的出现使得农业机械化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以碳水化合物为原料的化肥取代了动物粪便，以低廉的成本补充了土壤肥力；卡车推动了农村商业的发展；石油精炼的副产品——沥青可用来铺设柏油路。

熊彼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是第一位的，“破坏”居于次要地位。在美国，卡车的大规模运用得益于“一战”时期军队的推动，即先有了卡车，后来才发现了卡车的其他用途。正是基于这个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才声称“发明是必要性之母”。“一战”结束后，成熟的军用技术转向了民用。制造肥料所用的原材料与制造炮弹和后来的航空炸弹所用的很多原料是一样的。前不久，得克萨斯州西部的不幸遭遇提醒了我们这个事实。当地一家化肥厂发生的火灾引爆了硝酸铵，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由于硝酸铵的威力巨大，附近多个街区被夷为平地，损失了140栋房子。该厂向得克萨斯州卫生部门提交的报告中称他们共储存了270吨硝酸铵，而这种材料既能用来制作肥料，也能用来制作炸弹。

在20世纪20年代，银行贷款业务的发展推动了拖拉机、卡车和工业化学品在农场的普及。因此，当金融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趋于崩溃之际，农业领域遭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在石油时代刚刚迎来黎明之际，很多新技术都是由农业领域消化的，农业是产出过剩的一个主要部门。在大萧条期间，金融体系的崩溃给农业部门造成了沉重打击。所以，在罗斯福的百日新政中，农业调整署自然而然地成为重中之重。

石油革命是一场能源革命，对交通、动力、供暖、制冷和电力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能源支撑着所有的经济活动，石油的兴起最终为经济增长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路径。从炎热潮湿的南方城市，到各大城市的郊区地带，再到航空运输业，都因石油而受益。虽然石油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它并没有完全挤掉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化石燃料，即煤炭，也没有排斥替代能源的发展，这里的替代能源就是核能和天然气。煤炭的开采和使用量依然非常大，只是适用范围变得较为狭窄，主要用于火力发电领域，轮船、火车以及家用取暖壁炉已经不再使用煤炭。煤炭主要集中用于发电领域则意味着那些消耗电力的领域能够实现更快的扩张速度。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50年

代初期，人们用了20年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电力的发展催生了金融与政治变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加速了这些变革。

最后，一种新型经济体应运而生，继而催生了全新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的基础是汽车、车库、维修店、郊区、购物中心和廉价的电力。农场的劳动者（及其子女）或成为机械修理工，或去工厂做了工人，或到工地成了建筑工人，或到商店里做了店员，也有去上大学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主导了美国交通运输系统。客运铁路几乎消失（但货运铁路因柴油价格低而得到了繁荣发展）。城市中心走向了衰败。“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美国人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慢慢长大，但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固定成本就是石油价格，后来，随着石油价格逐步攀升，这种模式逐渐走向了衰败。

时间很快到了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信息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消耗能源，同样也需要处理信息。因此，信息技术的繁荣发展如同内燃机一样影响了大多数人类活动。但与石油革命相比，信息革命的影响范围更加全面。基本上每一种信息都能经过模拟——数字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因此，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能通过这个过程加以转变，信息处理过程的速度和容量迅速增加。

信息技术的欣欣向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阶段。那些开发科技潜力的人就获得了无限的财富。20世纪90年代末的很多年轻技术人员都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亨利·福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面对这种大好形势，他们纷纷开始借钱投资。在短时间内，他们的投资活动增加了总需求，在连续几年内帮助整个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时期的情景非常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繁荣。到最后，当然出现了过度投资的问题，这与其前辈们的做法如出一辙。产能出现了超级过剩的现象，与之前的农产品过剩和汽车工业早期的产能过剩颇为相似。在过度投资的过程中，投资者背负了极高的杠杆率。但当过度投资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时，资产价格就

开始下降，泡沫也迅速破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戛然而止。但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情景一样，技术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演变和拓展。熊彼特之前的预言再度应验，技术的毁灭作用终于开始显现了。

技术的毁灭范围很广。20世纪90年代正值计算机技术的早期发展阶段，电脑应运而生之后，逐渐取代了打字机、记账本、文件夹和制图工具。与路由器和光纤连在一起时，电脑就取代了邮件、电话、录音播放机、视频播放机、照相机和胶卷、棋盘游戏、体育用品、电影院、录像机等，更不用提钟表和手表了。电脑在很久以前就取代了实体书店，现在也取代了纸质书、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更不用说图书馆这些传统的图书存储库了。电视也只有在变成具有电脑显示器功能的大屏液晶电视之后才幸存了下来。模拟信号已经远离了电波，取而代之的都是数字信号。现在，在发达国家，阴极射线管与打字机一样稀缺。在石油时代，石油尚且无法完全取代煤炭，而在信息时代，之前的技术则被完全取代。

虽然石油和信息技术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最值得注意的是，汽车会自行磨损，发动机的高温、路况、摩擦、部件的生锈以及碰撞都会限制任何轿车或卡车的使用期限，而在某些企业臭名昭著的“计划报废政策”被曝光之前，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这个政策旨在不断故意制造不耐用商品，使其很快损坏或过时，从而达到增加销量的目标，同时也催生了一个汽车保养、检查和修理的完整产业链。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道路需要重修和扩建，房子也需要附带车库。在向汽车——石油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即便很多不从事造车工作的人也能找到工作。汽车技术毁灭了一些工作，但也意味着当它逐渐发展和成熟时，会创造出许多新工作。

然而，对于电脑和互联网而言，创造的“附带就业”便少了许多。硬件磨损速度非常慢，因为移动的部件非常少，大部分情况下的使用环境都比较稳定，不需要承受颠簸，一般是在干净的办公室或家庭中

使用，而且温度受到了控制。光纤和路由器等基础设施一旦弄好，就能连续用很长时间，不会出现类似于重型卡车对停车场的那种破坏。当硬件磨损时，可以更换掉。因为部件便宜，所以大部分都是直接更换，修理的时候比较少，所以，电脑维修行业的规模仍然很小，而且随着固态设备越来越普及，电脑维修行业更加趋于萎缩。很多工作，比如软件类工作，可以远程来做。软件如果不遭到病毒攻击，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下去，而且它会自动更新或替换，不需要专人在现场盯着。

因此，如果计算机这个行业希望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不断推出新设计和新产品。软件必须升级。硬件也必须升级，才能运行升级后的软件。电脑必须具有更快的运行速度、更多的存储空间和更大的缓存。这些都是质的改善。但与此同时，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所需要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比如，过去整个视窗操作系统不过十几兆大小，现在要几千兆，应用软件也是如此。信息技术产业内流行一个说法，即“格鲁夫给多少，盖茨就会拿走多少”。注这句话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处理器能够提供多高的性能，软件都能够将它们统统“消化”掉。在计算机行业内，重要的事情是新的应用程序。正是有了这些应用程序，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才使得人们能够以新方法做很多之前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完成的事情，能够以新方式处理信息，很多之前必须花钱请别人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用电脑来完成。之前的很多活动，现在都可以用电脑来做。很多人的技能在电脑面前贬值了不少。人们有了很多打发时间的新方法，而且在电脑上，甚至能告诉全世界自己有时间打发。

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技术毁灭的工作与创造的工作之间的比率是非常高的。服务类工作、办公室类工作、收银员、客户经理、销售员等工作都会在数字革命中受到冲击，因为借助电脑就很容易完成这些工作，这些人就显得很多余了，就很有可能失去工作。这就相当于在大萧条时期因为农产品过剩而“失业”的马一样。但这个过程并没有

就此打住：数字平台节约了成本之后，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很多新方法的形成扫除了技术障碍，因此，在新方法面前，很多失业者不仅找不到工作，而且还显得非常落伍，他们的技能非常狭隘，无法找到新工作，换句话讲，他们似乎找不到用武之地。

创造性破坏就是一把双刃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生活水平的确上升了，创建、处理、共享和交流信息的成本也不断下降。音乐、电影、阅读、写作、聊天和调情等活动都可以借助电脑来完成，而且你可以在一瞬间里联系到世界各地的人。所有这些活动都具有普遍适用性，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戈登认为，与人们免除了每天都得从井里提水的痛苦相比，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但科技带来的便利与人们对于水的需求并不具有可比性。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人们会利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免费发短信，因为这项服务没有价格，无法以价格为基础进行价值评估，用教材上的术语来说，就是消费者盈余无法确定。一项没有定价的服务肯定不会被经济学家们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过程。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工作都可以通过电脑来完成，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生活标准大幅下降。这是古典经济学们家着重强调的结果。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虽然这些科技浪潮的受害者可以免费通信、看新闻、下载歌曲、看电影、看世界各地的比赛或听世界各地的广播，但对他们来说更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必须有一个放置电脑和接入互联网的房子，但他们的收入太低，根本无力承担买房子，甚至租房子的费用。

在科技浪潮的冲击下，很多经理、收银员、秘书、电视修理工、书店从业者、记者、照相馆的技术人员等纷纷失业。之前本该供养他们的那部分资金纷纷流向了那些能够驾驭数字技术浪潮的技术人才。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针对美国

各县的收入及纳税记录的研究表明，在1994年至2000年之间，只有15个县是名副其实的“造富县”，其中一半的县来自纽约州、硅谷和华盛顿州。除了这些造富县之外，美国其他地区并没有呈现出多少造富效应。美国股市在2000年之前给那些借助科技股泡沫、追随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飞涨至5 000点的科技人才与风投人才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关于这一点，我在《财富不平等与社会不稳定：在大危机来临之前的世界经济研究》一书中已经分析过。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虽然华盛顿特区周围那些军工企业聚集的县的收入水平增长非常迅速，并且后来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房地产投机活动猖獗的地方收入水平增长得也很迅速，但科学技术革命仍然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技术革命中，失业人员为企业“节省”下来的现金流中，有一部分没有立即找到“出口”。很多企业以前能雇得起一大批人，在科技浪潮面前，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再加上产能过剩，不需要原来那么多人，纷纷开始节约成本，这必然意味着裁员，意味着一些人失去工作和收入，意味着很多人才被浪费。不仅很多人失业，以前为这些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人也受到了拖累而失业，以前的很多经济活动现在也都消失了。因此，新技术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失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身边的数码产品导致我们失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具体是多少呢？要说出一个确切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你无法区别一个工作岗位是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的，还是由于企业不景气而消失的。事实上，这两者是一码事。考虑到商业周期的性质，企业肯定会遇到不景气的情况，这时注定要削减工作岗位，或者破产倒闭。因此，我们将丧失工作岗位归因于企业不景气。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经济恢复时，就业岗位也应该再次出现，但实际上却没有。当经济开始恢复时，企业发现在下一轮投资中，在下一轮业务规划中，只需要较少的员工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我认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和商科学生发表的学术著作混淆了这些问题。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技术专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2011年出版的《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书中认为，技术变革速度加快是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原因所在。但如同戈登技术变革速度放缓的观点一样，埃里克他们提出的观点证明起来也很难。但技术变革的速度无论是加快，还是放缓，都不是节省劳动力的必然原因。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在决定是否要雇用一个新员工，或雇人取代一个即将离职的员工时，主要是考虑经济利益，如果借助机器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购置机器，而不是雇用员工。机器就像从前的马一样，不需要企业交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甚至不需要工资。当这些成本上升时，即便技术的成本没有进一步降低，或者技术的作用没有进一步强化，机器的吸引力也仍然会越来越大。

关于是否有可能准确地衡量1979年以来技术变革对工作岗位变化的影响，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过讨论。在2013年末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舍尔（Lawrence Mishel）、海蒂·希尔霍尔茨（Heidi Shierholz）和约翰·施密特（John Schmitt）在研究了各种观点和证据之后指出，技术变革对于中等收入工作的影响并不重要，因此，对于工作岗位两极分化的影响也不重要。他们准确地指出工作岗位的严重流失和就业结构的重大改变发生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于2000年达到顶点之后，但当时受到冲击的主要是高薪工作岗位。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各种类型的工作岗位都受到了冲击。

但我觉得米舍尔及其同事提出了这样一个推论，即2000年以来的失业主要是由低速增长和大萧条造成的，我觉得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萧条给企业制造了很多新困难。在此之后，企业在决定是否雇用新员

工时，考虑的因素就不同于以往了。与遭遇萧条之前相比，企业将更大力度地发挥新技术在节省劳动力方面的潜力。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私营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会越来越少。这样一来，私营部门的失业人员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减少。这些人在失业之前还能找到用武之地，利用自己的能力维持生计，但现在他们发现没有公司需要自己提供的服务了。就业率下降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也会随之下降，与其说这是因为社会总需求减少，还不如说这是因为那些企业没有找到扩大就业的门路，导致失业者丧失了购买力。

这并不是在贬低数字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数码产品，而且与之前的技术相比，这些数码产品基本上都是免费的。数字技术有利于节省资源和削减成本。企业必须控制成本，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方法来帮助那些失业者维持一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能够付得起看病和孩子上大学所需的费用，那么数字技术带来的这些好处就更有价值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再用老式按键电话，也不愿意跑到邮局去寄信，虽然这些商品或服务仍然存在，但有多少人愿意用呢？如果我们怀念倒闭的书店，为停刊的报纸感到遗憾，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获取信息的最佳途径，而是因为当前我们通过浏览网页就能舒适、愉快地获取信息。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期间，正值石油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机械取代了役畜，导致美国很多牧民、农民以及马车制造商丢掉了工作，这些人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情景呢？起初，这简直是一个灾难：数以百万计的人找不到工作，坐着火车或卡车，来到了“胡佛村”[注]的营地。后来就出现了罗斯福新政，雇用了数百万人从事公共项目建设，重建这个国家，这种情况从1933年持续到了1936年，在此期间，失业率从25%降低到了10%

以下。再后来，到1937年和1938年，经济开始紧缩和衰退，开始实施第二轮新政，之后便是战争动员。

战争完全解决了失业问题。但总体来讲，战争创造的工作岗位并不是集中在生产环节，而且士兵和武器制造商并没有促进消费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战争期间，新的商业投资和很多非军需物资的生产活动都停止了，以便储存战略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战争并没有为下一代人留下多少新的资本设备，而且已有的设备磨损严重，没有得到良好的养护，因此，在战争期间的损耗速度比和平时期快得多，等到战争结束时，很多设备往往已难以继续使用。坦克、大炮与军舰几乎无法用于民用目的，大多数飞机都损耗得非常严重。但在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人口数量却大幅增加。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促进兴建公共工程，促进就业，提升民众的购买力，这种情况维持了15~20年左右。这为一种新型经济的形成奠定了金融基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经济基础顺利地从制造业转变为金融业。到20世纪60年代，石油革命的毁灭作用基本上已经宣告结束。当时，乡村地区变得空空荡荡，铁路运输量严重收缩，家庭壁炉用来取暖的煤炭使用量大幅缩减，用来从事耕作与运输的马匹早已被淘汰。

接着，美国经济迎来了连续多年的增长期。在此期间，就业率得到了保障，并且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以石油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以石油为基础的商品与服务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促进了生产活动的繁荣。此外，过剩的煤炭用于发电，降低了电价，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轿车、卡车和飞机的发展，郊区的建设以及家电行业的发展，都促进了就业率的提高。无论从绝对角度，还是从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就业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虽然古代以马和犁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形态的崩溃，以及近代以铁路和有轨电车为代表的技术都曾经引发了大规模失业现象，但石油经济对就业率的提升幅度要大得多。

两种力量促进了就业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第一个是在“二战”结束后，女性开始退出劳动力队伍，这对于那些职业男性而言是一个好消息，有利于减少他们在找工作时面临的竞争。但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多，意味着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社会需要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也就越来越少。同时，家庭首次成为有效需求的源泉，而且家庭需求的规模非常大。很多之前不需要支付酬劳的劳动，包括马匹的劳动以及妻子和孩子的劳动，现在都可以通过机器或通过雇用他人来完成，都变成了现金经济的一部分。随着各式各样的机器逐步取代了家庭劳动，国内生产总值也在这个替代过程中一路高涨。最后，房子成为制约人们提高购买力的一个堡垒，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们挣钱的能力与支出的需求分离开，即支出规模并不取决于你的收入规模，有些大额支出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这些趋势开始逆转。首先，企业在制造新型数字产品过程中，所需设备的价格迅速下降（以单位产出的成本计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价值。其次，数字产品取代了一些可以用来营销的产出。比如，通信、信息、教育、娱乐以及零售等产品与服务之前都是按照单位成本预付费用的，但现在却可以免费获取。它们仍然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甚至其作用比之前还要大，但经济增长核算过程却忽略掉了它们。这些活动可以免费获取之后，再也无法为人们创造收入，也无法创造工作岗位，因此，当我们在核算所谓的经济增长时，自然会忽略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技术既节约了劳动力，也节约了资本，这或许能解释当技术分散之际，为什么平均每一位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不降反升。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而且在核算过程中又忽视了获取先进技术所需的成本，而不是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与就业人数的增加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同时，在20世纪50—60年代推动人们组建家庭的力量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逆转，因为当时养育孩子的成本比较低，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新一代美国人早已发现养育孩子的费用非常大，如果不生孩子，就可以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因此，生育率不断下降，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在求职过程中，她们不会习惯性地屈服于男性，而是与男性展开了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工作的渴望与工作机会的减少就发生了矛盾。

20世纪40年代的金融奇迹有利于美国打造一个新的技术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在20世纪50—60年代终于成形。“二战”结束后，在三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中产阶级先后经历了有资金状态、有房但负债状态以及无资金也无力偿债的状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偿还债务将是必然的选择，而要偿还债务，提高就业率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在这方面，没有捷径可走。在20世纪40年代，战争为提高就业率提供了捷径，但现在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就业率徘徊不前的局面将持续多年。唯一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动员人们推动能源利用模式转型，摒弃化石燃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转而采用替代能源。但到目前为止，替代能源的定义还比较模糊，而且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方案去做这种事情。目前，像战争动员、罗斯福新政这些能够大力推动就业的动力之源已经枯竭，其他一些替代性的动力之源，比如出口、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力量都太薄弱，无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学家们对创造性破坏的正常反应都是不以为意，认为情况会好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假定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如果发生了萧条，之后肯定会出现复苏。现代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将一切问题归因于需求不足，认为更多的支出总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因此，经济学家们总是分成两派：一派是宿命论者，他们敦促人们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下随遇而安，耐心地接受现状，情况自然会好转的；另

一派是“干预派”，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他们敦促政府出台刺激措施，认为政府加大支出之后，工作机会自然就会接踵而至。

简而言之，对于这两派的观点，我们都有理由提出质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的观点值得质疑之处在于，技术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不会自发地向前推进。一种技术的影响范围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其自身的特征。新的数字技术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做出切实的贡献，更在于削减经济活动的成本，抢占上一代技术的市场份额。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观点值得质疑之处在于，人们不能仅仅依靠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增加支出来创造就业岗位，因为如果你给消费者更多的钱，那么在当前这种手头拮据的情况下，这笔钱的主要用途肯定是偿还债务，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消费者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如果给企业更多的钱，这笔钱的主要用途可能是研发新技术，进一步节约劳动力。如果给银行更多的钱，那么在缺乏资质优良的贷款人或者缺乏良好的商业前景时，这笔钱可能沉睡在银行中，不发挥任何作用。

回头来看，从技术和物理角度分析，可以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廉价燃料的兴起，机械文明、工业文明和电器文明的兴起，金融业的繁荣等等，都为美国的繁荣创造了机会，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二战”对美国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的收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类似的、重大的偶然事件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们仅仅发生了一次，而且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期待它们再次发生。

---

1. 格鲁夫是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盖茨是微软的创始人。在过去的20年里，英特尔处理器的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运行得越来越慢，所占内存也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虽然比10年前快了100倍，运行软件感觉上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译者注

2. 胡佛村指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设立的失业工人及流浪汉的收容所。——译者注

第九章
金融诈骗的后果

新闻工作者们在描述金融危机时，金融诈骗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比如，贝萨尼·麦克莱恩、乔·诺塞拉、马特·泰比等都曾经发表过这方面的作品。金融诈骗也是凯瑟琳·恩格尔和帕特里夏·麦科伊等法学学者们重点研究的领域。

同时，与金融诈骗有关的内容还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以及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出现，尼尔·巴洛夫斯基、希拉·贝尔等高级监管者的回忆录中也随处可见。美国2010年推出的一部名为《监守自盗》（*Inside Job*）的纪录片也极为严厉地揭露了金融诈骗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因素更有可能是金融诈骗，而不是能源、战争或技术变革。

在金融行业中，单纯从词汇的构成方式来看，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诈骗在业内的重要角色，从而令人产生警惕。比如，“骗子贷款”和“忍者贷款”指的就是贷款人无收入、无工作且无资产的不良贷款。“中子贷款”（neutron loans）指的是贷款可能会“爆炸”，但这里的“爆炸”毁坏的是人，而不是建筑，即杀死全体居民，留下了一幢幢住房。“有毒废物”（toxic waste）指的是在市场情况良好的时候，资产的不良影响被掩盖，但在危机时期就会爆发出来。这是一个没有绝对诚信的行业，提到这些词，就像人们把餐馆提供的食物说成了“泡沫、污水和淤泥”。

换个角度来分析。想象一下，在21世纪初，数以百万计的文件被标上“抵押贷款”的标签，主要表现方式为“2/28混合利率产品”（即前两年是固定的低利率，后28年利率浮动）、“3/27混合利率产品”（即前

三年是固定的低利率，后27年利率浮动）、选择性可调息贷款、简易贷款、无收入证明贷款等。这些贷款是正常意义上的抵押贷款吗？根据人们对抵押贷款的普遍理解，抵押贷款是分期偿还和由不动产支撑的长期贷款。由此来看，这些贷款算不上真正的抵押贷款。那么它们是什么呢？“伪贷款”或许是一个完全合适的词语。

“伪贷款”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古老的行当。“伪贷款”若要有效运行，必须包装成稳健无风险的新资产，掩盖其真实来源，并承诺这些新资产是诚信的，普通投资者根本无法估量其风险。这个过程也被称作“漂白”，是一些金融机构为次贷披上合法外衣的有力工具，能够使这些“伪贷款”转化为类似于美国国债的评级为AAA的安全资产，却比国债更有利可图。对于评级机构来说，这项业务已经占据他们总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变成热心的同谋者，就没有必要再去调查上述贷款的质量。

如今，当出现漂白而来的“伪贷款”后，必须马上抛售。这个操作就是“销赃”，等着下一个人接盘，而下一个人并不知道货物的最初来源。“销赃”是诸如贝尔斯通、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高盛、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商业银行或者投行的任务之一，最后一个买家或许可以称为“接盘侠”。这都是什么人呢？是无法直接检查产品质量的外国投资者，他们通常选择投行或者评级机构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比如，迈克尔·刘易斯在《大空头》这本书中记录了两位银行家的对话，其中一位银行家询问究竟是谁在购买自己的产品，另一位银行家说大部分买家来自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

凯瑟琳·恩格尔与帕特里夏·麦科伊这两位法学教授在《次贷病毒》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他们居住在克利夫兰市，通过对当地社会的观察，他们对研究次贷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下内容是他们关于次贷运作方式的描述：

经纪机构和放贷机构完善了营销策略，以期寻找天真的业主，欺骗他们申请次级贷款。一些机构雇人给业主打电话，看看他们是否对新的抵押贷款感兴趣……经纪机构和放贷机构……到市政厅查询文件资料，看看哪些业主违犯了住宅法，因为他们笃定这些业主需要现金来修复自己的房子。他们阅读当地的讣告，找出那些刚刚失去丈夫的老太太，因为他们猜测寡妇在财务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他们还根据消费品交易情况来寻找潜在的贷款者。比如，在弗吉尼亚州，没有读写能力的本尼·罗伯茨（Bennie Roberts）就依靠臭名昭著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第一联合资本（Associates First Capital）提供的消费信贷在路边摊买了大量牛肋肉，又买了100磅其他的肉。在与罗伯茨先生交谈的过程中，第一联合资本的放贷员了解到罗伯茨先生还没有住房抵押贷款，便很快说服了罗伯茨，将他发展成了一个新客户，罗伯茨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从第一联合资本申请了抵押贷款。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第一联合资本通过抵押贷款再融资操作，获得了10倍的再融资，高达45 000美元，而其中19 000美元都变成了第一联合资本的手续费。

恩格尔与麦科伊又举了一个例子：

在克利夫兰，鲁比·罗杰斯（Ruby Rogers）有一套无贷的房子，这是她从叔叔那里继承过来的。当地一家名为Citywide Builders的建筑承包商帮助她获得了美利凯斯特抵押贷款公司（Ameriquest Mortgage）的贷款，以修缮房子。在6个月的时间内，该建筑公司安排对罗杰斯的房子进行重复再融资，最后再融资规模达到23 000美元。在这个金额中，罗杰斯只拿到了4 500美元。同时，该承包商做完了价值3 200美元的工作之后就停止了。罗杰斯女士的屋顶仍然漏水，瓦片仍然脱落，护墙板仍然扭曲着，墙上还有个洞。在该承包商破产之后，美利凯斯特抵押贷款公司便起诉罗杰斯，要求取消她的抵押品赎回权。

在《众魔在人间》这本书中，《财富》杂志的记者贝萨尼·麦克莱恩与《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瑟夫·诺塞拉讲述了美国ACC资本控股公司的故事。该公司是罗兰德·阿诺尔（Roland Arnall）于1998年创立的，是美利凯斯特抵押贷款公司的控股公司。美利凯斯特抵押贷款公司在2004年达到了巅峰时刻，放贷规模高达800多亿美元。

关于放贷的方式，他们写道：

> 阿诺尔继续采用他的旧剧本：他向那些最终无力偿还贷款的人提供贷款，并将这些贷款卖给华尔街……管理层的薪资很高……那些放贷人员的基本工资虽然低，但是他们获得的佣金很高——基本上能得到个人总收入的15%。此外，他们能获得很多额外津贴……一位原公司职员说："公司花的钱多得惊人。"

然后，他们又写道：

> 2003年1月，对美利凯斯特恶劣行为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公司雇用了一位在抵押贷款方面经验丰富的人埃德·帕克（Ed Parker）来调查部门中的欺诈行为。帕克说，最初他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做正确的事情。第一次调查时，在看了2 500份贷款文件之后，他发现所有放贷人员都依赖于少数几个估价员来抬高资产价值，于是他关闭了这家位于密歇根的分公司。欺诈并不是隐蔽行为，文件中甚至指明了需要估价员给出的价格。

最后，他们以该公司一位前放贷员在网上发表的一篇忏悔文章总结了美利凯斯特的故事。这位前放贷员名叫克里斯托弗·沃伦（Christopher Warren），曾经供职于该公司位于萨克拉门托市的办公室。他在文章中写道：

> 高管和经理人教我各种各样抵押贷款欺诈的套路，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毒品、性和金钱。我的朋友和高管向放贷员分发冰毒来使他们保持兴奋状态，从而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为了将贷款卖给基金公司，一半以上的员工在篡改文件，3/4以上的员工在造假文件……送给新进员工典型的礼物是剪刀、胶带和涂改液。

2008年，罗兰德·阿诺尔死于美国驻荷兰大使任上。小布什总统于2006年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也支持这一任命，因为马萨诸塞州州长、美利凯斯特抵押贷款公司董事德瓦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出示了一份证明信，证明阿诺尔的优势。

2005年前后，在美国次级贷款行业中，诈骗、滥用职权、篡改文件和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2007年11月，惠誉评级公司（Fitch Ratings）就这个问题发布了一篇报告——《不良承销行为和欺诈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影响》。这篇报告首先分析了一些看似具有优良贷款特征（比如信用评分高）的抵押贷款案例，然后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调查。结果表明，欺诈是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的一个重要原因。报告指出："基点分析公司（Basepoint Analytics LLC）——一家专注于分析欺诈行为并得到广泛认可的公司——分析了1997—2006年（多数是2005—2006年）的300万个贷款案例，其中有16 000个是不良贷款，这些案例在最初的申请表中就存在欺诈陈述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发现高达70%的早期支付违约案例，即在贷款发放后6个月以内的违约案例，在其最初的申请表中都存在欺诈陈述。"

惠誉评级公司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惠誉选定了45个次级贷款的案例。这些案例中，未偿贷款与房屋价值比率（CLTV）都比较高，客户在申请贷款时也提交了关于自己收入的材料，其中很多人之前就有过违约经历。我们尤其选取了一些信用评分较高（650~770）的购买交易案例，因为如果客户从事过信用评分较高的购买交易，就意味着客户违约的风险比较低。惠誉的分析师们对一

套套申贷文件和还款记录进行了独立分析。委婉地说，分析结果令人不安，因为几乎每一份文件都存在欺诈陈述或失实陈述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妨说，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普遍存在的金融欺诈阴谋，数以百万计的抵押贷款都是根据欺诈性材料发放出去的，而这些贷款能否收回来则完全取决于房价是否会继续上涨，取决于贷款者转卖房子时是否能够赚到一笔钱，因为这些贷款者的收入偏低或不稳定，信用记录很糟糕，或者根本不存在信用记录。他们所住房子的价值被刻意高估，高于当前市场价值，以此获得更多的贷款。发放给他们的贷款然后又被包装一下，卖给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这一过程被称为“债权超额抵押”，其目标是为衍生证券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提供支撑。对于这些证券的大型买家（尤其是银行）而言，违约风险又进一步被购买信用违约互换掩盖。从艾伦·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到司法部等监管者，本该对这个过程加以干预，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事实上，原本还存在一些能够限制这种做法的壁垒、保护措施和法律法规，但最后也被监管者取消了。最后，这些证券被包装好之后，就开始出售了。由于它们信用评级高，且券息看起来挺不错，因此，在世界各地都有人愿意购买这些证券。

然而，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危机时，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很少讨论“欺诈”这一话题。在拉古拉迈·拉詹的《断层线》一书中，“欺诈”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保罗·克鲁格曼在2012年出版的《现在终结萧条》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到“欺诈”这个词，只是在描述20世纪80年代储蓄信贷行业的环境时做出了类似于“欺诈”的描述：“松懈的监管为猖獗的盗窃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资金被贷给朋友和亲戚，而他们拿到钱后却消失了。”

关于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环境，克鲁格曼如是说：

> 我们知道资产担保证券的销售——也就是银行将大批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出售给不知情的投资者的做法……刺激了盲目借贷。贷款抵押证券基本上是对坏账进行层层包装的结果，起初都能获得3A的信用评级，吸引了一批容易受骗的投资者，而一旦经济形势恶化，这些资产通常变成了后来为人所知的“有毒资产”。信用违约互换导致银行误以为自己的投资是安全无忧的。

“盲目借贷”、“坏账”、“容易受骗的投资者”，克鲁格曼所用的措辞看似很强硬，但与那些非常仔细认真的经济观察人士的说法相比其实非常弱，弱到了接近于“失实陈述”。

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落体》一书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用了更多的篇幅去讨论银行的错误做法，在很多地方提到了金融欺诈。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抵押贷款骗局”，还有一章的标题是“美国大劫掠”，但这两章几乎没有对诈骗的根源进行深刻分析。斯蒂格利茨使用了“胡闹”（mischief）一词去描述银行家的行为，指责他们贪婪、“利用”弱者和穷人。下面是他对金融体制失灵所做的五点总结：

> 第一，虽然激励很重要，但社会效益与个人收益存在系统性的错配……第二，某些机构变得太大而不能倒闭，但要救助它们，成本又太高……第三，大银行从普通银行业务转移到了证券业务，证券业务虽然有一些优点，但必须谨慎管理……第四，商业银行试图效仿投行所做的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高级复杂融资行为……第五，太多银行家忘记了自己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公民，不应该把最贫困、最脆弱的人作为自己的猎物，美国人相信这一点是社会的支柱，而社会必须以道德良知为基础。

忘记自己应该做一个具有“道德良知”的“负责任的公民”，斯蒂格利茨的措辞听起来也很严厉。但要注意到，即便措辞严厉，这一段也没有出现“犯罪”这个词。

按照美国政界的标准来看，拉詹属于保守派，而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茨属于自由派。他们在金融欺诈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他们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如，美国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2012年出版的《无休止的危机》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视角出发，在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这两位上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基础上分析了这场危机的根源。如同马克思主义学派很多至今早已被人遗忘的先驱们一样，这两人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无外乎资本主义的未来只能是经济停滞，而不是无限的增长。这种结论与之前历代先驱的看法没有什么区别，指责他们是画蛇添足也不为过。在分析过程中，他们也没有提到金融欺诈的作用。

这么多人以轻描淡写的态度对待这场危机，不愿意将金融欺诈与犯罪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不难理解。这些人都与金融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需要直接为此乱局负责的业内人士，要么是金融机构的董事，要么是业内人士的朋友或熟人，要么为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不那么严厉地描述这场危机，是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曾经供职于政府监管机构，正是因为他们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才出现了这种乱局。因此，他们要么是“同谋”，要么是“旁观者”，要么是监管机构内部曾经反对放松监管却遭到忽视的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一定要弄清楚究竟谁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而是要分析几个问题：猖獗的欺诈行为是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吗？要解释金融危机，能否绕开“欺诈”这个话题？正视金融欺诈的作用，有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恢复吗？处理好欺诈问题，是实现金融稳定和进步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梳理和区分一下三类经济学家的观点。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欺诈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现实情况在那儿摆着，他们也不能否认金融体系内部的确存在欺诈和犯罪行为。但他们的基本立场迫使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淡化欺诈行为的影

响，宣扬市场在总体情况下是有效的信息载体和传递者，是很难愚弄的，因此能够准确地确定资产价格和评估风险。他们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当前这种经济环境下存在着大量的反面证据。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在这场危机之前，金融诈骗无处不在。在某种程度上，在抵押贷款和相关衍生品市场上，几乎所有交易都存在欺诈，而市场往往倾向于奖励，而不是惩罚那些做出欺诈行为的人，那些成功地对自己的业务做出虚假陈述的公司往往能够揽到更多资金。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很多诚实的公司被迫出局。因此，如果承认了现实，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就会遭到毁灭。所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竭力淡化欺诈在危机中的作用，是因为这种做法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凯恩斯主义者并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当前的辩论中，他们发现自己与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等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成了盟友。罗伯特的代表作是《重新发现凯恩斯》（*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保罗的代表作是《凯恩斯解决方案》（*The Keynes Solution*）。即便他们承认欺诈的存在，并强烈要求起诉有关罪犯，也不至于承担什么风险。但他们的立场是，财政或货币的扩张足以结束这场危机催生的萧条。克鲁格曼摆出了凯恩斯1930年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观点："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关键不在于经济引擎，这个引擎的动力一如往常。相反，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技术问题，即组织和协调的问题，即凯恩斯所说的'巨大泥潭'。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经济体就会迅速恢复活力。"金融体系内存在的系统性、普遍性的欺诈行为严重挑战了克鲁格曼对金融体系的乐观评估。但事实上，即便真如克鲁格曼所说，问题的根源不是出在经济引擎上，而仅仅依靠政府之手下一剂猛药，或许也解决不了问题。

在明斯基那一派学者看来，欺诈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明斯基本人把金融活动彻底崩溃前的那个阶段称为"庞

氏骗局”阶段，但同时指出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而是认为庞氏骗局阶段是投机活动不断加剧的自然结局。由于承诺的回报率远远超出正常融资的成本，因此，只有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以致债务累积越来越多，潜伏的危机越来越大。只要不露馅，这种情况就能一直持续下去，一旦投资者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就会面临惨重的损失，除了停止贷款之外，别无选择，从而加快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崩溃之后，监管者会再次变得警觉起来，金融体系也会再次复苏，也许复苏的速度慢，但最终会再次走向信贷扩张的阶段。

因此，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现实中的欺诈行为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无论金融体系内出现犯罪行为的概率是大还是小，金融体系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最终都会走向崩溃。因此，明斯基模型预料到并且能理解金融体系中的不当行为，但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些不当行为视为犯罪，没有必要考虑具体的欺诈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只是提出了总体上的观点，而不深入探讨具体的欺诈案例，他们预见到了资本主义会发生危机、滞胀，甚至崩溃，但也认为没有必要分析具体的欺诈行为。因此，在经济学界，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立派，都轻描淡写地分析欺诈行为，将欺诈行为视为犯罪似乎成了一个“禁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欺诈行为产生了特别大的危害，所有人都蹊跷地选择了睁只眼闭只眼。

之所以出现这种禁忌，一个原因似乎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厌恶组织经济学。组织经济学，或者说制度经济学，阐述的是一个企业在哪些条件下会成功，以及在哪些条件下会失败。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失败并不仅仅是由外部竞争导致的，也可以由内部因素引起，但“有效市场假说”等主流经济理论并不考虑这种可能性，自由主义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家们也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他们都是把公司视为一个理性的、致力于实现某个目标（比如利润或增长）的市场行为体，这样一来，大大简化了有待分析的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世界观，在分析公司崩溃的原因时，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内部因素排除在外，充其量只是认为内部因素发挥着次要作用。

然而，组织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明显的问题。一个成功和持久的组织必须有目的、有纪律。这需要管理者社会化的思维，他们必须在不断学习中了解自己的角色，致力于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既要在合理的安全范围内运作，又不能完全扼杀建设性的行为或冒险的行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一个发达的社会和一个落后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有能力推进社会的专业化、职业化与合作，又能对社会实行必要的限制，而后者不具备这种能力。

要想打造一个持久的公司，必须对它们以及它们的竞争对手加以监管。在一个由大型公司主导的经济体内，要确保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必须创建系统的法律、监管、监督和道德，从而产生有利于促进公共利益的行为模式，同时也能满足有关私人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合理目标（这种目标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限制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认真考虑，即必须抑制那些掠夺型公司，即“伪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似乎与其他公司拥有相同的技能和能力，但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公司可以迅速占领市场，用明显的金融成功吸引资本，市值迅速提升，且能通过并购扩大规模。

正如犯罪学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ck）所指出的那样，从逻辑上来讲，没有欺诈，大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归根结底，在这场危机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住房贷款。但在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之后，房地产业一直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住宅自有率已经非常高。按照之前的信贷和承销标准，住宅自有率不可能快速增长。这个行业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放松这些标准。这必然意味着寻找之前没有资格的借款人，而且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增加了可以放贷的资金规模。优质贷款市场已经饱

和，但不良贷款市场（不会偿还的贷款市场）实际上是无限的，顾名思义，这个市场上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限制，缺乏有效的法律和监督。

在2005年出版的《抢劫银行的最佳办法就是自己开一家银行》（*The Best Way to Rob a Bank Is to Own One*）一书中，布莱克对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提出了“控制者欺诈”的概念。在研究制度经济学时，他的观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非常值得参考。他的理论认为，一个组织最容易遭到管理者的蚕食，蚕食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给管理者发放过多的薪酬。此外，还存在一些较为神秘的机制，可以帮助这些管理者将更多的资金装入私囊。如果置之不理，那么管理者的欺诈行为就会愈演愈烈，管理者假公济私的金额就会超过这个组织能够从竞争环境中获取的金额。到这个地步，这个组织就支撑不下去了，只有求助于会计造假了，而这种情况一旦被揭露出来，这个组织就崩溃了。因此，布莱克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就是：管理者欺诈最终往往会以失败而告终。

高管薪酬通常采用股票期权的方式，但这是滥用权力的体现。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众多高管的薪酬主要是在牺牲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无论是股票期权，还是其他方式，都无异于在盗窃投资者的财富。这类做法在短期内并不会榨干公司的资源，但导致高管们逐渐脱离了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和经理们，因为无论公司未来是否成功，高管们都能攫取重大利益，没必要去关心公司的长远发展前景。事实上，他们内心肯定希望自己在公司彻底倒闭之前就溜之大吉。

一个组织内部的确会存在这种系统性的欺诈行为。这种行为的一个代名词就是“抢劫”。这种行为有别于针对工人、客户、投资者或其他外界有关人员的欺骗行为。我们可以认为“抢劫”是明斯基所说的过程中的第四个阶段，仅位于“庞氏骗局”阶段之后。回想一下，明斯基认为，即便债务人没有犯罪意图，“庞氏骗局”阶段仍然会出现。当债

务人只有通过不断增加贷款才能偿还前期贷款的利息时，“庞氏骗局”自然就出现了。当债务人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时，就会被迫向外界撒谎，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是尽量维持骗局不被揭发。即便个别投资者发现自己身处“庞氏骗局”之中，却只能承认自己投资的失败，为了能够收回更多的成本，只有默许债务人的犯罪行为，纵容其继续行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一旦高管们发现自己抢劫公司的行为显然不会带来任何后果，那么抢劫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行为。到这时，虚假陈述开始增加，逐渐达到了刑事犯罪的程度。法律风险是固定不变的，高管们抢劫得越多，最后得到的就越多。此外，公司注定会倒闭，唯一的问题是，剩下的公司财产归谁？法律规定了公司破产时的优先清偿顺序，优先的、有担保的债权人肯定最先获得清偿，次级的、无担保的债权人肯定排在后面。但债权人只能得到公司内部的高管尚未掠夺走的财产。这样一来，高管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抢劫公司呢？高管抢劫之后，毫发无伤的概率往往比较大，即便被抓，付出的代价也总是远远低于抢劫到的财产。

在金融公司，抢劫公司的诱惑是始终存在的。公司本身的业务无非就是操纵金钱，利用别人的信任去压榨别人。为了金融欺诈，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故意诱使客户签订一些注定不能履行的合同，或者打着合法经营和风险合理的幌子，诱使客户采取投机性质的投资。工程师的欺诈行为可能会导致撞车，化学家的欺诈行为可能会导致核反应堆熔毁，医生的欺诈行为可能会导致药物致人死亡，因此，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士必须具有高度的职业操守，在内心世界给自己树立严格的标准。而在金融公司，一切都是围着钱转，欺诈行为不会导致上述这些危害性过于直接和明显的后果，这就刺激了金融业工作人员欺诈客户。因此，在金融领域，采取一些控制和制衡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公司内部高管或者公司外部的监管机构削弱或解除了对金融公司的限制措施，灾难性的后果就会接踵而至。

这样一来，金融领域又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销售优质证券反而不如销售劣质证券有利可图。有些非常有能力的人专心致力于销售劣质证券。很多公司最初并不是注定要倒闭，但被一些高管接管之后，逐渐走向了倒闭的边缘。这些高管扮演着抢劫者导演的角色，指挥着自己手下的人肆无忌惮地抢劫公司财富。这些领导者们练就了一身能够不断促进和延续自身成功的抢劫技能，培养了一批忠诚的、收入丰厚的员工，与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和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的人脉关系去恐吓或收买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人。

那么，能否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金融欺诈呢？金融管理和监督的作用就是提高金融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同时让他们畏惧潜在的惩罚，在强大的诱惑面前保持良好的行为方式，防止他们在诱惑重重的环境下走向堕落。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就是防止诱惑太大，另一方面要及时发现和严厉惩处欺诈者，但不能把一些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吓得不敢进入这个领域。

欺诈行为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体系内。如果政府在监管方面投入了足够多的精力，那么就能及时发现欺诈行为，而有时候，不需要通过政府的努力，这种行为也会不经意间暴露出来。然而，要发现这类行为，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曝光就涉及风险。不受惩罚的欺诈是一种威胁，而充斥着错误指控的氛围则是另一种威胁。如果在查处欺诈行为方面的热情过于高涨，那么可能会极大地破坏从业者的信心，抑制经济活动，遏制合理的商业冒险行为。监管部门的目标就是（而且应该是）让银行家们既不能因为畏惧惩罚而畏首畏尾，也不能让他们无所畏惧，认为法律管不到自己而堕落成“强盗大亨”。要有一条平衡线。究竟该多么严厉？又该多么宽容？如果有时候睁只眼闭只眼，让投资活动活跃起来，并祈祷尚未被揭发出来的欺诈活动不会变得太糟糕，是不是更好呢？

在日益兴起的危机史研究中，这些问题反复出现。前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美国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特别监察长巴洛夫斯基的回忆录表明，政府内部曾经有人意识到了金融欺诈行为的普遍性，并且政府机构内部在是否要采取措施的问题上经历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赢得争论的是主张袖手旁观的那一派，主要代表机构就是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输掉争论的机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特别监察长办公室。

胜出者的立场很清晰。他们认为，在危机爆发之前，除了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个案之外，不存在任何犯罪活动。司法部的做法也表明了这一点。要知道，在解决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时，1 000多名业内人士遭到了控告、起诉、判刑和监禁。但在当前这场大危机中，到目前为止，竟然没有一个大银行家遭到起诉。

鉴于这些事实，不由得令人想到了责任问题。政府机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故意“培养”了摧毁金融体系的骗子？如果它们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呢？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那场储蓄和信贷危机的肇事者遭到了惩罚，而现在这场危机的肇事者却得到了宽容，难道是当前的经济环境使然吗？难道政府本身也像明斯基与布莱克描述的那样存在“成功监管——放松监管——灾难”的循环阶段吗？

我认为，金融欺诈之所以会主导整个金融体系，是因为默许金融欺诈属于权宜之计，符合经济发展需要。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资源紧张给经济造成了很大压力，金融业的发展有利于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基础。

当经济赖以增长的资源非常丰富时，欺诈活动一般不会得到宽容，因为这种情况下，通过诚信手段获取利润的机会很多，那些致力于通过诚信手段获取利润的人会努力控制整个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他们必然赞成制定和实施惩罚欺诈行为的法律法规。然而，当资源稀

缺或昂贵时，企业通过诚信手段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融市场的预期利润率仍然保持在高位，那么欺诈活动就会成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就会成为行业的标准做法。简而言之，欺诈就是放贷者无力应对现实投资机遇减少时做出的反应。在信息技术繁荣时期，为了争夺稀缺的资源，欺诈就成了“可行的商业计划”。

2000年那次科技泡沫破灭之后，真实资源成本开始稳步增加，对于新的投资机遇，市场上弥漫着一种消极看法。这种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困难重重。哪一个经济体系的固定成本最高，对资源依赖性最大，盈利能力遭到的打击就最大。美国和欧洲南部边缘的国家就是如此。相比之下，在资源生产大国以及金融体系受到管制的国家，经济增长空间没有遭到挤压，也没有出现金融危机。

在增长压力与走向崩溃之间，对私营部门的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政府而言，存在两个选择，而这两个选择似乎都是正常的。第一个是获取新资源——通过借款或增发股票。这些做法的基础是不切实际的乐观预测和商业计划，希望未来会出现奇迹。企业为免遭破产而以高息“忍痛借债”，通常是利用了借贷双方之间的认知差距：借方知道形势非常严峻，而贷方可能不知道真实情况有多么可怕。或者说，这种借贷方式也是利用了借贷双方在对待风险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借方已经一无所有，而贷方可以承受一场赌博。无论这桩交易是如何达成的，都是一个绝望的赌注。

第二个选择是，当一个组织的控制者意识到已经无力挽救时，他们很可能会猖獗地抢劫这个组织内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可能只是出售资本设备，将所得收入囊中。或者他们可能采取更大、更复杂、更全面的欺诈手段，利用公司固有的融资渠道，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资金，同时维持公司或国家的名誉完好无损。当然，到这个时候，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简而言之，美国及其事实上统治的整个世界之所以能在“二战”后享受了长达25年的经济扩张，是因为稳定的管理机构、廉价的资源、冷战期间的核对峙创造的军事安全环境以及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学术界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对这种信心起到了小小的提振作用。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这种理论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此期间基本上是稳定和成功的。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相比，我们看到它受到了时间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诚信的企业也可以赚大钱，而且经济体系内部存在强有力的监管和严格的标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得益于强大的政治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公司里面也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但这种行为不可能发展到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容忍这种行为不会给政治大环境带来任何好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盈利的条件逐渐遭到侵蚀。虽然前几年的持续成功使得维持甚至提高盈利率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变成了衡量商业成功的基准，但进口成本和资源成本不断上升，为企业发展制造的障碍日益显著。客观条件的制约与传统的期待存在冲突。有些东西必须放弃，但人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期待。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资源成本再次受到打压，市场信心得到恢复，但这一次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实现的。这10年间全球收入差距的拉大，表明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可能被所有人平等分享。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进行了持续的市场管理模式创新，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放松对市场的监督与管理。监管机构公开声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但事实上这样一来牺牲了员工、客户和纳税人的利益，牺牲了诚信竞争。在金融行业，特别是在储蓄和贷款部门，这种创新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监管的缺失为金融欺诈的泛滥打开了闸门，以至于最后对整个行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虽然人们最后认识到了这些后果，并采取了一些抑制欺诈的举措，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蔚为壮观的科技创新浪潮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连续多年的繁荣。这股浪潮就是所谓的“数字革命”。在这股浪潮中，既有真正的创新和无限的热情，也有不正当、不体面、不择手段的欺诈行为。因此，很多人认为，对于这一时期，既可以将其解读为真正的繁荣时期，也可以将其解读为欺诈横行的金融泡沫时期。比如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伯特·布伦纳就持有这种观点。事实上，这两种解读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因为无论怎么讲，技术变革都是这个时期内一个强有力的元素，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过的那样，创造性阶段之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毁灭性阶段。与此同时，金融武器的威力逐渐削弱，在2000年之后，美国发现再也无法运用高利率去稳定外部金融环境。

因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21世纪前10年的情况。在这一时期，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之后，产生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就是资源成本再次上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军事优势再也无法为美国带来持久的经济效益。然而，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仍然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居高不下的盈利能力抱有深深的期待。一旦没有履行好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责，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承担相关的后果。比如，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小布什时期的经济增速比较缓慢，为其执政能力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样的环境下，推动经济增长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金融诈骗不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为了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而做出的选择。

历史学家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小布什总统与他的助手们是否明白这一点。小布什家族对金融行业并不陌生。1981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主持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解除了逾百条被认为过时的条例，并对其他条例做出修订，从而为美国放松金融监管创造了条件。老布什的弟弟尼尔·布什（Neil Bush）曾经担任Silverado储贷银行的董事，但该银行因金融欺诈行为猖獗而臭名昭著，并于1988年倒闭。不仅如此，2001年，也就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

司法部从联邦调查局抽调了500名从事金融欺诈调查的特工，去从事反恐工作。这一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令人费解的是，这些特工被抽调走之后，一直从事反恐工作，再也没有恢复原来的职责。2003年，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局长詹姆斯·吉勒朗（James Gilleran）在一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上严厉抨击联邦政府制定的一大堆证券承销标准，这为金融行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符合金融从业者的热切期待，即便反应最慢的放贷者也能明白其中的含义。此外，监管机构内部存在一种普遍的晋升模式，那些在储蓄与信贷部门工作效率最低的人反而会被委派到非常大的金融监管机构任职，尤其是在美国西海岸。那些扬扬得意、志得意满的领导者往往占据着其他顶尖的管理部门，包括美国货币监理署和美联储。美国金融业的欺诈行为其实是在顶级监管机构的默许下逐渐猖獗起来的，这样一来得到的回报就是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态势得以延续，在2004年大选前后以及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都是如此。

因此，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金融欺诈行为其实代表着一个高峰，这种现象自从1970年就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了下来。在日益艰难的环境下，这种行为对于维持经济增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由于种种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时期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这些做法成功催生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在这些时期内，良好的金融行为都曾经遭到践踏，但最终侥幸成功，没有受到惩罚，而到小布什时期，问题是欺诈行为太猖獗，他已经无法选择良好的金融行为，要维持经济增长态势，不得不依赖一些流氓式的机构，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也包括抵押贷款发放机构。世界其他国家误以为美国房地产业是健康发展的，而实情却并不是如此，那些申请抵押贷款的客户完全不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美国这些机构正是利用了其他国家的错误认识，把一些垃圾债券经过一番包装之后，卖给了其他国家。在苏联时期以及之后的俄罗斯，银行等战略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发现自己有机会抢劫自己掌管的机构之后，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劫机构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美国，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景。因

此，经济体只能踉踉跄跄地前行，直到完全无以为继时才停止步伐，一切将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一来，金融崩溃在所难免。经过漫长的衰退阶段之后，并没有像商业周期模型所描述的那样恢复所谓的“正常状态”，即增长状态。这是不足为奇的。“二战”后的经济增长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些模型再也不适用了。此外，凯恩斯主义者倡导的经济刺激也无法治愈经济痼疾。凯恩斯主义式的复苏赖以实现的制度、基础设施、资源和大众心理都不存在了。如果把经济体比作一辆汽车，那么问题并不是出在磁电机上，而是由于管理者的疏忽，长期没有给水箱加水，没有给齿轮箱添加润滑油，结果导致整个传动系统出现了故障，进而导致车辆无法运转。

这种情况下，仅仅加油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第三部分
常态不会回归

第十章
破裂的基线和失败的预测

2007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闯入公众的视线，银行间借贷市场瞬间萧条。金融危机不断蔓延、恶化，最终，到2008年3月，贝尔斯登濒临破产而被收购。自那时起，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实施了第一轮刺激计划。但这只是序曲。贯穿2008年春天、夏天和早秋，官方的论调始终是问题仍在可控范围内，经济不会大幅度放缓，用不了多久，经济就会回暖。总统大选也在一直围绕着选民利益的话题展开，民主党人就医疗改革的细节、总统候选人就伊拉克问题的辩论也一直僵持不下。而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国际集团陷入融资危机，房地美和房利美在2008年9月被接管。

市场陷入了恐慌。货币市场信托基金从投行撤资，而投行扔持有他们的债务。储户也开始转移资金，把钱存入更安全的银行。信托基金必须依靠总统的担保，而总统只好借助财政部的汇率稳定基金施以援手。随着储户纷纷从小银行转向大银行，存款保险的下限也要上调。从全球范围来看，获得美元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对银行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欧洲的银行。它们迫切需要美元来偿还此前在纽约以低利率借入的贷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使得外汇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和他的同事正竭尽全力帮助大银行度过危机。此前，这些大银行对资产的评估和定价过高，手中持有靠抵押贷款作为担保的证券，正面临陷入泥潭的困境。

一旦短期的恐慌情绪暂时得以平息，公众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会受到三种息息相关的主要因素影响。第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想要拿

到新的贷款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金融危机前那些唾手可得的贷款。第二，房产价值下跌，即便是原先想要通过房产抵押提供借贷的人也不愿意提供新的贷款。第三，恐慌和担忧依然存在。这导致房地产方面的投入大幅度下降（商业投资也是如此），生产、就业机会也是如此，而私人储蓄的数量却急剧上升，债台高筑的家庭走上了漫长艰难的还债之路。

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少人认为负责提供官方预测的经济学家应该有所触动，并重新审视他们的模型，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崩塌，丝毫看不到一点修正经济模型的迹象。其实，并没有人试图就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建模分析，这也使得调整经济模型的根基匮乏。尽管不少观察员认识到这一危机的类别和严重性并没有体现在现有模型中，但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原有的模型继续承受着危机的余波，继续进行预测，一切照旧，回归到了危机前平衡增长的老样子。

可以考虑一下国会预算局（CBO）对于经济底线的预测。国会预算局是一个无党派的机构，议员们正是依靠这个机构评估经济发展情况和预算规划。在2009年1月初的预测中，国会预算局预测经济将会偏离正常状态，出现GDP鸿沟。此预测有两个惊人之处。首先，国会预算局并不认为经济衰退糟过1981和1982那两年，那时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其次，国会预算局认为从2009年末开始，经济出现强烈复苏，这样即使国会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15年左右经济也能完全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增长趋势。

国会预算局的专家是如何得出这个惊人结论的呢？就此次经济下滑的深度和期限而言，国会预算局的模型是以“二战”后的经验为基础的，这些经验同样是设计电脑模型的专家们可获得的连续统计数据。但是基于经验设计的电脑模型并不能预测出比当前更糟糕的结果，其后漫长而缓慢的复苏意味着完全复苏不太可能实现。

另外，国会预算局的模型植入了4.8%的自然失业率。该模型的出现意味着当经济状况走下坡路时，会使预测结果变得更加乐观。这就是说，如果消息称失业率为10%而不是8%，该模型会设计出一个更加迅速的反弹，将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12%的失业率会带来甚至更快的复苏。根据之前的经济模型分析，历次经济衰退之后，往往会迎来更加迅速的反弹，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换句话说，不论现状如何，自然失业率将重申预测结果。经济状况越糟，预测结果越好。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内部的经济学家与外部的经济学家如何交流。当政府提出一项科学议题时，比如烟草与癌症的关系、氯氟烃危害臭氧层，将会通过与有关专家签署协议，委托他们进行研究，政府通常会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专家们有权在小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可能存在矛盾，但至少让外界清楚地了解科学观点（这与商业领域必须达成一致观点有所不同）。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座谈小组不一定要包括煤炭公司指定的专家。

随着经济预测结果的呈现，独立观点已不复存在。大量的经济预测人员都被雇用，尤其是被银行雇用。并且，那些专注于学术的预测人员经常也为私人企业提供咨询以获得额外收入。美国国会预算局以及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为政府做经济预测，但它们并不是独立机构，而是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学术观点的衍生物。一般来讲，商业预测人员会集思广益，然后在大家的看法和团体的观点之间寻求折中方案，作为共识发布出去，帮助大家选择绩优股。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反对的声音日益高涨。比如，以悲观预测而著称的“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在2009年初称，经济情况远比所见到的还要糟糕，长期贷款复苏的预测完全是不现实的。这样的看法立即被视为反常的或古怪的，要么被舆论贬为局外观点，要么就被简单地纳入，和其他观点一起融合成折中的看法。任何一种方式都无足轻重，影响甚微。

同时，那些直接被银行雇用的金融学家，担心其机构被视为乐观者的合唱队。例如，2009年5月1日，在纽约利维研究所经济金融年度会议上，威尔斯资本管理公司（Wells Capital Management）的詹姆斯·鲍尔森（James Paulsen）提出“V”形经济复苏趋势，当他看到一张关于经济刺激方案规模的幻灯片时，情不自禁地大叫“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对一群来自学术界和商业界的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这群人中不乏詹姆斯这类经济学家，还包括白宫的资深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他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节目中说道，最终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反映的是两党经济学家的看法，从而确保了最终结果是这群经济学家职业观点的折中看法。

如果不存在系统性误差，这种方法是有用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不考虑机构偏见，仅仅依靠经济学家也行不通，因为经济学家们天生谨慎，在通常情况下，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意见取一个折中版，但如果遇到极端的、非同寻常的情况，这样就行不通了。经济学家们的职业谨慎往往会打击其他人呼吁采取有力举措的热情。比如，2008年11月，348名左派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已经当选总统但尚未就职的奥巴马，要求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但规模仅仅要求3 500亿美元。在之后几周内，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就摆到桌面上了，但规模比这些经济学家们要求的大得多。在商讨刺激计划规模的过程中，那些左派经济学家们的谨慎观点束缚住了奥巴马政府内部一些人士的手脚，不然他们可能会要求进一步增加刺激方案的规模。

美国国会预算局以及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认真评估了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觉得这些观点似乎是公正的、没有偏差的，其实不是这样，而认为美国的经济形势还符合“二战”后出现的正常状态，也是错误的。很难想象哪一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原则和咨询实践更有利于预见系统性崩溃，只有总统能够推翻经济学家们的错误预测，但实际上奥巴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如果这么做，就可能招来批评，被视为以

政治手段干预技术问题，但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悲观分析是不应该影响政策决策过程的。

一些经济预测模型赖以建立的原则就是经济复苏是自发的和不可避免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则就是关于潜在总产出率或者说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通常来讲，计算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历史总产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拓展到未来。因此，这就相当于假定生产能力会持续增长，而在现实中，经济增长和生产能力在一定时间内或许达不到预期。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假定是，在管理得当（或者如某些政策建议所说的那样，放任自由，不对经济实行管理和干预）的情况下，根据历史产出趋势预测的长远生产率往往会变成现实。

“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有时也被称作“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它假定经济肯定会重新恢复增长潜能。“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个概念认为失业率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这种供求关系影响工资水平，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如果失业率提高，那么市场压力会降低实际工资（以购买力计）。这会提高工人对于雇主的吸引力，劳动力需求上升，逐渐促使就业率回到正常水平，或者说自然水平，而这又意味着生产率恢复到正常水平。

几十年来，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一直是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失业率低于6%或7%，通货膨胀就会加速。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观点受到了挑战。到了90年代，随着失业率持续上升和通胀持续下降，自然失业率的守卫者们也逐渐降低了对自然失业率的评估。在这场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们对于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评估值普遍较低，一般在5%左右。而对于那些曾经反对高评估值的人而言，这个较低的评估值带来了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结果。之前，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非加速通货膨胀率偏高往往会让决策者感

到自豪，而现在，由于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较低，高失业率就被视为异常情况，因此，人们就预料几乎不需要做什么，经济就会快速反弹到自然的增长速度。

2009年初，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的预测就说明了这一点。二人都是奥巴马团队的资深经济学家。伯恩斯坦是进步主义经济学家在这个团队的唯一代表。他们预测，如果不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失业率将在2010年初达到9%左右的峰值。他们认为，如果实施一揽子刺激计划，失业率将在2009年初达到8%左右的峰值。（请注意，当罗默和伯恩斯坦做出这个预测的时候，关于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数据还没有发布，因此，他们只能依靠小布什政府时期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团队给出的基本预测。）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预测，无论是否实施刺激方案，失业率肯定会在2014年回到5%左右的水平。他们还预测，如果实施刺激方案，那么失业率将在2012年回落到6%以下，而如果不实施刺激方案，那么回落到6%以下的日子就会晚6个月。结果表明，他们的预测与事实不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料到这次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受到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束缚，对于未来的预测呈现出了高度公式化的特征。

然而，对于经济刺激计划，或者说财政扩张方案的效果，即便美国官方也被迫承认这些效果只是短期性的。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团队中有人曾经公开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比如，《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标志性举措，但即便奥巴马政府自己也认为，该法案只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只能产生短期的效果。至少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该法案的构想与设计只不过对经济起到了一丁点的提振作用，最终的崩溃结局是在所难免的。从现实角度来看，该法案的作用其实要比奥巴马经济顾问团队的说法好得多，但这一事实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经济学家们预测经济增长前景的过程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大方向就是认为经济增长态势会进一步得以维持，而且长期来讲，经济会趋于均衡。官方在预测大约10年后的经济前景时，其预测目标与刺激计划产生的结果往往产生一定的误差，这是因为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利息支出也会增加。经济学家们认为，金融扩张计划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挤压私营资本的形成空间。因为一旦社会总产出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就会迫切地希望尽快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带来更大的利息负担，对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也会产生很大的挤压效应。随着私营部门投资规模的缩小，资本总额和最终的社会产出也会随之减少，最终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

就这样，奥巴马顾问团队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时，所依据的经济预测就是：如果没有刺激计划，失业率最高为9%左右；无论有没有刺激计划，以2009年夏季开始，经济也会快速复苏。事实上，这种预测限制了奥巴马团队的手脚，在讨论新增公共开支的规模时往往有所顾忌。比如，当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提出一个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时，劳伦斯·萨默斯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天文数字。其实，后来萨默斯也坦诚地说过他之所以不赞成罗默提议的数字，是出于政治顾虑，即鉴于总统与国会的经济学家们做出的预测，这么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会削弱他们的公信力。最后，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刺激方案规模应该接近总统奥巴马寻求的8 000亿美元。

为了让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尽快显现出来，《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倾向于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快速推进的项目，比如翻新学校和修复道路，而那些需要重新规划、设计而且执行期长的项目，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和高速铁路建设项目，都被置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在能源和环境方面上的一些长期投资项目还是被悄悄地塞进了刺激计划。《时代》杂志记者迈克尔·格伦沃尔德（Michael Grunwald）在其

2012年出版的关于这次刺激计划的畅销书——《新新政》（*New New Deal*）中提到了这一点。刺激方案格外注重项目的乘数效应，即如何用较少的美元做更多的事。之前，奥巴马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而实行了减税政策，但减税政策的乘数效应比较低，尤其是因为美国民众偿还房屋抵押贷款的压力较大，即便减税，对这种压力的缓解作用也不明显，反而不如政府直接增加支出的乘数效应显著。刺激方案还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防止这些政府解雇教师、警察、消防员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服务人员。这些政府支出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并没有为经济体本身注入很多新的活力。

对于速度的追求还对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另外一种影响。起草新的法律依据是很费时间的，在紧急情况下，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戴维·奥贝（David Obey）从固有的法律文件中寻找能够获得广泛支持，尤其是民主党支持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他就能迅速提出一个符合渐进原则、得到各派政治力量认可的方案。但通过这种方式采取的行动往往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或灾难。除此之外，寻求政治共识可能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总统或许在刚刚就职时就想着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获得两党支持，以多数票赞成的方式得到国会批准。当然，这样一来，他就遭到了共和党人的蔑视。尽管奥巴马考虑到共和党人的要求，将减税纳入经济刺激方案，尽管奥巴马之前一再呼吁两党应摒弃党派之争，但最后众议院内的共和党人对该经济刺激方案还是无一例外地投了反对票。

要避免这个逻辑的困扰，唯一的方法就是摆脱预测者，摆脱他们的预测。总统可以宣布形势非常严峻，不确定性太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能受到预算限制，必要时也可以突破所有预算规则和其他一切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制订的刺激方案肯定会迅速产生极大的效果，如果实际情况表明刺激强度超出了真实经济情况所需的程度，那就可以适时地削减刺激方案的规模，但在2009年初，出现这种情况的风险很低。（这种刺激方案至少有三个先例，分别是

罗斯福新政、1940—1941年的战争动员和里根政府1981年减税。以减税为例，由于经济学家们对1980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做出的评估过于消极，里根政府便大幅削减个人和公司的税负。随着经济在需求刺激下逐渐恢复了增长态势，里根政府又降低了减税力度，并先后于1982年和1984年增税。）

当然，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2009年初，经济并没有回到增长轨道，2010年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2011年和2012年仍然如此。经济衰退走入低谷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没有超过2.5%，就业人口比例没有改善，失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停止找工作了。2012年，住宅投资只有2005年的一半规模，总投资规模还不足之前峰值的10%。

真实的经济情况并没有“配合”经济学家们的预测。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经济学家们会重新审视自己的预测模型吗？人们可能再一次失望了。预测者们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反应，在新的起点上，继续采用原有的预测模型。2009年，经济学家们预测，5年之后经济就会全面复苏，但现在这种美好愿景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往后推迟了，听起来就像海市蜃楼一般。2009年，经济学家们预测的全面复苏时间为2014年；到2010年，这个时间又推迟为2015年。每一年，经济学家们都告诉我们，世界将在5年以后“恢复正常状态”，即充分就业、高产出、高投资的状态。

显然，如果经济学家们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预测，肯定不会令人满意。但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要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经济学家们就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该模型能够为人们描绘未来的图景，但不一定以历史为镜子。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就要对经济结构有一个深层次的理解，需要明白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即便这种新的认知与历史统计数据记录不一致，也要有勇气将自己的新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最难的部分。但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之前经济学家们的预测

是毫无根据的，经济自发恢复均衡状态的观点也是空洞的，过去的增长道路并不是最好的预测依据。但据我所知，目前还不存在这样一个模型，现有的预测依据都是历史统计数据，因此，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暂时无法摆脱这种预测的困扰。

因此，在紧急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做出的预测不仅是无用的，反而会适得其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大幸事是没有历史的牵绊，在他掌权的时代，还不存在所谓的国民收入账户和经济预测模型。他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摸索，没有任何指导，但他有一种紧迫感，一批值得信赖的专家会通过认真观察经济状况提出合理的建议，他们会密切跟踪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及时提出调整建议。因此，他能够尝试一切可能性，实行了一些看似合理的以及看似令人难以置信的措施，最后的结果也受到了广泛好评。如果罗斯福当年“有幸”得到了今天这些经济学家们的指导（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还是反凯恩斯学派），恐怕他的新政根本无法出炉。

在2008年和2009年初，虽然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对决策者的影响非常大，但政府的政策却畏首畏尾，二者之间似乎呈现出反比例关系。其实，这是不足为奇的。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危机刚刚开始之际，恐慌无处不在，政策建议层出不穷。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其实并不重要。美联储把利率降到了零，为银行提供了无限的流动性，本质上为世界金融领域提供了无限制获取美元的机会。这些措施都没有受到限制，但报送给国会的、被称为“现金买垃圾”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规模却受到了限制。

一位参议员后来告诉我说，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想获批更大金额，但5 000亿美元嫌少，1万亿美元听起来实在恐怖，于是折中到7 000亿美元，希望能通过国会审批，这是出于政治考虑的结果。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只能起到粉饰门面的作用。一个备受质疑的方面就是如何对金融机构“问题资产”进行定价。最初设计的问题资产收购计

划是以“反向拍卖”方式进行的，即政府对某个级别的债券规定一个价格，然后让持有相应级别证券的金融公司告知财政部它们将资产出售给美国政府时可接受的最低价格，那么出价最低的商业银行可以把不良资产卖给政府。当财政部将长达三页的建议书送达国会时，显然吃了一顿闭门羹，因为这种方式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可能在时间本已非常紧迫的情况下迅速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卖家掌握的信息永远比买家多，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美国政府很难得知这些证券的真实情况，买卖过程中容易受到金融公司的操纵。

很快，以模仿、支持市场行为模式为基础的方案就被准国有化的方案取代了。财政部后来考虑用其他手段实施这一计划，其中可能包括财政部直接从公司收购证券，或是通过一套系统来收购这些证券，财政部或其资产经理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参照私营市场参与者收购资产的价格来确定自己的资产收购价。此外，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保险额度由之前的10万美元提高到了25万美元，保险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账户，甚至包括偶尔超出最高额度的企业工资结算专用账户。财政部还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为大银行注资，为它们提供急需的资金。此外，美联储决定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濒临破产边缘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以面值清算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违约掉期业务。这一紧急援助措施挽救了濒临崩溃的美国国际集团，也挽救了那些背负着以该公司债券为保险对象的信贷违约掉期产品的投资者，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德意志银行等。与此同时，美联储接管了商业票据市场，确保了那些依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大公司能够获得足够的流动资金。此外，美联储还设立了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ALF）、公私合营投资计划（PPIP）等救助机制，使企业能够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获取大规模的救助资金。根据公私合营投资计划，资产管理公司负责筹集一部分资金，政府为其提供相等金额的资金，共同收购银行持有的不良抵押贷款证券及其他问题资产。这样一来，美联储和其他政府机构将以债权和股权的形式，与私营机构共同投资银行历史遗留贷款和资产。为了

帮助上百万面临止赎问题的借款人，财政部启动了“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HAMP）。根据这一计划，银行自愿为借款人降低利率，而由政府向这些银行提供补贴，从而降低了月度偿还金额，帮助了那些陷入困境或面临违约的抵押贷款人。盖特纳将这个计划称作“飞机跑道上的泡沫”[注]，意为一项临时策略，该计划有助于金融系统平安度过困难时期。此外，鉴于次贷危机以来，西方各国陷入流动性短缺，许多国家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逐步加大，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建立了“临时美元流动互换机制”，加大了双边货币互换的力度，以相互提供流动性支援度过危机，后来，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逐渐转换成了长期货币互换协议。根据该协议，美联储在事实上成为欧、日、英、加、瑞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正是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机制，为全球金融体系直接提供了高达接近6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货币互换推高了美元兑换瑞士法郎、欧元、英镑、加元和日元的汇率，避免了美元短缺加剧全球危机。

接下来的政策就是恢复市场信心，至少恢复对大银行前景的信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2009年初，时任财长盖特纳就启动了针对银行业的压力测试项目。该项目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看看哪些银行需要更多的注资，需要政府持有更多的股权，以便安然度过更糟的经济与金融形势。他们的测试是否精准，是值得存疑的，因为他们没有要求银行按照市场价格标注其失败的抵押贷款组合，而且与常规做法相反的是，在发布测试结果之前，财政部与银行商议过。但掺水的银行压力测试却起到了一个更大的作用：它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政府不打算控制银行，也不会任由它们倒闭。银行股很快恢复了上涨势头，十分引人注目。

2008年的金融救助挽救了一大批银行，它们的业务和薪酬很快就摆脱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几家主要的大银行安全度过了危机，顶尖的银行家们也没有遭到起诉。到2009年年中，银行盈利情况得到全

面恢复，但其他一切都没有恢复，这种局面导致美国政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此外，美联储操作的那些项目很不透明，就像埃及法老那样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最后，国会下令对这些项目开展审计。彭博社又先后披露了这些项目的一些丑闻，一些令人尴尬的细节被公布出来，比如，至少有两位顶尖银行家的妻子参与了美联储的“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项目”。因此，在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过程中，选民们用自己的选票惩罚了实施金融救助计划的人。惊恐万分的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启动金融监管改革，实施了多项限制举措，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金融救助政策卷土重来。

然而，银行体系幸存了下来，大银行得到的救助尤其多。它们的市场份额增加，利润飙升，股价恢复。它们可以通过外国借贷，在资产价格上从事投机操作，把自由储备金利息收入囊中，从而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它们的业务操作面临的限制非常小，即便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限制力也很薄弱，而且生效非常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从银行系统购买资产，包括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虽然这个计划被吹捧为支持经济之举，但其第一个作用显然是帮助银行清理账面，把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住房抵押贷款深埋在美联储的金库里面，最终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得到清偿。至于这些慷慨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奥巴马总统强调了很多次。储蓄银行的目的是“使信贷重新流动”。财政部长盖特纳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通过这些积极的政策，美国政府希望让美国大银行主导世界金融业，同时让私营银行在美国经济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有银行是一回事，让它们发放贷款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银行并不想用贷款去支持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也不想去支持新住宅建设。在发放新的贷款时，是给企业还是给家庭呢？为了什么放贷呢？鉴于美国三分之一的住房抵押贷款都已经出现了违约，新贷款用什么做抵押呢？预期利润怎么样呢？银行救助五年之后，银行贷款业务还没有回到正轨上来，其实它们也不愿意回到正轨。

正如总统所表述的那样，在银行业政策中，一个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隐喻是“管道”，人们经常借助“管道”来描述银行业的政策，认为银行业趋于停滞，是因为其管道被堵塞了，障碍物就是有毒资产，把这个障碍物清除掉，管道就会恢复正常，也就是说，信贷条件将恢复正常，信贷将再次流动起来。但这个隐喻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信用不是“水流”，不是说清除管道的障碍之后水就能自然往下流动。信用是一份合同，它需要有借款人和贷款人，需要有银行和客户。借款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有信誉，这意味着收入稳定，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必须有房产，包括用抵押贷款方式购置的房产。因此，资产价格的意义就非常重要。由于住房市场长期供应过剩，导致房价下跌，抵押品消失，即便借款人愿意申请贷款，也无法获批。另一个要求是有借款意愿。在商业热情的驱动下，借款人愿意借款去从事商业活动。在经济衰退期，这样的乐观是稀缺的。即使人们拥有可以拿出来作为担保品的财产，他们也更喜欢现金带来的安全感。正是因为他们想要现金，所以他们不会耗尽储蓄去买一辆新车。

由于前来敲门的借款人很少，对于银行而言，安全之策就是静静地坐着，长期积累资本。它们可以以低廉的成本从央行借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和较长的期限向政府放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从美联储获取融资的成本，另一个是财政部为较长期债券支付的利息。只要这两个机构能够维持这两个方面的顺差，即让这二者之间呈现出正收益曲线的关系，那么银行业就能轻松维持盈利状态。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资金充裕的大银行就是这么做的。当时，一些监管机构就知道一些区域性的银行和规模较小的银行从事这种套利行为。对于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的银行家和监管机构而言，这种操作是较为理想的办法。但总体来讲，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新的贷款，银行仅仅扮演着资金中转站的作用。

经过一定的时间，大多数独立观察员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限制的、不受经济预测制约的金融救助政策，仅仅拯救了银行和银行家。这些政策并非不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有利影响，而且对个别部门的有利影响也不容小觑，但这并不是金融救助政策的主要目的。

总体来讲，《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头两年内，每年用于增加支出和减税的总金额相当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期促进社会产出的恢复，并在连续三年的时间内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从数学角度来看，如果财政乘数(注)接近于2，那么让社会产出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比较划算。但在当前环境中，鉴于支出类型和减税力度，财政乘数并非接近于2。

考虑到政治和经济因素对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制约，我们不禁陷入了这样一个谜团：金融灾难之后，为什么美国经济下跌那么少？就业率和市场收益率仅下降了约10%，然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从2007年到2009年下降了3.5%，而个人消费支出仅下降了2.5%。为什么下降幅度这么小？有些人想将此归功于美联储采取的不受限制的救助举措，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利率多低，没有贷款就没有刺激，归功于美联储是不合适的。

答案是，联邦政府支出总额（购买商品和服务）上涨幅度超过了6%。在同一时期，卫生安全支出的上涨幅度达到了25%，医疗保险的上涨幅度接近15%，社会保障上涨幅度超过了16%；其他收入保障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失业保险）的支出幅度超过45%。与此同时，税收总收入下降超过8%。总之，尽管《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规模小，联邦预算赤字会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超过美国70年代以来的任何一次衰退时期的赤字规模。而根据国际经验，一般3%即被认为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警戒线。

其中一些变革是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后才出现的。在经济刺激计划运行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延长失业保险（即联邦政府从联邦失业保险基金中为各州支付大约一半的延长失业保险金）以及把工资税降低2个百分点。但这些变革都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没有受到经济预测的影响。这些变革反映出了经济形势对联邦政府刺激计划的更高要求，其中有些刺激计划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此外，还有一种幸运的特殊情况，即2008年的油价很高，到2009年开始回落，这样就促使美国居民调整了生活成本，减少了社会保障支出。这些变革还反映出个人收入下降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总体来讲，在这场危机中，个人收入减少了10%，但这些损失额中的四分之三得到了联邦财政的补贴。联邦财政的补贴起到了稳定经济形势的作用，但也导致公共财政账户出现了巨额赤字。

由此可见，真正将美国从2009年那场大危机中解救出来的，不是私营经济的复苏，也不是银行业的复苏。虽然经济刺激计划显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作用也很有限。美国之所以能摆脱危机，应该归功于大政府体制的遗产。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那场大萧条期间，美国就设立了这种大政府体制，以便落实罗斯福新政的内容。大政府体制下的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失业保险、残疾保险、食品券和累进所得税制度。这些项目有助于将社会收入从家庭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简而言之，美国在20世纪建立的大政府表明，当私营部门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公共部门就可以扩大规模，满足这些需求。虽然这次美国政府的行为还算合格，符合人们的期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当前的时代精神却认为任何一项成就都不是完美无瑕的，都有一定的缺陷，因此，政府行为很快就为公共辩论带来了一些变化。

---

1. 飞机出现起落架故障或其他原因需要紧急着陆时，机场消防队首先必须在跑道上喷洒泡沫，这是为了减轻飞机机腹着陆擦地时的损坏程度和减少起火危险性，从而使得飞机在不使用起落架的情况下安全着陆。——译者注

2. 财政乘数是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平衡预算乘数的统称，用于解释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或减少的影响有多大。——译者注

第十一章
政府干预的是是非非

2009年晚冬的一天，我在纽约的街上走着，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打来电话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金融评论家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该协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当时，他正组织两周之后的研讨会，此研讨会以罗斯福新政为主题，为期一天。他问我要不要参加。最终我同意了，琢磨着研讨会主题和施莱斯邀请我的原因。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施莱斯邀请我，是希望有权威人物参与研讨会，以免被人指责贸然行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李·瓦尼安（Lee Ohanian）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哈罗德·科尔（Harold Cole）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涉足经济史领域的著名分析家。二人对罗斯福前两个任期的经济政策开创了一套新的分析方法。他们将战后新古典主义理论和经济增长指标，尤其是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放到20世纪20—30年代加以研究。在这种模式中，增长依靠的是人口、技术和节约成本。因此，我们可以通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增长画出趋势线，据此预测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时，20世纪4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什么水平。当然，预测值和实际值有很大差距，因为经济危机的确发生了。科尔和瓦尼安认为一系列的变化导致1930—1932年经济危机的发生，包括技术冲击、税收支出、关税贸易、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银行系统的崩溃。最后他们问，为什么8年后私营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没有消除差距，在这种模式下，本该出现快速的全面恢复，也就是回到以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出现。

鉴于这一观点的逻辑，我们会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坚定推断。此推断与之前所有观点相反：新政没有促进经济恢复，反而阻碍了经济恢复。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历史中，到1936年，美国经济已恢复到之前实际经济活动的最高水平，很多人以为这似乎是“全面恢复”时期。但考虑到后来出现的经济增长理论（当时距离该理论的出现还有20年的时间），科尔和瓦尼安坚持采用更高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全面恢复需要恢复到之前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仿佛回到兴旺的20年代。然后，他们根据那个趋势评判经济衰退。自然而然地，严重的大范围经济衰退持续，出现了科尔和瓦尼安称之为“谜团”的问题。他们在思考这个谜团的过程中，得出了分析结论。结论包括总结关于新政影响的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观点。在“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保守的标题下面，科尔和瓦尼安写道：

> 为解释经济恢复疲软，我们应寻找有特殊性的冲击，例如，只是影响到某些经济部门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制造业行业，冲击导致这些行业的工资上涨，就业投资减少。我们推断，政府针对垄断和收入分配的政策能很好地应对此类冲击……尤其是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允许很多经济部门结成企业联盟……政府禁止结成企业联盟的公司给在职员工大幅提薪……

换言之，罪魁祸首肯定是……罗斯福新政！虽然1933—1936年的经济增长是和平时期最快的，但没有新政，增长会更迅速。没有新政，到1936年，经济整体水平会达到兴旺的20年代的水平。1999年，科尔和瓦尼安保证会做进一步工作来证实或推翻此观点。我们没必要探讨细节，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证实了此发现。具体地说，他们在文中声称，到1935年《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废除时，制造业工资高出不出台该法前25%。在此之后，得益于劳动法改革、工会扩权和劳资谈判，工资一直很高。因此，是

更高的工资导致了1937—1938年的经济衰退和1933年之后的增长放缓态势，而不是因为罗斯福想要平衡收支预算。

二人论点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与现代经济学范畴内增长进程的主流观点一致。二人小心翼翼，不跨出公认的史实范围。例如，他们承认当代人认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标准定义是指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衰退”。此定义肯定了大萧条的终结者是罗斯福新政，而不是“二战”。当然这是有确凿证据的：1936年，再次竞选总统期间，罗斯福一举拿下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的所有州。但科尔和瓦尼安已从严格的新古典主义角度出发，他们必须证明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1933年大萧条并未结束。相反，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末，实际产出仍低于趋势水平的25%~30%”。因此，经济大萧条持续，经济发展并未恢复到之前的发展趋势。这需要找到罪魁祸首，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鲁莽、非法甚至违宪的干预似乎是最好的解释。

公平地说，著名自由主义者已为认为罗斯福新政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铺平了道路，他们认同这种更为常见的历史观：尽管新政缓解了大萧条，但它未恢复高就业率，因此并未终结大萧条。保罗·克鲁格曼对此观点并不陌生。在《现在终结萧条！》一书中，他写道：“‘二战’使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的原因很清楚。”在此书中，新政被描述成了大萧条时期相当温和、效果不大的经济恢复计划，而且对于罗斯福政府于1937年做出的第二波努力，克鲁格曼选择了视而不见，这样一来，在他的笔下，只有“二战”才是大萧条的终结者，是全国紧急状态的终结者。这一切要归功于“二战”，而不能归功于非和平时期的政策。

很多事实都经常被用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其中一个就是声称失业率在20世纪30年代从未低于10%的言论。但这并非属实。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统计的（公平地说，遵循了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统计方法）。在60年代，联邦紧急服务工作者被视

为失业者。但在那之后，对就业率的统计方法发生了改变，联邦紧急服务工作者也被算作就业者了。目前公认的数据显示，1932年的失业率是22.9%，到1937年降到了9.2%。联邦紧急服务工作者最多时达370万名，几乎是1936年劳动力总量的7%。马歇尔·奥尔巴赫（Marshall Auerback）于2008年写的一篇论文认真地总结了罗斯福政府所做的贡献：

> 罗斯福政府雇用了大约60%的失业者从事市政工程和自然保育工程的建设，自然保育工程种了10亿棵树，拯救了美洲鹤，促进了美国农村的现代化，建造了多种多样的建筑，例如匹兹堡学习大教堂、蒙大拿州议会大厦、芝加哥湖滨地带、纽约林肯隧道、三区大桥（连接纽约市曼哈顿区、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企业号航空母舰以及约克镇号航空母舰。另外，还新建或修缮了2 500家医院、4.5万所学校、1.3万个公园及运动场、7 800座桥梁、70万英里公路和1 000个机场。还雇了5万名教师，重建了美国农村地区的所有学校，雇用了3 000名作家、音乐家、雕塑家和画家，其中包括画家威廉·德·库宁（Williem de Kooning）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奥尔巴赫指出，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将美国这些工作人员当作失业者，而对经济危机时期其他国家的这类工作人员却并非如此，这是无意识偏见的流露：

> 即便赞成罗斯福的历史学家，例如威廉·洛克滕堡（William Leuchtenburg）和多利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都随声附和，认同参与新政社会福利项目的数百万劳动者是失业者的观点。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被迫参军及在国防工业领域工作的数百万德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却被视为就业者。这使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经济发展看起来不占优势，但其实参与政府市政工程及自然保育工程的劳动者也是就业者，而且相较于被征召入

伍者，他们从事的工作更有价值。德、日后来变成军事独裁国家，而罗斯福却以具有历史意义的低成本实现了美国的重建。

因此，对于新政温和无效的指控其实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为什么要在此提到上述这些方面呢？因为科尔、瓦尼安这两人的观点不仅仅重新解读了新政，迷惑了一大批不了解新政的人，还扮演了一种模板的角色，一系列经济论证都以此为模板，即便今天仍然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些观点一直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采取抨击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足以揭示这种方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例子涉及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速的关系，另一个例子涉及大危机后行动主义[注]的影响。

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传统的观点中，经济史专家们的传统观点认为，穷国经济增速快，而富国经济增速会放缓。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曾经专门写过一本阐述这个现象的专著。如果不是穷得一无所有，那么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就会获得一定的增长优势。从长远来看，融合是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这样，但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融合过程是长期性的，需要阶段性地实现。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时，它需要做什么呢？它需要增加政府服务，增加社会保险，提供更多的公共商品和服务。富裕国家利用自己的财富，将国家建成了庞大的集体组织。这不是新现象。一般来讲，只要存在民族国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鉴于这一事实，人们会怎么看待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关系呢？很合理的一种看法是，二者应该存在一种消极的关系。一般来讲，在一个国家里，政府越庞大，越富裕，经济增速越低。目前还没出现有悖于这个规律的情形。早在199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

（Richard Vedder）和洛厄尔·盖洛维（Lowell Gallaway）提交给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一篇名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就对这个现象做出了无懈可击的分析。

但维德和盖洛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上。如同瓦尼安和科尔一样，他们也拓展和改变了自己的论证过程，改变了一下因果变量，转换了一下历史顺序。现在，政府规模不是一个结果，而是成为一个政策杠杆，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不是如同财富规模与经济增速之间的那种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权衡关系。想要更高的增速吗？那就削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支出！这是根据简单思维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

为了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维德和盖洛维用“阿米曲线”（Armey Curve）(注)进行了分析。该曲线最初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领导人、经济学博士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在《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一书中提出来的。根据这个曲线，如果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维持在17.5%左右，那么美国将获得最快的经济增速。这相当于1965年的政府规模。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用于公共事业方面的开支转移支付，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支付，在1974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3%，开始阻碍经济增长。然而，他们认为经济增速与国防支出之间不存在负相关关系，还发现其他支出，如教育、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他们的数据和结论丝毫没有令人惊讶之处和荒谬之处，因为从会计核算角度来看，军事采购和高速公路都是最终经济产出的直接组成部分，政府在这些领域多支出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就相应增加了一美元，而政府在医保和社保方面的转移支付只是简单地通过税收把收入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手中，并没有发生商品或劳务交换活动，虽然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微弱的促进作用，却

不会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过程。此外，由于老年人不再从事商品生产活动，只是消费社会提供的服务，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服务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长。但服务的形成过程不像商品生产过程那样需要大规模的先期投资。因此，任何水平的社会福利都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当前的人口结构、社会环境、收入水平和资源成本回到1965年的水平，那么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像当年那样高。那一年，政府支出增幅最大，因为当时美国要努力落实名为“伟大社会”的社会福利计划，而且越南战争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两个因素都直接促进了美国的社会总产出和经济增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便经济增速达到了1965年那样的水平，真的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肯定会过得更好吗？当然不是。

为了实现较高的增长率，有人就炮制了一些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错误推理方式。先是选定一个有诱惑力的目标，即较高的增长率，然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据的包装下，分析出这个目标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最终提出一项政策建议，即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应该维持在17.5%左右，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当前比重的基础上削减大约2.5个百分点，主要是削减社保方面的支出。此外，还需要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减少1/4。其实，这只是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统计数据的包装，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他们的建议并不是很合理，任何一位具有客观判断能力的计量经济学家都不会认真考虑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的影响却很大。大幅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已经成为某些圈子竭力推动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比如，就在2012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戴维·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在接受彭博新闻社的采访时就曾经声称竞选运动中唯一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规模问题。

后来，艾伦·格林斯潘将科尔和瓦尼安关于经济复苏的观点与维德和盖洛维关于政府规模的观点融合在了一起，提出了一种疯狂的观点。格林斯潘是一位常春藤式的人物，这对于一个前央行行长而言，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他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用专业的技术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2011年，格林斯潘在《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行动主义》的文章，指出美国政府的“行动主义”抬头，采取了过多的措施，包括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方案、房屋补贴与翻新规定等，恐将不利于经济复苏。

格林斯潘开篇伊始就提到了他论点的前提：“2008年，美国从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复苏慢得令人沮丧。”因此，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美国经济产出和就业为什么没能迅速反弹到危机前的水平。科尔与瓦尼安在分析罗斯福新政之前，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接下来，格林斯潘又指出了危机之后的一个关键事实：“企业非流动性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异常低，在公司现金流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实际上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因为企业的现金流处在不断变化中，既受到实际销售额的影响，也受到货币政策立场的影响。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企业注入了大量的现金流。然而，正如格林斯潘所说的那样，企业的现金过多，但它们对于非流动性固定资产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去建工厂或买设备，那么我们不禁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呢?

格林斯潘接着提出了他对企业心态的看法：“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美国企业家的恐惧情绪增加是因为经济活动骤然降温，但很多企业家在2009年初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之后依旧存有恐惧情绪，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政府为了加快经济速度，而对市场采取了过多的干预措施，产生了对私营部门的挤出效应，给市场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接着，他给出了他所说的证据。他写道：“人们总是认为政府干预可以弥补人性瑕疵引发的市场缺陷，但这种想法是高度存疑的。太多干预反而会阻碍市场，而不是促进市场发展。”

为了印证美国政府的“行动主义”，格林斯潘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政府采取的一些干预措施的例证。除了2009年初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之外，格林斯潘还提到了美国政府救助一些被认为“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格林斯潘认为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前，政府拿出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去救助个别公司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格林斯潘似乎忘记了美国政府之前曾经救助过花旗银行和克莱斯勒）。此外，格林斯潘还提到美国政府行动主义的另一个表现，即实行更加严厉的金融监管，这多亏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格林斯潘认为该法案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质内容，但太过庞杂，要求金融监管人员在今后数年内落实数以百计的强制监管规则，因此几乎不可能完整地判断该法案的所有影响。但他同时警告说，该法案提出的监管手段可能造成自1971年以来最严重的市场扭曲。

然后，格林斯潘令人惊讶地提到了罗斯福新政。他引用科尔与瓦尼安的观点，认为《全国工业复兴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限制作用，指出“从1932年到1940年，失业率平均为19%，从未跌至11%以下”。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用正确的方法去计算，到1936年，失业率接近9%。格林斯潘认为奥巴马政府现在制订的刺激方案和救助计划也同样起到了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格林斯潘从统计数据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试图解释在过去40年间资本支出的变化，解释为什么固定投资和大型业务偏离了之前的正常状态。他发现有55%的差异超出了他的模型的解释能力，便将其归因于新的、不同的因素。他写道：“我判断，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企业资本支出不足，其中至少有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可以归咎于大政府在竞争、监管与金融环境方面造成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给市场造成了冲击。”

格林斯潘指责奥巴马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刺激计划和救助政策是“行动主义”的表现，无异于起诉了奥巴马及其幕僚，并给他们定下了罪

名。证据是什么呢？根本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格林斯潘一贯的经济逻辑是，如果当前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达到经济学家们预期的基准水平，那么当前的政策制定者就要负责。这样一来，这位美联储前主席的文章就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他把自己任期内放松市场监管的决定描述为符合美国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常行为。现在回过头去看，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那些年的确出现了经济繁荣，但出现这种局面的前提是放松市场监管，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这也为危机爆发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格林斯潘这篇文章为他开脱了一切罪责，使他不必为离任后的一切事情负责。但事实上，正是他放松监管才为金融欺诈行为的猖獗创造了条件，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格林斯潘这种荒诞不经的想法，可以说他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人物。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几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尔塞纳（Alberto Alesina）和西尔维亚·阿德格纳（Silvia Ardagna）、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佩罗蒂（Roberto Perotti）等人都做过系统的研究，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为一系列经济政策构建了学术基础。我们可以分析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他们的工作要研究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用途，等等。

阿尔塞纳和阿德格纳在2009年一篇题为《财政政策大变化：税收与支出之比较》的论文中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变化。他们将财政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刺激型的，通常是为了在经济出现衰退之后恢复增长态势；另一类是调整型的，通常是为了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这两类政策都可以把支出或税收的杠杆作为驱动力。然后，他们分析了各种干预政策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影响。他们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从1970年到2007年之间的财政政策发生的100多次重大变化。虽然他们声称自己要探讨的是理论性非常强的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理论会导致不同的财政政策变化和不同的影响，但他们分析

过程的理论性却一点也不强，而是实证性的。他们仅仅列举出了一些符合他们预设条件的情况，然后问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结果还是被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发现成功的财政刺激往往归功于减税，而不是归功于支出增加。另一方面，成功的财政调整，即能够有效降低预算赤字的调整，往往更多地归功于削减开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论文中指出：

> 最令人惊讶的对比出现在转移支付方面。在成功的财政政策调整中，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0.83%，而在不成功的财政政策调整中，这个比例却增加了0.4%……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如果不解决好福利自动增加的问题，那么解决公共财政问题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不难看出他们做出这种论断的用意。在结论中，他们提到社会保障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一直是幕后因素，一直在发挥作用，但从没有消失。难道他们很快要提出一个新模式了吗？

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财政刺激和调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否会加快。关于这一点，他们提出的证据也反对凯恩斯主义式的复苏，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当代发展经历中，有大量例子表明某些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往往会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类削减支出、增加税收的政策，尤其是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就属于这类政策。他们称这些政策为“扩张性的财政调整”，并在他们的数据样本中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曾经出现过26次这样的财政调整。关于美国，他们对《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基于增加支出的财政激励相比，基于减税的财政刺激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他们之前还得出了一个令人更加惊讶的结论，即“与基于增税的财政调整相比，基

于削减支出和不增税的财政调整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赤字，降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简而言之，如果你要刺激经济，就减税；如果你要降低赤字，就削减开支，经济可能会增长。

他们的分析过程简单而清楚，比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分析更容易为人所理解。由此可见，他们那篇论文的预期读者并不仅仅局限于专家。然而，在他们的样本数据中，还有一些情况不符合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实证研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统计学家通常采用的标准？尤其是，样本数据中的所有事件都经过独立分析了吗？是否每一个事件都受到了同等重要的对待？如果不是，那么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可能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确凿”。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两位作者在其样本数据中仅仅发现了26个“扩张性财政调整”的例子。其中，有3个例子是连续3年（1987年、1988年、1989年）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两个例子在1993年和1994年发生在新西兰，两个例子在1979年和1980年发生在挪威，还有4个在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发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邻国。这些事件是相互独立地发挥作用，还是受到了某个共同因素的影响呢？对这些数据分析之后，很容易发现真正算得上“扩张性财政调整”的例子是19个，而不是26个。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请考虑一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中间，哪些国家在1970年之后实行了旨在削减赤字的财政政策，并实现了强劲的增长？这些国家包括：芬兰、希腊、爱尔兰、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吗？答案当然是，从面积和人口上来看，它们都是小国。最大的是西班牙，拥有4 600万人，其余国家的人口更少，在400万到1 000万之间。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茫茫经济大海上，这些国家犹如一只只小船。除了西班牙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规模甚至还

赶不上符合统计学标准的大都市的经济规模，比如加州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

现在，假如有人研究了洛杉矶或美国其他大都市的预算实施情况，会发现这些城市有时候会削减预算，但在这种痛苦的抉择之后，城市经济情况反而出现了改善，那么会有人宣称削减预算导致了经济改善吗？当然不会。标准的观点是：这个城市是被迫削减预算的，原因是税收收入的下滑，而后，之所以经济情况改善，是因为受益于国民经济整体形势的好转。没有人会把洛杉矶与圣迭戈或其他城市区别开来，没有人会把洛杉矶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去观察，也没有人会把洛杉矶这个城市的预算情况视为之后催生经济增长态势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但有一点是真的，即与其他同类城市相比，较低的税率可能会成为洛杉矶的一个优势，当经济复苏期来临时，将有利于洛杉矶吸引新的投资。）但阿尔塞纳和阿德格纳这两人在其论文中却显然表现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原本确凿地断定，得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之后，自己的论文就会被大量引用，自己也会被那些觉得“扩张性财政调整”或“扩张性紧缩”很有吸引力的人奉为权威。

“扩张性紧缩”现象并非不会发生。如果严格从先行后续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在税收收入减少时削减支出，在税收收入增加时增加支出，这种例子并不少见。事实上，当你从时间逻辑来看这种现象的时候，似乎觉得没什么不正常的。近几年也涌现出了一些新例子。比如，在2010年之后这几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经常被人拿来作为“扩张性紧缩”的例证。但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上面列举的国家都是小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美国这样的大国却被置于观察范围之外。与此同时，阿尔塞纳和阿德格纳这两人的研究工作还促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即政府的管制措施少一些，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少一些，就会催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观点与那些否定罗斯福新政的人、信奉阿米曲线的理论家们等叛逆的狂人持有的观点一模一样。

关于这种以偏概全的分析方法，最后再举一个例子。2009年，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men Reinhart）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出版了《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该书主要是一部描述统计数据的著作，总结和分析了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在长达800多年间的国内公共债务危机、外部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通过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我们了解到，金融危机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历史上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程度都惊人的相似。我们还了解到外部债务违约比国内债务违约更加频繁，这表明国家更倾向于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而非本国国民的利益。我们还了解到，尽管通胀往往会从国家历史中消失，银行危机却不会。在26次银行业危机中，政府在其中18次危机爆发前5年内（甚至还不到5年）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关于“银行体系崩溃是否会影响整体经济发展态势”这一经济思想史中具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写道：“确实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证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国家银行系统的崩溃会对其经济增长轨道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次不一样》一书中，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几乎没有提到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哪些措施，或许是因为他们这本书主要从统计学角度论述公共债务危机，而这场危机并不是美国的公共债务危机。不过，在2010年的一篇题为《债务时代的经济增长》的论文中，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尝试着将他们总结出来的“统计学规律”转化为“政策处方”。他们提出了一度十分著名的“莱因哈特–罗格夫门槛”，即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旦超过90%这个门槛，就会产生经济增速严重下滑的后果。但事实表明，他们在论证这一门槛的过程中发生了多重误差，很多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们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新西兰这个非常小的国家在195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7.6%，而那一年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当年新西兰出现了150多天的罢工，似乎与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没有多大关系。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研究生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和他的两位导师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在一篇合写的论文中指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计算过程中存在代码错误、数据遗漏等错误，导致“莱因哈特–罗格夫门槛”从历史中消失了。但这种论证方法并没有消失。虽然莱茵哈特与罗格夫在计算过程中存在数据错误，影响了其结论的合理性，但他们的计算方法未必不适用于其他情形。

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维德与盖洛维、科尔与瓦尼安、国会预算局以及艾伦·格林斯潘等人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断言的经济体存在一个正常状态，并给出了一个用来衡量经济运行状态是否达到正常状态的普遍标准，具体体现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测量指标上，比如，债务比率、预算调整、政府股份指标、自然失业率以及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这些指标装饰了他们提出的内在标准。人们可能会说，虽然经济数据是我们评估过去时唯一能够依赖的可靠途径，但无助于我们创建评估未来的统一标准，你必须先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理论解读，然后才能制定出一套评估未来的标准。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曾经在一篇非常著名的、论述经济学发展阶段的文章中表达了理论与测量相辅相成的观点：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为了系统性地、大范围地观察这样一个具有多面性的现象，对这个现象性质进行理论解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重视测量而忽视理论，则会损害分析过程。”

事实是，有时会发生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大事件可能预示着一个新环境的诞生。这次危机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说2000年信息技术繁荣的结束和2008年的金融崩溃预示着这样一个转折点的到来，那么198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期是该拉上帷幕了，更不用提194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假定“二战”后60年间那种经济环境终将恢复的分析都将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1. 行动主义主张为社会、政治目的可采取暴力等一切手段。——译者注

2. 阿米曲线描述了经济增长和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之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政府支出的扩张先是引致产出扩张，但这一效应是递减的，当边际效应为零时，便是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临界点，过了这个点，政府支出继续增长，只会导致产出减少。——译者注

第十二章
中枢论、财政悬崖与违约边缘

对政府干预市场抱有抨击态度的那群人认为，如果政府不积极采取干预市场的举措，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之前的增长轨道上。这体现了以追求“均衡”为特征的世界观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在会计学上的表现就是对“零”的崇拜，希望预算赤字为零，希望贸易赤字为零，认为预算与贸易的自然状态就是实现均衡。因此，如果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持续偏离“零”的净值，就出现了所谓的“失衡”状态。这种状态被视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

如同许多现代的观念一样，“失衡”也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新出现的，而是古已有之，曾经被奉为真理，但有悖于事实。亚当·斯密的朋友、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提出了国际贸易中的“硬币流动论”，即国与国之间的硬币流动有助于国际贸易自动恢复均衡。休谟认为，一个国家因为贸易优势获得顺差，货币流入，其结果是商品价格提高，于是贸易优势逐渐丧失，顺差减少以致消失；反之，一个国家因为贸易劣势而出现逆差，导致货币流出，其结果是商品价格降低，于是逐渐获得贸易优势，于是逆差减少乃至出现顺差。因此，无论对任何国家来讲，保持持久顺差、积累金银“宝藏”的重商主义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休谟的论证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贸易“均衡”是正常的，“失衡”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

这种“均衡论”的具体内容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理论的演变而发生了变化，但这种论调对人们的影响却依旧牢固。一个例子是近年出现的“储蓄过剩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用这种论调去解读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低利息现象，解读了投资者为什么更倾向于采取冒

险行为。伯南克在多个场合阐述过这种观点，并于2009年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做证时做了一个总结：

> ……我在这里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变成了资本输出国，而不是资本流入国。这要么是因为储蓄过多而投资过少，比如中国；要么是因为大宗商品出口带来了巨额外汇，比如一些产油国；要么是因为吸取了90年代的教训，获取了大量外汇储备，以防范汇率波动太大引发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大量资本流向了西方工业国，其中美国尤为明显。

在这种叙述方式中，均衡论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不同于18世纪，但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自那之后国际货币市场已经经历了多重创新。现代社会不是贵金属流入，抬升物价，而是电子货币流入，抬高债券价格，从而压低利率，降低贷款成本，刺激了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的冒险行为。然而，究其本质而言，休谟的硬币流动论和伯南克的储蓄过剩论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只是这两种情况下后果的具体表现方式不一样，前者硬币流动后果是引发通胀，现在电子货币流动的后果不是直接引发通胀，而是加剧金融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崩溃，抑制经济活动和进口，从而纠正贸易失衡。伯南克沿着这个思路，为金融体系的崩溃找到了理由。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偏爱安全的、高质量的资产，比如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而一旦这些债券无法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则为美国金融机构创造所谓的安全资产提供了强大驱动力，这就是证券化的3A级信贷资产的来历。

就这样，这位美联储前主席轻而易举地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卸给了欧洲的养老金领取者、欧洲的市政当局以及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暗示他们的储蓄流入美国，造成金融失衡，成为美国抵押贷款危机的元凶。

“均衡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渗透到政治讨论中。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经济学假定经济会自动恢复到高就业的正常状态，那么金融账户肯定也会自动恢复均衡状态。但事实上，人们很难在长时间内判断经济运行过程是否完全达到了正常状态，或者是否达到了稳定、可持续的状态。但公认的经济理论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经济会自发地复苏；另一方面，有一个同样坚定的信念却认为公共部门的财政状态走在一条通往灾难的路上。

在制定预算政策的过程中，在讨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财务状况的过程中，在评估美国政府“现值债务率”(注)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的基调就是对全国性金融危机的恐惧。最重要的是，人们在规划长期预算时，以及在预测赤字与公共债务时，也深受这种恐惧的影响。在所有情况下，论证过程背后的想法是，任何类型的债务都不能一直增加下去，不然，利率就会上升，投资活动和经济增长态势将会受到抑制，因此，政府必须根据税收收入去编制开支规划，包括一些长期项目的建设规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马（Eugene Fama）对这种信仰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 问题很简单：救助计划和刺激计划的资金都是政府通过增发国债筹集的……增加的债务吸走了原本用于私营部门投资的储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也必须先获得融资，这意味着政府会背负更多的债务。新的政府债务吸走了多少私人和企业储蓄，就意味着私营部门投资也会减少相同的规模……假如刺激计划是以减税形式进行的……那么政府税收收入每减少一美元，政府必然会从其他渠道借来一美元。政府一只手给予，一只手获取，从而使得当前的收入不受影响。

但无论从会计学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马这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在真实的国家里，尤其是在美国，公共债务是保持增长态势的。美国自从1789年建国至今，公共债务一直在增加，只

有少数几年有所中断。在所有的大型国家中，公共预算赤字是正常的。盈余通常只发生在小型国家里，因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足以维持其运作。在每一个国家，公共债务其实都等同于债券持有者（主要是一国的公民）的“净金融财富”。

的确，从账面上看，二者是平衡的。这就是复式记账法的意义所在。但这种平衡不必局限于税收与支出之间，也不必局限于出口与进口之间，而是应该扩大到各个项目与工具之间。一组的收入是另一组的支出，一组的负债是另一组的资产。因此，公共债务其实是私人财富，社会保险体系的负债是社保金领取者的资产。此外，有些人（纳税人）欠下了债务，那么基本会有另外一群人持有同等数量的资产，这些人就是未来的受益人。

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可以将这个位置称为“不对称”位置，有时也称为“特权”位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流动性最强的货币市场和严重依赖金融的政府（茶党在众议院的活动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些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美国在世界安全体系中的军事地位（这种地位现在正在陨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都选择了以美元计价，选择了持有美国债券。因此，美国几乎不用花费任何资源或劳动力成本，甚至连运输成本都不用承担，就能为其客户提供债券这种特殊商品。这种优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在电脑上为其外国客户设置账户就足够了，通过改变这些账户的数字，记录下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真实商品与服务的价值。这样，美国就变成了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所说的“全球牛头怪”，但与牛头怪不同的是，美国是负责记账的，均衡是通过外部债务实现的。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为全球“生产”这样一个稳定可靠的金融资产的同时，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就是贸易赤字，而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国还要承担相应的预算赤字。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必须“生

产”其他国家希望持有的债券，只要美元定价过程受到全球货币市场的影响，美国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美国的赤字水平不足以满足国际货币市场对美元的需求，美元的价格就将上升，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因此，税收将会下降，而公共支出就会上升，直到新的债务工具（预算赤字）满足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之后，情况才可能开始扭转。如同外国的债券持有者一样，国内的债券持有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只要他们希望持有美国政府债券，那么债券价格就会上升，利率就会下降，经济活动就会受到抑制，税收收入也将减少。用一个术语来讲，对于一个在全球信贷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而言，经济和预算的赤字是金融市场行为的内生性特征。

一个更为生动的例子发生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当时，随着私营金融市场处于自由落体运动中，逐渐走向崩溃，那些在经济扩张时期以低息贷到美元的国家或企业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美元去偿还到期的债务。因此，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迅速增加，其他国家或企业纷纷抛售其他资产以筹集现金。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价格上升，抑制了美国的经济活动，扩大了美国预算赤字的规模。国际市场上突然多出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其中很多资产后来都是由美联储系统购买了下来，这一举动为世界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美元现金。但由于这一举动发挥作用的速度可能很慢，无力阻止大规模非美元资产的抛售，对美国经济活动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后来，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机制，为全球金融体系直接提供了高达接近6 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有效应对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后来，当危机趋于缓解之际，这种货币互换机制逐渐解除。

在这些情形下，之所以出现失衡问题，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无法容忍国际市场上的某些调整，比如美元价格的大幅上涨，或者说非美元资产的恐慌抛售（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所以，他们便以某种其他方式缓解市场调整造成的影响。只要亚洲各国央行和中东产油国继续希望持有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只要它们继续认为美国政府

的债券是最安全、最好的选择，美国的账目就有可能实现均衡。一方面，石油和商品流入美国，美国为出口国支付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将长期与短期的国库券出售给其他国家，从而回收美元。从原则上来讲，这两个方面是完全匹配的。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即赤字）不可持续呢？有些人担心政府的债券市场可能会关闭，从而出现债务违约或者政府破产的情况。但这几乎不符合人们对公共财政和债务市场的理解。要知道，债券是以美元发行的，美国政府控制着这一法定货币的发行权，可以用美元现金去偿还债券。如果市场参与者有别的什么想法，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比如提高长期国债的利率。政府债务的确有可能达到法定上限，但这是国内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便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也会想办法提高债务上限。除了这种情况之外，美国政府是不可能在美元债务上违约的，而且旨在保护债务人利益而对债权人实施破产的法定程序也不会用到美国政府身上。

一种较为合理的担忧是通胀以及美元贬值。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美国政府债券的实际收益率。的确，人们有很多理由担心通胀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这个石油资源短缺的世界中，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威胁仍然非常严重。事实上，长期以来，为了减轻外债压力以及出于其他考虑，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压低美元汇率的政策，至少试图压低对一个重要币种——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但无论是石油价格走高，还是美元贬值，都不足以引发政府债务违约，而且从其内在性质上来讲，这两种情况也是“不可持续的”。

预算赤字导致恶性通胀的情况更是不足为虑，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仍然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判断，人们之所以担心恶性通胀，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赤字催生的资金不会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任何影响，反而抬高了物价，或者有朝一日其他国家会恐慌性抛售

美元债券，以获取欧元、日元或人民币，去购买其他国家的债券，比如意大利的债券等。但这些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变成现实。这些对黄金痴迷的国家的确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但好在它们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的、动荡的市场，而且在我写这本书之际，它们的市场正在萎缩。

此外，国会预算局的经济预测也表明恶性通胀的情形不大可能出现。国会预算局的预测结果通常会得到广泛引用，以证明通胀之路不可持续。该局的预测坚定地认为美国通胀率会保持在当前水平，即2%左右。当然，这种预测也许是错误的，但人们不能既担心恶性通胀的威胁，同时又援引该局做出的预测，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但国会预算局确实发出了一个警告：根据它的预测，美国联邦政府不采取增收减支措施，并对现行社会保障项目进行改革，美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不断上升，到21世纪中叶将达到300%，而且净利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将超过20%。这个预测一经公布，就被各种关于金融可持续性的讨论引用，得到广泛接受，被视为一种基本事实。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前顾问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上升的情况。他的数学计算公式使得我们能够明确地探讨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注我们可以说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上升之路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出现失控的、爆炸式的上升。他明确地指出，在未来某个适当时机，政府必须改变固有的发展之路，防止这个比率出现爆炸式增长。（我们虽然可以这样说，但无法明确说出实际的不良后果是什么，因为这取决于不同的国家，取决于不同的制度背景，取决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关于“不可持续”的政策路径，一种常识性的定义就是最终必须改变的政策路径。不可持续的政策未必是不可取的。比如，在一场危机中，你或许会采取某些临时措施（比如减税、刺激计划、量化宽松政策等），这些措施虽然在这些特定时刻是可取的，但你并不想永远维持下去。相反，可持续的政策也不一定是可取的。就目前而言，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以一个合理的定义去判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何时是可持续的，以及何时是不可持续的。关于“可持续”的政策路径，一种常识性的定义就是可以一年又一年地、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政策路径。因此，任何一个最终稳定下来的路径都可以说是可持续的，即便最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我们看来非常高，只要稳定下来即可。在这里，我们虽然这么讲，也没有明确说明有关的具体经济条件。

将这个公式用于2009年的希腊，就得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例子。2009年，希腊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113%，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为4%，经济增长率为负2%。根据比特的数学公式来看，如果希腊希望自己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保持稳定，就必须将基础预算盈余从负值转变为正值，且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5%。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因为财政紧缩进一步引发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到了2010年，希腊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升高了15%。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一下美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2011年，国会预算局预测，5年之内，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将从负值上升到约3%，即利率为5%，通胀率为2%，真实经济增长率为2.5%左右（但我们也可以根据1962—2010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将其修正到3%）。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初始比率为0.74%，我们假设基础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并且无限期地维持这个高水平。计算结果表明，虽然美国的债务问题没有希腊严重，但也是不可持续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会稳定上升，到21世纪中叶达到大约300%的水

平，与国会预算局预测的水平是一致的，但在此之后，还会持续上升。

然而，基本赤字并非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我们把假定的基础赤字从5%提高到7%（比如因为医疗费用出现了不可控制的增加），我们就得到了同样的模式：负债比率稳步增加，但不会呈现爆炸式增加。同样，如果我们降低基本赤字，降低到任何大于零的数值，那么美国的债务之路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假定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利率是基本相等的，那么，如果公共债务要具有可持续性，必须出现基本预算平衡。也就是说，只要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任何基本赤字都是“不可持续的”。

但这些假设合理吗？特别是，利率的假设合理吗？假设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为3%合理吗？比特在其论文中只是声称发达国家的政府将面临公共债务实际利率为正值的情况，而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从经济角度来看，通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主权国家能够控制自己的货币，因此不会出现债务违约。为什么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钱应该需要承担风险，而对于一个投资者而言，安全性就是价值的一种体现，没有理由去要求一个百分之百安全的债务国的债务利率为正值，即便利率为负值，联邦政府也不需要补偿投资者的风险。联邦政府通常不会竭力去消灭通胀，也不需要发行太多的长期债券。长期债券通常利率较高，这对银行而言是一个利好，因为银行通常持有大量的长期债券，利息是它们收入的一部分。此外，美联储控制着公共债务的短期利率和期限结构，所以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以接近于零的利率发行短期债务。

从1945年到1980年这36年间，考虑到实际通货膨胀率，其中有18年公共债务的平均实际回报率是负值。1946年到1947年出现了“二战”后的首次通货膨胀，实际回报率只是“轻度负值”（slightly

negative）。只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实际回报率才变成了“高度正值”（highly positive）。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个原因是1981年沃尔克反通胀运动，另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消失后的很长时间内，长期利率居高不下。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市场利率的下跌，再加上“9·11”事件的影响，利率最终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到2005年前后，公共债务平均实际利率跌破了2%，甚至在某些年份跌破了1%。今天，由于通胀率偏低，再加上政府减少了长期债券的发行规模，对银行业的利润造成了冲击，所以公共债务的平均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值又具有了可能性。

简而言之：错误的假设产生可笑的结果。在预测经济底线之前，国会预算局鉴于其预测的5年之内的通胀率偏低，便假定债务的名义短期利率上升到4.5%左右，或者说实际利率上升到2.5%左右。（该局假定长期利率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种假设条件本身就足以确保美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不可持续的。但这种假设与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出现了多次冲突。美联储已经多次延长了零利率政策，希望将这种政策维持得更久。此外，如果实际情况真如国会预算局所假设的那样，对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利率上升会冲击股市、债市和早已低迷的房市。但国会预算局偏偏做出了这样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预测经济前景，并且预言灾难不会发生。其实，如果实际情况真如它假设的那样，灾难显然是会发生的。

如果我们允许当前公共债务的平均利率（1%左右）持续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实际利率就会维持在“适度负值”（modestly negative），即负1%左右的水平。即便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都会维持在令人震惊的5%的高度，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不会无限期地升高！相反，会稳定在130%的水平，略高于1946年122%的峰值。其实，130%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但会稳定下去。根据“可持续性”的定义，这种情况不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假设我们想避免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出现任何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做呢？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变化就是将基本赤字从5%降低到一个可持续的数值。2011年，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74%，如果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采用原先的假设，那么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需要降低到3%以下。虽然这个数字仍然很大，但要很快达到这个水平，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削减公共开支和增加税收抑制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债务比率趋稳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然而，如果实际利率维持适度负值，就不必非要尽快降低基本赤字了。这样一来，在未来18年间，如果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根据比特的数学公式来计算，最后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不会超过100%。这样一来，基本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只要降低到4%以下就足以稳定债务率了。要使债务率趋于稳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形势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大约50年之后，债务率将回到最初的稳定状态。

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利率假设可谓是利弊兼有。如果假设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那么债务率就很有可能不会趋于稳定。要让债务率趋于稳定，那么就要让具有抵消作用的基本盈余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这个水平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而在美国，要想实现这个水平的基本盈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削减支出，降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税收收入。然而，实际利率可以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值，这样一来，即便存在基本赤字，而且债务负担和赤字规模会越来越大，但由于能够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债务形势也是可以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共债务负担沉重的大国仍然可以背负巨额赤字，并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美国尤其如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中断过。

与其他大型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的处境更好一些，因为美元扮演着全球货币的角色。美国发现，它只要为世界货币资产提供一个流动性强的、安全的市场，就可以在低通胀环境下把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甚至维持在负值的水平，这样一来，即便基本赤字相当大，美国也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不会遭遇任何麻烦。虽然这种特权有些过分，但这恰恰就是美国没有沦落到希腊这种境遇的原因。

如果无风险、流动性强的美国债券维持一个合理的实际利率，那么美国当前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是可持续的，尤其是在经历了温和的经济复苏之后。但国会预算局的假设却是美国公共债务的实际利率必须高于实际增长率，这种假设本身就造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预测结果，否则不会出现现在的结果。这不符合经济逻辑和经济史。改变这一假设，就会扭转公共债务的长期动态。根据国会预算局的预测模型来看，如果债务实际利率维持在低水平，那么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不会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其实，没有必要为了实现债务可持续性而采取激进的措施去削减未来支出。如果美国在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路径上再走上15年或20年，经济增长率为正值，通胀率维持在较低的正值，那么虽然未来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将会比现在高，却不至于超出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也不会超过其他富裕、稳定、繁荣国家的最高水平。到最后，这个比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增长之后，会开始逐渐下降，美国1946年到1980年之间就持续出现了这种形势。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降低美国联邦债务的利率呢？是什么决定政府的利率呢？是由私营金融市场决定，还是由中央银行任意控制的政策决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关于金融政策的讨论。正如诺姆·沙伊贝尔在《逃脱艺术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劳伦斯·萨默斯之所以拒绝克里斯蒂娜·罗默提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是因为他觉得

这些数字将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推高利率，以至于最后被事实证明弄巧成拙。根据沙伊贝尔所说，萨默斯相信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因为市场才是最终的主导者，市场不会允许这种做法。

另外一种观点却认为，美联储已经完全控制了短期利率，尤其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即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正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011年劳动节那天的美联储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当我们2007年8月在杰克逊霍尔召开经济研讨会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是5.25%。16个月后，金融危机如火如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几乎降低到了零。”5年多过去后，这个利率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推断出，当市场认为美联储未来会提高短期利率时，长期利率就会被推高，不过这种市场恐惧情绪几乎完全处在美联储的掌控之下。这与私营部门对借款的需求被挤占无关，也和通胀无关，政府会采取抑制通胀的措施。此外，即便长期利率开始上升，联邦政府仍然可以以近乎零的短期利率向美联储发放债券。它或许有许多不这么做的原因，但只要央行还在发挥作用，就仍然有能力这么做。在金融危机期间，央行可谓是用尽了自己的一切权力，对经济运行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有人认为联邦政府现在或未来需要平衡其账目，有人认为如果联邦政府想平衡账目，肯定能做到，还有人认为政府将来某个时间必须偿还从日本、中国或其他国家借来的款项。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日本、中国以及其他所有持有美国债券的国家都会在适当的时机购进它们想要和需要的美元资产，它们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持有了多少美元资产而改变这种需求。事实上，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要求美国政府背负巨额预算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去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它们希望持有的美元资产，美国政府为其

债务支付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央行的控制。因此，如上所述，只要美国的中央银行不采取愚蠢的、破坏性的行为方式，美国的债务格局永远不会失控。

谢天谢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潮还没有征服每一个人，并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某种金融末日。即便抱有这种思想的人，有时候为了处理更为紧迫的问题，也会觉得有必要暂时放下这种思想，赞成政府增加赤字和债务。凯恩斯主义的常识和实践也警告他们不要过快地削减公共债务给私人财富带去的扶持作用。有些人虽然觉得歇斯底里地呼吁政府削减赤字和债务的行为不可取，但态度也不是很坚定，有时候也会赞成赤字和债务。一种说辞认为，实现财政平衡是责任的体现，是美学的体现。这种说辞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对“零”，或者说对“均衡”的崇拜已经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总的来说，这种崇拜的作用就是为关于债务和赤字的讨论找到一个“中枢”，找到一个适度的标杆。根据中枢论，中间的、适度的、明智的立场就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然后，一旦复苏过程稳步推进，就开始转向紧缩。鉴于目前出现了一种超级疯狂的观点，即政府应该立即削减预算，“中枢论”在自由辩论中就变成了受人尊敬的、开明的标杆，似乎成了合理的事情，似乎人性化的、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就应该如此表态。

但这种“中枢论”其实并不合理。它假定经济肯定会复苏，假定经济肯定会恢复正常状态，不仅要求我们集中精力去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稳定金融系统，还要求我们放眼未来，通过立法措施去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方面的支出，因为在联邦政府的支出项目中，只有这些项目是通过固定的公式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每年都要根据具体情形核定数额，因此，只有这些项目可以提前好几年做出削减。

这种观点为什么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搞“福利改革”呢？不可能是因为政府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方面的支出会对资源配置产生什么有利的影响，从而满足保守人士对于削减政府规模、向私营部门释放更多资源的渴望，因为这些转移性支出类的福利项目不会为了公共利益而侵占私营部门的资源，更不会剥夺整个私营部门的资源。这类项目只是对私营部门的收入进行了重组。很多批评者都把这类转移性支付项目与其他可能减少私营部门可用资金规模的项目（比如国防采购）搞混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这么做。

相似地，那些认为这些项目的赤字会引发严重经济后果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混淆了私企行为与公共基金的区别。公共基金是大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赤字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梳理了这些“混淆”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鼓吹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人只是不喜欢公共部门提供的保险而已。

2011年夏季，民主党和共和党由于担心预算赤字与债务赤字继续增加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就大幅削减政府财政开支的计划达成了共识，联邦政府的开支将从2013年起的10年内自动削减1.2万亿美元，其中一半要从国防开支中减下来，另一半则落在其他政府开支项目上。除非国会通过新的法案，否则该计划将于2013年1月自动生效。这样一来，“财政悬崖”[注]就出现了。这个协议或将导致联邦政府陷入瘫痪，从而迫使国会通过长期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项目开支的法案。财政悬崖催生了“自动减赤机制”。我在撰写本书之际，该机制正在引导美国的财政立场转向紧缩，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放缓经济增速，并且再一次导致经济依赖它的自动稳定机制[注]。万幸的是，在2013年秋季，一场企图利用债务上限毁掉《平价医疗法案》的努力失败了，但反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行为还远未结束。只要人们继续允许完全以荒谬假设为基础的、不现实的、一味悲观的财务预测去影响辩论过程，这种压力就会继续存在。

---

1. 现值债务率是在经济上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债务水平的指标，即该债务国当年未偿还债务的现值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译者注

2. 比特提出的计算公式是Δd= –s+ d*{（r–g）/（1+g）}，其中，d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初始比率，s是“基本盈余”，或者说扣除净利息支付（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后的政府预算盈余，r是实际利率，g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3. “财政悬崖”用来形容2013年1月1日自动削减赤字机制启动后，会使政府财政开支被迫突然减少，使支出曲线看上去状如悬崖。——译者注

4. 收入自动稳定机制，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膨胀，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减轻萧条，无须政府采取任何行动。——译者注

第十三章
欧洲会有危机吗?

从一开始，无论在表述上还是框架上，欧洲的经济危机和美国的经济危机都不相同。在希腊，我们经常听到“希腊危机”。提到希腊时，我们也会听到这个词。这个术语主要指的是希腊的财政状况和政府的行为。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情况类似。因此，危机不只有一个，而是五个，每个危机都有各自的起因。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政府机构浮肿，税务系统充满缺陷，政治系统裙带关系泛滥，文化风气懒惰散漫；爱尔兰放任其房地产投机行为，随后又懊悔地将所有的保证金存在其臃肿的银行里；西班牙的住宅房地产泡沫十分巨大；葡萄牙的工业则缺乏竞争力。以上种种，不一而足。

当然，这些说法都没错。然而，这不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唯一框架。例如，如果把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就得到“PIGS”[注]这一缩略语，意为“欧猪四国”，有时候是“PIIGS”，意为“欧猪五国”。这个缩略语是为了描述欧洲地中海周边这几个国家的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到底是什么，却几乎没被提到。但这个缩略语所表达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出了这些国家在危机期间共同承受的苦恼。如果我们记得今天尚未完全消除的美国种族成见，就会发现情况相似。当然，这些说法都不对。例如，希腊的工作时间比德国长。我们也不完全清楚，爱尔兰人怎么样才能成为喜欢太阳、慵懒的南方人中的一员。也许是音乐的问题。

如果这次危机主要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种族）因其自身结构的弱点和政策的错误受到损害，那么危机的解决方法就清晰了。那就是改革。国有机构必须改变；国有政策必须改变；个人习惯必须改变；

文化必须改变；支出必须下降，税收必须提升；劳动市场必须变得灵活；工业必须变得有竞争力；政府调控必须停止；公共财产必须出售；人们必须习惯艰苦奋斗。改革的成功会恢复国家的自信心。自信心是信贷市场的礼物，它是市场认可的标志。当自信心降低时，利率就会上涨；当自信心恢复时，利率就会再次下降。[注]逻辑上，这是应对国家或种族危机会取得的成效。

可是，对北欧来说，喜爱阳光的南方人这一鲜明的种族形象并不新奇。希腊的弱点或西班牙房地产业过剩这一事实也广为人知。因此，试图从稳定的国家现状来解释金融危机，注定不会让人满意。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危机会发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情况如此不同的国家，危机会几乎同时发生。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意识到国家是紧密联系的。当然，这些国家都是欧盟成员，它们肯定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们要把分析转向欧洲本身，这时，其他的问题就出现了。特别是：为什么危机发生在欧元区内的国家，而不是像波兰这样属于欧盟但不使用欧元的国家。这相当于问，欧元区怎么了？

那些从泛欧洲角度来研究欧洲危机的人知道答案。在欧元区内，德国拥有优势，造成大量贸易不平衡，这就是问题。这使得欧元区其他国家积累大量债务，又因欧元不灵活，无法很好地调整过来。

在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当相对花费固定，并且经济中心相对其他地方竞争优势不断扩大时，就会出现贸易不平衡。在欧洲大陆，从工业时代开始至今，德国一直是经济中心。而位于中心或接近中心所拥有的优势不仅局限于工业，这种优势甚至延伸到农业。在农业上，即使北欧气候条件不好，但它拥有更优越的工业能力，因此还是比南方有优势。所以，比利时只能出口莴苣，荷兰只能出口鲜花（虽然它们

还生产其他的产品）。科技和组织方面的不断领先造成在许多贸易分支中，成本大不相同，而位于中心的国家更有优势。

但这不是德国成功的唯一原因。德国的劳动市场经历了大幅度的改革，即我们所知的“哈尔茨改革”。现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的工作收入，按过去的标准来看是十分低的。（实际上，大多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欧盟低收入地区的移民，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人。）这让德国在单位劳动成本方面更有优势。同时，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在地中海周边国家，经济增长使得单位劳动成本也相应上涨。因此，自欧元诞生以来，相对于意大利、希腊或西班牙，德国的优势增加了20%多也不足为奇。因为欧洲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大体处于平衡状态，德国本已庞大的贸易顺差又不断增大，南欧便不可避免地承受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

在欧元区的建设中，这种局势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洲的建筑师们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为地中海周边国家提供资金，以促进它们的发展。这些机构包括为基础设施投资的欧盟机构基金、欧洲投资银行以及欧洲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委托不同的机构管理。然而，这些基金都无法抵消德国优势所带来的副作用。并且，基金本身带有的条件（政府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又使得它们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因此，在经济危机中，当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时，它们却变得无能为力。

起初，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可能是属于国家的也可能是属于私人的。这取决于借贷者是购买德国潜艇的希腊海军，还是购买德国装备的西班牙建筑公司。但不管是哪种，因利息而产生的债务都会不断增加。只要这些欧洲国家的利率保持低水平，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当碰到麻烦时，债务就无法偿还。银行要提供贷款和承担损失，为了拯救这些银行，政府便迅速贷款来支付这些本是私人性质的债务，这些

私人债务就成了国家的包袱。因此，这些地中海周边国家的问题尽管大不相同，最后都变成了国家的经济危机。

这个说法和之前的不同之处在哪儿？首先，最关键的是，它使人们注意到德国的工业和政策如何造成了欧洲的经济危机。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任意借贷、任意购买和任意建造这些不良行为。我们还看到，那些“好”的方面，如优势工业的发展、低水平的收入增长和受限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关键。其次，这个观点使人们看到德国的（和法国的）银行起的作用。这些银行为南欧国家放贷，也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由于银行也面临违约风险，德国的（和法国的）决策者们也意识到，任何应对危机的措施首先要在本国大银行的承受范围内。

如果说欧洲危机是贸易竞争力的危机，那么欧元区实行统一汇率，共同货币不能贬值，债务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提振出口、增加储蓄，以缓解债务压力的事实又导致债务国改革引来了众多非议。债务国改革的目的据说是通过“内部贬值”的方法削减工资和养老金，裁减政府雇员，减少劳动力成本，改善负债情况。这种改革思路认为，德国技术优势会被意大利或西班牙较低的工资成本抵消掉。但如果有多种货币而贬值其中之一，将一举实现同样的目标，也不需要打破工会、劳动合同或劳动法规。债务国改革的策略只是一个低效的和痛苦的选择，无助于恢复信贷市场信心，但可以缓解一个（显然是不幸的）局面，即欧元区已经把自己困死在一个严格的货币政策框架之内了。与此同时，它也承认，如果“改革”政策可以行得通，会奏效，那么德国人将购买更多的西班牙商品，失衡问题将得到缓解，危机将趋于终结。只不过问题在于，没有贬值的可能性，这个过程过于漫长和痛苦。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批评欧洲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开始从竞争力视角去审视欧元区危机。他们认为，有效的、高效的解决方案不

一定是痛苦的，有可能是快乐的，因为与金融抑制政策相比，金融扩张政策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失衡现象，甚至可能会更轻松。比如，让德国放弃紧缩政策，放松财政纪律，转而采取扩张政策，提高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这样，德国消费者就会更加愿意打开自己的钱包，德国进口规模将上升，贸易顺差将会收缩，竞争态势就会恢复平衡。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如果这种论点对欧洲而言是正确的，那么对美国而言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必再担心不稳定的能源价格、脆弱的世界秩序、节省劳力的技术变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相反，如果人们承认这些障碍存在于美国，那么它们同样存在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那种情况下，有必要再次提升分析框架的层次，这一次从大洲层面提升到全球层面。

如同欧元区一样，美国也很大，多样化特征显著，占据了一个大陆，也拥有单一货币。因此，欧洲危机演变过程就可能会促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的经历为什么不同于美国的经历呢？特别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在危机爆发五年之后就实现了稳定，而欧洲经济却做不到呢？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美国经济能够长期背负沉重的预算赤字，而不会陷入严重的金融困境，所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全国的购买力，防止内部需求的彻底崩溃。这个答案是很轻松，但也是错误的。这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主要区别，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几乎与美国一样，也背负着巨额的预算赤字，也受惠于“收入自动稳定机制”。这是真实的，特别是欧元区内部的德国、法国和欧元区之外的英国，更是如此（英国推出了自己的紧缩计划之后，金融形势开始出现不稳定迹象）。这三大经济体都没有出现重大的公共信贷问题。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更加符合逻辑的答案就是欧元区给自己强加了紧缩措施，而美国没有，这就意味着欧元区所有国家都必须

以某种方式限制财政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大部分人口都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备受煎熬地度日。如果一些加州人为了逃离本州的预算危机而搬到科罗拉多州，那么没人会在意，但希腊人要移居德国却并非易事。

虽然欧洲的大国可以承担沉重的预算赤字，小国却做不到，它们也不能像大国那样通过增加预算赤字来稳定金融形势。如果德国采取了金融扩张政策，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希腊能得到的好处就是德国游客选择去希腊度假，但这些德国游客同样也可以选择土耳其和西班牙。小国也不能像处在类似情况下的拉美国家那样单方面违约，不然，就会违反对欧洲伙伴国的承诺，甚至有可能承担被迫退出欧元区的风险。简而言之，欧元区的问题是实力较弱的成员国缺乏有效的自动稳定机制。

欧洲与美国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危机背后的债务的性质。在美国，问题贷款主要是发生在私营部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例外，比如底特律市政府的破产，但总体上来讲，政府信用仍然较好，目前问题主要发生在私营部门，一般情况下，州政府不会为抵押贷款承担责任。私人抵押贷款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偿还，要么出现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业主最终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无论哪种方式，债务都不是永久性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业主可以借此机会逃避债务。虽然丧失房屋赎回权是一个悲剧，但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不算很大的劣势，因为随着房价下跌，房屋的实际价值已经低于贷款总额了。其他债务也可以通过破产法院清理掉（学生贷款除外），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不愉快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美国市政当局的债务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清理掉。

欧洲公共债务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债务方是政府，债权方是大型银行、养老基金、欧洲央行等机构和基金。如果没有事先达成共识，欧洲政府不能违约。所以，债务方通常会备受债权方的束缚，不

得不就偿债条款和债务展期的问题一次次地进行谈判，经常会被迫同意严格的紧缩计划，以免被债权方指责，并防止全面违约。由此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小国被置于一种不断衰落的过程中，它们的债务收入比率持续上升，并且每一轮紧缩政策都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

欧元区是一个富裕的地区，目前仍然保持着整体稳定，只不过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这几个小国处于即将崩溃的状态。按照欧洲标准来看，这些国家不是非常富有，工业也不是很发达。它们的社会机构往往相对较弱，移民其他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多。财政紧缩措施成了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同时导致很多人陷入贫困状态，年轻人几乎不可能找到什么正式工作。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选择了移居其他国家，从而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也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这些国家处于无助的状态。与此同时，在两个更大、更强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虽然不至于这么无助，社会形势也没有那么紧张，目前也陷入了经济滞胀。

这种形势发展到最后，肯定有些国家承受不了而爆发社会危机，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拒绝接受本国政府和欧盟的指令。比如，2013年夏季，希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希腊政府以浪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为由，宣布将暂时关闭该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ERT），此举将导致2 500名员工失业，只有部分人员在公司重组后能回到原工作岗位。消息公布后，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总部大楼附近就聚集了大批来自该公司的员工以及各大媒体工会的成员。普通民众也参与了示威。这种僵局持续了两个月。在早期的动荡中，希腊联合政府失去了一个执政伙伴，在议会中仅有3个席位的优势。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希腊的政治局势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反对本国及欧盟当局的“政治反抗”。

由于欧洲建立了一体化的架构，这种反抗对美国的危害更为严重。尽管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当金

融危机席卷该国，欧盟和欧洲央行肯定会就如何应对希腊局势做出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肯定也会直接影响其他陷入困境的国家。比如，如果意大利陷入了类似的危机，这些决定肯定也会被应用于意大利，但意大利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的10倍，而且国内民众的不满程度不亚于希腊民众。因此，如果欧盟对希腊过于妥协，肯定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如果对希腊提出苛刻的削减支出要求，迫使希腊走向全面崩溃，那么市场肯定猜测其他危机国家也会步希腊后尘，从而引发疯狂的投机活动。无论怎么样，希腊等陷入危机的国家要么全面改变现有政策，拒绝欧盟的指令，要么就会把欧元区拖垮。目前，除了这两种情形之外，似乎也看不到其他情形了。

从制度层面去理解欧盟危机，似乎有些帮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欧盟类似于一个松散的邦联，而不是一个联邦。欧盟的问题与邦联制度存在的一些传统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仅仅从制度角度去分析就足够了吗？这样并不能解释危机发生的时机，也就是说，既不能解释为什么多个欧洲国家几乎同时走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危机几乎与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及其他有关事件发生在同一时间。显然，这个问题存在一个全球维度。

全球维度不难找到。首先，美国很多金融机构的有毒抵押贷款衍生品在欧洲销量很大。比如，欧洲多个国家的机构和政府都购买了雷曼兄弟的有毒资产。美国很多金融机构都在欧洲各地设有分公司，而且欧洲当地也有很多类似的公司。此外，欧洲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深度参与了美国市场，就像美国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深度参与了欧洲市场一样。因此，当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崩溃之际，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陷入危机的欧洲国家也遭到拖累，这些国家的债券遭到疯狂抛售。全球投资者转而选择更为安全的大国政府的债券，比如美国国债、德国国债和英国金边债券，结果导致“弱势”的债券收益率上升，“强势”的资产收益率下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将欧洲问题的分析框架提高到世界层面会立即让思路变清晰。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实力弱、风险大的客户，无论来自私营部门，还是来自公共部门，都难以借到资金。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所描述的美国遭遇的金融问题，其影响并不仅限于美国。怎么可能仅限于美国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受到冲击，有些是政策导致的，有些是投资者自己的主观意图导致的。能否获得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是否抱有善意。欧元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脆弱的架构。一直没有被打破的欧元虽然实现了预期效果，能够帮助较为弱小的欧洲国家吸引国际资本，但当全球信贷市场失败，国际资本逃离，提供欧元的机构也失败之时，欧元区的繁荣景象也将一去不复返，采用欧元的小国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认识到信贷市场崩溃的全球性，也就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计划不能解决其经济和债务问题，因为它的信贷市场与其他国家的信贷市场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主权投资者都知道其他主权投资者不会孤立地审视每一个国家，而会综合审视所有投资者的行为。即使欧元区的形势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下来，或者略有缓解，欧元区某个成员国发生的干扰因素也很快会被其他成员国感知到，一旦某个国家爆发危机，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将受到拖累。无论这些国家做得多么好，无论多么忠实地实施紧缩方案，无论多么愿意忍受阵痛，这些美德在一个一直寻求安全的信贷市场上都不会得到回报。

一个最简单的总结就是：美国与欧洲的危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出现的危机，只不过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制度差异使得欧洲问题更严重，更不稳定。但最终这两个地区在实现全面复苏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严重的、棘手的困难。这个危机正在延续，尚未解决，而且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情况，并问一句：究竟该怎么办？

---

1. 2011年，在里斯本的一次会议上，葡萄牙首相也参与其中，我提出“PIGS”真正的含义是“主要煽动者，高盛集团”（Principal Instigator, Goldman Sachs）。大家掌声热烈。
2. 2010年，在波罗斯岛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的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向我保证，如果坚持改革，6个月内，希腊的债权会重新成为欧洲信贷市场的宠儿。我赌上50欧分。
3.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左翼党均支持恢复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后来希腊民主左翼党退出联合政府，这标志着希腊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议会300个议席中仅剩153席，比反对派多出3个席位。——译者注

第十四章
超越乐观与悲观

对资源成本和资源租金的分析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组成部分，但“二战”后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却抹掉了这一点。它必须回归。我们必须修正凯恩斯、明斯基、罗斯福新政、投机活动、金融欺诈以及有效市场理论给我们带来的经济认知。一套新型经济理论必须考虑到资源因素和制度因素，认识到要实现高效生产，技术和固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但资源成本的变化可以使任何固定的制度变得脆弱，足以摧毁人类的任何制度。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积极倡导的组织经济学就属于这类新型经济理论。他的理论强调指出大而复杂的系统虽然高效，但过于僵化。它们受到了规则、操作程序、技术和习惯力量的束缚。一旦环境改变，它们很容易失去效率。一旦遭到不利环境的削弱，它们就容易滋生内部不稳定因素，出现欺诈、掠夺和抢劫的现象。这样一来，纯粹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的资源成本问题和合法性问题其实属于同一个概念框架下，效率性和脆弱性是这个系统的两个方面。

在当今经济学界，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劳伦斯·萨默斯以及其他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立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解决方案很清楚，唯独欠缺的就是对经济的理解和政治意志。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效的总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全面增加支出，即政府、企业和家庭要增加支出，同时还要刺激外国人增加支出，从而扩大出口。这个简单的论调旨在反击那些主张大幅削减赤字和债务的狂人们。这些狂人在充斥着各种规则和标准的世界里泥足深陷，用会计关系和财务报表为自己制

造枷锁，对债券市场敬而远之，对中央银行充满畏惧，大力呼吁削减赤字。与这些狂人相比，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萨默斯的立场还是颇为实用的。

但事实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过去情形下有效的措施，现在不一定同样有效。经过对本书前文内容进行总结，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清除了阻碍经济刺激的政治壁垒和意识形态壁垒，即便我们对罗斯福新政进行全面更新换代，再拿出与过去如出一辙的政治力量和团队精神，在实现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的道路上，也至少还有以下四类障碍。

第一，能源市场依然成本高企，充斥着不稳定因素。能源价格决定了包括食品在内的其他所有资源的价格，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需要依赖价格低且稳定的能源（包括石油、煤炭以及后来出现的天然气）。这个时代就创造了以大量使用能源为特征的、固定的技术系统。在固定的技术系统下，30美元一桶的石油和超过100美元一桶的石油带来的差异是翻天覆地的。价格低廉的石油能够产生高利润和高增长，而价格昂贵的石油产生的利润微薄，盈利和亏损交替，经济增速则会放缓，甚至负增长。

此外，几乎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世界已经习惯了波动的石油价格，不会再认为石油价格将保持稳定不变。如果需求急速上涨，投资者们就会意识到囤积和投机活动将促使能源价格上扬；而当价格上扬的时候，先暂时囤货，等到价格更高时再出货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做法。不稳定的资源价格会打消私人资本对能源市场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当价格高企的时候，新的资源消耗型投资会变得无利可图，导致此类型投资行为减少；当高成本的能源产量在高价格的刺激下越来越高时，接下来又会导致价格下降，导致这些投资（包括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减少。就这样，成本的不确定性放缓了经济活动的节奏。

在当前的北美地区，很多人认为页岩气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为下个世纪提供一个新的廉价能源。毫无疑问，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页岩气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蓝图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因为天然气在北美的成本远远低于俄罗斯向欧洲所供应的天然气。但页岩气能否在较长的时间内可持续地生产，前景尚不清楚。原因非常简单，页岩气开发技术存在的时间不够长，不足以判断这些天然气能开采多久。我们不知道它们能开采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就无法开采了。只有时间能说明一切，但也有可能当时间说明一切的时候，就是页岩气奇迹结束的时候。

第二，美国及其盟国再也无法对当前的世界实行有效的经济控制和军事控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争机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半公开的军事控制网曾经南起拉美、非洲，横贯亚洲和中东，如今却所剩寥寥。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崛起的经济大国，现在无论哪一方面都已经非常独立，它们与美国激烈争夺稀缺昂贵的资源，无论是用武力，还是用欺骗手段，都无法进行抑制。目前托了惯性的福，再加上欧元区和其他地区目前暂时没有对策，美国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地位虽然有些衰落，但好在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第三，在当前这个时代，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正发生着彻底的变革。数码科技破坏了信息传递、生产、库存管理、配送和营销在之前所形成的结构。新科技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它们摧毁的工作岗位要少得多，而且被摧毁的工作岗位常常都是集中在低薪的职业类别、地区和国家。早在21世纪伊始，创意大爆炸带来的高端科技领域（主要在美国）就业繁荣就已经结束了。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科技也会倾向于缩小付费和盈利的经济活动范围，汽车科技和家用科技在机械时代曾经对就业率带来的积极影响正在扭转。就这样，经济机会（比如建立新企业的机会）随着工作的流失也在减少；而随着工作的流失，无论是处于何种薪资水平的人，收入都随之下降了。这也导致公共支

出项目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除非该项目直接用于创造工作岗位（在现代世界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或者给失业者提供经济收入。

第四，私营金融部门再也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金融投机驱动下的经济行为模式推动了经济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在银行支撑下，风险资本为我们带来了信息技术的繁荣期。但信贷支持下的最后一波商业繁荣在2000年也终结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波了。在之后的10年间，面向家庭，而非面向企业的住房抵押贷款在不动产、新居建设和借贷消费领域催生了虚假繁荣。但这种繁荣景象在2007年戛然而止，导致大量美国业主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以至于将近10年之后，私营信贷市场依然处于停滞状态，企业、建筑业以及家庭消费领域的信贷市场都没有复苏。

简而言之，公共部门的需求受到了抑制，而私营部门也无法通过新增信贷创造需求。因此，市场需求不会完全恢复。即便需求恢复一些，资源市场的价格波动以及更多节约资本与劳动力的技术的运用也很快就会消除这些需求。

有些人可能非常喜欢这些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增长的世界呢？我们已经非常富有了，难道我们拥有的还不够多吗？考虑到碳排放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如果经济继续增长，我们能承受住其负面影响吗？

但这种希望经济停止增长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忽视了私营企业的逐利性。一般来讲，经济增长为私营企业创造了获取利润的机遇，经济负增长，就意味着整个商业界都会蒙受金钱上的损失。如果商业界的总利润没有增加，那么经济游戏就有可能是零和游戏，或者更糟糕的是负和游戏，这就意味着那些少数赢家的利润是以其他大多数人的损失为前提的。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掠夺者会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人们会高估自己的盈利机遇，使得经济活动得以继续进行下去，但这个世界不会令人感到很愉快，甚至有可能走向不稳定。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那么普遍盈利的前景就会黯淡，私营部门的投资就会少之又少，资本存量就会因为长期得不到运用而贬值，许多技术（包括那些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就无法得到改进。总之，具有投机性的市场往往会导致一个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经济体陷入崩溃状态。

因此，虽然快速增长有局限性，但负增长却会引发灾难。不过，我们仍然有一个选择，即让经济长期保持低速、稳定的增长。我们要切实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准备接受这一前景。我们要追求慢增长：增速高于零，但低于曾经在廉价能源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增速。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然后要谨慎投资，并对多个领域进行持续监管。要连续多年沿着低速增长之路前进并非易事。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形形色色的限制条件，任何人都不会选择这条路。但在我们真正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要想让资本主义经济延续下去，只能寄希望于这条道路。那么，我们不妨问一句：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当资源变得昂贵时，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如果有一些机构赖以运行的固定成本中包括这些资源，那就有必要缩小这些机构的规模。这是财政紧缩的核心智慧所在。比如，18世纪法国外长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对凡尔赛宫开支的担忧是正确的。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对泰姬陵维护费用的担忧也是正确的。在当代美国，两个最值得深思的主要问题就是是否有必要继续耗费巨资去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力量以及维持大银行的生存（与凡尔赛宫和泰姬陵相比，美国这两样东西既不美丽，也不是那么值得继续维护）。

我们不妨放开思维，大胆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美国是否需要当前这种规模的空军？喷气式战斗机除了偶尔实施禁飞区之外，平时派不上用场。F22和F35战机技术先进，成本高昂，对美国政府而言无异于构成了采购噩梦，而且这些战机的维护要求非常严格，或许永远没有机会被部署到前沿阵地。战略轰炸机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总体来看也是徒劳无益的，很少被派上用场。虽然目前有些人仍然鼓吹继续发展战略轰炸机，但即便未来爆发常规战争，这类武器也没有用武之地。如果偶尔需要精确摧毁特定目标，巡航导弹非常有用，而且效率很高。如果要选择性地暗杀部落武装分子，可以用无人机。陆基战略导弹从未使用，也永远不会使用，它们存在的唯一意义是在裁减军备谈判中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近距离空中支援在当前的战争中还是有用的，但主要属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职能。经过这些分析，空军还剩下什么呢？兵力和运输机。这些可以留下来。

那么，陆军有什么用呢？随着1975年西贡的陷落，东亚地区似乎再也不可能爆发地面战争了。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似乎不太可能入侵其他国家了，坦克部队再次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虽然在韩国保持小规模驻军是有必要的，但欧洲和日本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驻军。陆军有时会被派往某些地区（比如波黑）执行维和任务，但大部分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就近期来看，加拿大或墨西哥对美国国土构成的威胁似乎很有限。从长远战略来看，很难看出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哥斯达黎加开创的先例。哥斯达黎加在1948年废除了常备军，如果之后有必要，就会组建新的军队。

至于海军，在海面上可以部署舰艇，以彰显军力和巡逻航道，在海面下可以部署潜艇，以形成战略威慑。可以说，这两个任务都可以在不需要航母的情况下完成，而且在未来战争中，航母很可能在战争早期就被摧毁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平时可能会有多艘航母服役）。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海军是重要的“稳定剂”。原因很简单，如果美国海军很强大，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必担忧了。这是美国为世界做

出的一个牺牲，节约了整个世界的资源，但美国海军的规模或许可以缩小一些。对于规模小却时而会派上用场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不妨保留下来。

下面把目光转向金融领域。银行相当于中介机构，不会直接促进当前消费和商业投资，它们的用途体现在一手揽储，一手放贷，从而为家庭消费或商业投资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但前提是以高效的、负责任的和低成本的方式运行。证券承销业务曾经发挥了这个作用，但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在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蓬勃发展之际，证券承销业务就开始变质了，以至于最后陷入了深度衰落的境遇。银行对经济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巩固。在此过程中，它们还会向贷款者收取一定的利息。金融公司还雇用了一大批优秀的软件人才和数学人才，以期在它们的市场上获得计算方面的优势。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掠夺：除了银行业从业人员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从中受益。

如果没有大银行，美国可能变得更好。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银行业的基本功能就是存款、支付、信用卡和借记卡业务。这些业务完全可以由邮局来承担，也可以由市政府或州政府设立的公共机构来完成，这类机构可以维持低成本的运营，其成员的工资为当地平均的工资标准，而不是像当前这些大银行一样需要高昂成本。规模较小的、地区性的合作银行可以承担起提供商业贷款，以及为家庭发放抵押贷款的职能。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高管的薪酬要低得多，因此会给社会节约一大笔钱。但这种做法未必能够恢复金融稳定，因为小银行的管理者之前可能供职于大银行，而且在大银行工作期间学会了如何分散风险，如何掩盖自己的欺诈行为，到了小银行之后，仍然可能故伎重演。在当前这个计算机时代，像这类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失衡的问题仍然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但如果银行体系分散开来，少一些集权的银行，少一些一手遮天的银行家们，加强对银行的监管，那么银行体系不可能比现在糟糕。

那么，政府是否应该获得类似的待遇呢？事实上，这种待遇已经存在了。在过去30年里，政府提供的工作和服务一直在减少，很多职能现在都自动化和计算机化了，有的被外包了，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一直在收缩。在我写本书之际，政府启动了自动减赤机制，政府支出每天都在减少。但不能把政府称为单一的实体，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实体把自己称为“政府”。政府要履行一系列特定的、多样化的监管和司法职能。政府在履行很多职能时都很高效，对社会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就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这个事实。与银行家和金融界的高管们相比，美国公务人员的工资是非常低的。

收入转移和税收是政府的两个公共职能。这两个项目在公共预算中的数字都很大。但它们几乎不会耗费多少行政方面的资源或者说“真正的”资源。一些歇斯底里地呼吁减少赤字的人认为，社保转移性支付也会像一架直升机的合同或法院那样影响到资源利用，但实际上这属于一种错误的分析，因为转移性支付只是签发支票和税收服务，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私人消费能力，降低一些家庭（比如通过工资税）的消费能力，增强其他家庭（通过签发支票）的消费能力。国家提供这种服务时，所需成本很少，真正的成本只是用电脑记账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票本身的印刷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棘手的福利问题，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看一看社会保险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时代发挥了哪些作用。在美国，福利项目除了存款保险、失业保险和食品援助（以前称为食品券）之外，还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那些为紧缩政策呐喊的人往往会把这些福利项目作为抨击对象。这些人认为应该削弱公共部门在这些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每一个论据都列举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比如，从支持社会保障项目的信托基金的偿债能力到代际核算的概念，从未来的公共预算赤字到未来国家债务的规模等等，各种论据都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结论，即这些福利项目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被削减。当一个问题（比如预算赤字的规模）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消退

之后，另一个问题就会被适时地推出来（比如社会保障福利和工资税系统之间所谓的长期失衡问题）。具有讽刺精神的人可能会怀疑这些论据并不是以严格分析为基础的，或许有些人倡导紧缩政策的主要目的纯粹是为了减少和破坏社会保险计划。

但在经济缓慢增长的时代，一个国家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它需要更多、更强大、更稳定的社会保险项目。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等待充分就业繁荣之后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他在1935年，也就是尚未从大萧条中完全复苏过来之际，就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1933年，在“新政”第一天，罗斯福就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要知道，这个制度给政府带来的风险更大。社会保险是淡化经济风险的“解毒剂”。社会保险的存在使得过度保守性的经济行为失去了必要性，从而鼓励了私营部门大胆去开展投资活动。在一个世界里，如果外部的条件和环境不利于人们追求私利，那么建立一套强大的、普遍性的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生存、残疾、卫生保健和储蓄保险等，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解除私营部门投资活动的后顾之忧，对商业投资起到一种刺激作用。

此外，在未来世界中，还有两个方面会凸显健全社保体系的必要性。一个方面是需要减少经济生活的能源消耗，在消费过程中凸显人文层面的意义（包括增加休闲时间），减少物质层面的意义。另一个方面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人们对于日常信息处理和通信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普通行业的就业与收入水平将远远低于之前半个世纪。资源成本的变化与新技术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会提高一个社会中的人口抚养比[注]。

抚养比上升不是一件坏事。在农业领域，现在一个农民养活的人比一个世纪之前多得多，但没有人会就这一点产生抱怨。农业生产类岗位所需的人口比例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下降了，工业生产类岗位所需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也一直在下降。如果现在

服务业岗位（比如零售、通信、信息管理、会计等）所需人口比例开始下降，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感到遗憾。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领域找到有用的、有偿的工作，并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多做一些有用的、有意义的活动，多做一些娱乐类和社交类活动。利用不断改进的技术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其实并不那么难。只要确保让应该工作的人工作，让不应该工作的人在适当时机退休，让所有家庭的需要得到社保体系的有力支撑，就足够了。

许多人都提出过这个问题。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很久以前就主张政府要想办法保障个人收入。[注]除了弗里德曼，自由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这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近年来，华盛顿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迪恩·贝克（Dean Baker）更是积极呼吁美国效仿法国，在不降低薪酬水平的前提下缩短工作时间。法国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政府早在2000年就实施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要实施个人收入保障计划，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谁有资格获得这种福利？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观点，即为了生活，必须努力工作，因此，如果实施个人收入保障计划，会对社会成员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另一方面来讲，每周35小时工作制（或者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会给企业带来很多挑战，企业将不得不对现有的规章制度做出重大修改，工人工作时间更短了，雇主不得不制定更为复杂的工作日程。同时，一些员工将拥有更多的业余时间，能够做更多的兼职工作。上述这些问题听起来并不是不能克服，但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克服的。

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一个较为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就是放宽工人提前退休的条件，同时完善社保体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老龄员工坚持着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允许他们退休（有的老人一边领着失业救济金，一边忙着找工作），而许多年轻人想找工作却找不到，因为老龄员工没有退

休，没有空缺的岗位。这种情况下，不妨考虑采取一些鼓励老龄员工提前退休的措施。比如，根据当前的经济环境，可以临时将退休年龄提前3年，在这期间要确保退休者的收入水平不会因为退休而下降，这样既能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也能促进年轻人的就业。这种提前退休的机制能够让老龄员工自愿、优雅地退休，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以及那些忍着身体和精神的疲惫而坚持工作的老年人会非常欢迎这种机制，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则由年轻人去填补。同时，雇主也不必更改现有的规章制度，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年轻人取代离职的老年员工。

因此，通过社保体系促进就业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体制架构。众所周知，美国现有的体制能够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高效的运作。此外，这种做法还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在确定一个人的资格问题时，标准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人在某个有资格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特定时间之后，便有资格在之后的日子里获得保险金。因为国籍或法定住所的考量会对收入保障计划构成障碍，所以，在这里不考虑这两个因素。此外，社保体系明确要求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必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受益于收入保障计划，因此，不会鼓励坐吃空饷的行为。第二个优势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去保障退休人员、退休人员家属、残疾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收入时，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老年人和残疾人需要得到他人的照顾和护理，年轻人需要得到他人的指导。所有这些人只要把钱花到自己身上，就能促进就业率的提升。因此，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确保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非但不会拖累整个经济，相反，还能够以高效的、分散的、小政府的方式确保所有人都能赚到自己所需的收入。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工作的人能挣到什么。联邦最低工资的真正价值在1970年达到了峰值。从那之后，美国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就把调整最低工资的事情抛到了脑后。长期以来，最低工资标

准停滞不前，实际价值下降。偶尔也会有所提高，数百万工人因此受益，尤其是低工资地区的女性。之后，最低工资标准又遭到了长期的忽视，而且实际价值也越来越低。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人发现越来越有必要让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去从事一些低工资的工作，以便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低薪工作都被美国人抛弃了，雇主不得不招一些劳动熟练程度较低的移民去做这些工作，尽管这是非法用工，也阻挡不了他们。第三个结果就是申报劳动所得税抵扣的人数越来越多，用纳税人的钱来弥补自己的收入，而雇主承受的涨薪压力就小了很多，不然就会面临沉重的压力去给员工涨薪。因此，联邦政府长期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无异于在用纳税人的钱去纵容企业主掠夺式的用工行为，在美国南部更是如此。[注]

这些病态现象最终都会促使联邦最低工资的大幅提升。由此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工薪家庭（主要集中在低工资地区）的收入水平会有所提升，并趋于稳定。同时，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将增加，但在很多情况下，会通过一个更强大的客户基础弥补这部分新增开支。一些年轻的工人在求职过程中会发现自己没有竞争力，但如果他们的家庭收入提高，他们就会发现重返学校读书通常比较有利。雇主寻找非法劳工的动力会随之有所减弱，因为最低工资适用于非法劳工，也适用于其他人，将最低工资支付给非法劳工，还不如支付给合法劳工。随着非法劳工现象得到遏制，边境执法力度就可以适当削减一些。工会成员能够得到的好处就少了许多，雇主们也就不必像从前那样对工会抱有强烈的抵制情绪了。

在当前这个世界上，经济低速增长，数字技术的成本日益低廉，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私营部门的商业投资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低，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一个大趋势。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你需要的投资就会减少，以便确保自己的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还要扩大投资规模，那么只会催生繁荣—萧条周期，导致广泛性、普遍性的亏损。因此，此

时此刻，政府应该推动降低资本收入，增加劳动收入。这一点与过去30年间的再分配政策恰恰相反。

除了提高最低工资和完善社保体系之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目前，美国人的税务负担十分沉重，尤其是工资税和销售税（在欧洲，还有增值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当前人们劳动和工作的积极性，阻碍了就业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活动，或更准确地说，固定资本比率较低的生产与服务会反复交付，而且每一次交付都要交税，而企业所需的机械（汽车、家用电器、计算机或商业设备）只有在购买时才需要交税，之后这些机械为企业提供服务时就不用重复交税了。虽然缓解这种扭曲现象不会彻底终结技术变革与资本投资在节省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但会放缓机械取代劳动力的步伐，因此会增加服务业的工作岗位。关于这一点，乔治主义(注)经济学家梅森·加夫尼（Mason Gaffney）的著作很有启发意义，我与梅森以及经济学家、博客作者波利·克利夫兰（Polly Cleveland）的通信为我提供了很多启发，我非常感激。

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降低劳动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工资税和销售税的税率。那么，政府应该对谁增税呢？从理论上来讲，正确的做法是增加“经济租金”的税务负担，即人们依靠稀有资源所有权（尤其是土地、矿产与能源的所有权）、专利权、版权、创新成果所有权获得的收益应该多交一些税。但对创新成果增税具有负面意义，会削弱人们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政府不妨对创新成果带来的收入维持低税率，给予减免优惠，等到创新者去世后，再通过提高遗产税和赠予税的方式提高课税幅度。有创造性的人才或天才通过创新成果积累财富本身没有什么错，这是对其创新才能的鼓励，但没有理由允许这些财富在创新者去世之后再完整无缺地遗传给后代，不然就会形成“王朝式财富”。与创新相比，依靠控制城市土地、煤炭资源或石油资源积累的财富就属于另外一码事了。这些财富形成过程通常不会为整个社会带来任何福利，如果这些资源的控制者在有生之年逃脱了高税收，那么

在他们去世时，对其课以重税就更加合理、更加充分了。相似地，遗产税是防范通过暴力或欺诈手段获取财富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具有合理性。

事实证明，遗产税和赠予税已经在美国成功实施了一个世纪。这两种税的功能不是为了给政府提供资金。其实，遗产税和赠予税充实国库的作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作用是，这两种税能够降低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增加支出，从而促进就业。如果受赠的对象是大学、非营利性医院、博物馆、剧院、研究中心和教堂，那么政府也可以减免这些赠予税，从而引导富人为这些机构捐款。这样一来，就能增强美国富人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成为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但现代欧洲的富人就没有这种机会。考虑到现在的社会需求，可以进一步采取一些有用的措施，利用税收杠杆引导富人致力于慈善事业，比如可以引导他们建立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协助生活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如果这类养老机构能够像大学那样进行管理和运作，并且能够像博物馆和图书馆那样吸引著名的捐助者，那么不仅能够为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做出重大贡献，还能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

上述一系列政策建议的本质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机构、税收、工资、信贷、社保和慈善等方面着手，构建一个合理的制度环境，让工作的人获得稳定的、体面的收入，同时为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比如，由于年龄、残疾或学生身份而无法参加工作的人）提供适度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要构建这样一种制度环境，其内在原因在于，一套着力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战略体系有利于促进资本投资，促进资本和能源取代劳动力，制造一种赢家通吃的环境，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就不能简单地采取相同的战略体系，不然经济就会爆发不稳定因素，而最终走向失败。在经济增速缓慢的大环境下，正确的制度模式应该着力推动社会实现质的变化：应该以分散的经济单位为基础，这类单位固定成本较低，对劳动力的使用较多，而相比之

下，对机械和资源使用较少，预期回报率相对较低，但劳动力标准和社会保障能够为人们提供有力的支撑。一个高收入的、繁荣的社会重视教育、医疗保健、照顾老年人、艺术和体育等，仍然是我们在低速增长的环境下应该努力促进的事业，关键是要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我们还要解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

1. 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译者注

2. 弗里德曼的税收理论提出的一个设想是实行“负所得税”。所谓“负所得税”，实际上就是政府发给的补助金，它是指政府规定某种收入保障数额，再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给予适当补助。为了不把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补助金应该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给，运用税收手段来支付。——译者注

3. 劳动所得税扣抵制是美国一种租税扣抵制度，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夫妇进行补贴，特别是家有儿童的夫妻，1975年首次实施。当劳动所得低于一定金额时，部分赋税可以抵免。——译者注

4. 乔治主义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由亨利·乔治提出，主要观点是每个人拥有他们所创造的东西，但是所有由自然而来的东西，尤其是土地，都属于全人类共有。——译者注

后记
如果荷马归来

2009年夏天，我参加了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赞助、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的一个山间小宾馆（靠近佩鲁贾小镇）召开的研讨会。我是出席研讨会的唯一的美国人，其他十几个人是来自俄罗斯科学院和莫斯科经济学院的朋友和同行。当轮到我发言时，我对戈尔巴乔夫——一个已经消亡的国家的最后一个总统直接说道：

> 总统先生，如果古希腊诗人荷马穿越到现在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将会说，俄罗斯的数学家们于1991年被迫离开俄罗斯前往美国的华尔街，他们带去了量化风险管理模式这个礼物。华尔街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他们开始投入工作，结果20年后的今天，他们完全毁掉了那个地方。荷马会说，这是自特洛伊战争以来最大的特洛伊木马。

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我一直遭受着更糟糕的指责。”

20年前，苏联的解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事件。大多数人早就认定这是一种必然，而忘记了（如果他们曾经知道）这个制度给他们灌输了多少恐惧，或者把苏联解体作为里根主义——通过军备竞赛，以某种方式造成了苏联银行的破产——的伟大成功留在记忆里。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解体的教训都是令西方欣慰的。在美国人心目中，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但这只是一个给儿童讲的童话。事实上，在鼎盛时期，苏联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地位不亚于现在的欧洲，在某些方面与美国非常相

似。按照纳粹战争经济研究领域的卓越学者亚当·图兹（Adam Tooze）的说法，苏联堪称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发展型的专制国家”。它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工业腹地，并于1941年将德国军队从本国国土击败和驱逐了出去。20世纪80年代，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镍、小麦、棉花和天然气生产国，城市化水平非常高。苏联解体后的一些继承国目前仍然拥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此外，苏联还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和航天计划，拥有庞大的核工业和核武库，并建立了众多秘密的城市为这些工业提供配套支撑服务，更不用提火车、地铁、医疗保健、大学和高雅文化了。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常见的嘲讽说苏联是“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非洲穷国）”，但实际上它不是。

如果把苏联经济看作一个物理系统，那么，苏联经济就像其他任何经济体系一样：从自然界汲取资源，转变成有用的产品，其间伴随着大量无用的产品和浪费现象。在实际层面，苏联经济被工程师和数学家设计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实行计划管理。它的目的是利用规模效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苏联的工厂规模巨大，产量很高。例如，它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钢铁工厂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设在印第安纳州加里的美国钢铁公司是其升级版本，是基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钢铁厂设计的。苏联的经济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它的设计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工作，但其激励机制非常弱，工人其实并没有真正集中精力工作，古拉格式劳改营在20世纪50—60年代废除之后更是如此。苏联是一个福利国家，通过国有企业运行，企业有附属幼儿园、度假村和诊所。

苏联经济体系的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很少有冗余的地方，几乎没有内部竞争，所以它引入新技术的能力较弱，并且容易在运输和销售环节出现“故障”。这对于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而言还不会造成严重问题，但对于食品等容易腐烂的产品而言，却会造成严重问题。新鲜农产品通常会在从农场到市场的运输途中腐烂掉，这就是当年俄罗斯市民无比珍视乡村别墅的原因之一。曾经在苏联解体后长期担任莫斯

科市长的尤里·卢日科夫（Yury Luzhkov）曾经大力改革苏联时期那种灾难性的食品库存系统，为自己博得了很大的声誉。

苏联经济体系的一个特点可以总结为固定成本高，在运作过程中，必须支付很高的经常费用。要生产点什么东西，甚至在不生产任何东西的时候，固定成本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产品是否到达消费者手上，无论消费者是否需要这些产品，都必须支付固定成本。

这也不能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缺陷，而是设计环节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固定成本高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是发达经济体系的一个标志。固定成本高的投资可以让你更加高效地利用规模与技术，利用不同环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亚当·斯密曾经写道：“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固定成本高的经济体系的效率，在刚刚投入运作之际尤其高，因为它的设计过程考虑到了资源成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这个体系利用的资源都是价格最低的（比如，把发电厂建在煤田附近，把钢铁厂建在铁矿附近，等等）。此外，这种经济体系在设计过程中还会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流程（比如，20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发展汽车工业，从意大利引进了汽车技术）。

如果这个经济体系的开工率高，那么固定成本就会被分散在很多单位的产出上，这样一来，单位成本就变低了。因此，这个体系能够以较低的生产成本实现较高的价值，尤其是刚刚完成设计之际，因为工程技术是最新的，所有工厂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都考虑到了如何充分利用资源与市场。就这样，苏联新建的工业体系很快获取了前沿技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工业能够成功，并且在部分国土遭到希特勒的入侵之际，能够像美国和英国那样采取成功的军事反击措施。“二战”后，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最近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经济体系资源成本偏低的优势得以延续，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得到大规模开发，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出口到西欧国家。这导致美国战略家开始担心随着斯大林时期的残酷景象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苏联会对西欧国家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导致西欧国家如同向日葵追随太阳那样倒向苏联。这就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对苏联采取了对抗姿态，比如，在巡航导弹、天然气管道和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内部的强硬派都占据了上风。当时，来自苏联的经济威胁是真真切切的，因为苏联的确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但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某些特定的产业决策产生的优势往往会削弱，原因很简单：固有的经济体系是根据最初的经济环境设计的，而这样的设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但在新环境下，其他人采用更新的技术或采用某种新发现的资源之后，就能降低成本。当浪费问题与低效率问题放大了成本劣势之后，按照僵化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就会变得脆弱。开采的能源带来的收益开始下降，可用的盈余会越来越少。最终，生产成本会吃掉现有的全部盈余。在最后阶段，这种经济体系只能在亏本的基础上维持运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这种体系就出现了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负附加值。”

当一个国家开始在亏损状态下运作时，会做什么呢？如同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公司那样，这个国家也会努力挺住，并抱着最美好的希望。暂时来讲，亏损可以通过延迟支付的方式转嫁给其他有关方面。这可以通过大举外债的方式实现，但这种外债得到偿还的前提是经济形势好转。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可能会通过所谓的“抑制型通货膨胀”[注]转嫁亏损。这两种权宜之计，苏联都采取过，但效果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已，之后便再也不起作用了。

崩溃往往发生在一瞬间。以苏联为例。苏联之所以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偿还银行债务而逐步放开了向国外市场出口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的闸门。这就损害了国内生产，从而导致购

买进口商品的压力变得无可抗拒。一旦边境贸易开放，谁都不想再购买国货（纺织品、电器，甚至食品）。于是，苏联制造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很快就趋于崩溃，与东欧剧变之际东欧国家的内需崩溃如出一辙。在新的私营经济规则下，不能售出的商品就不会被制造。生产崩溃了，就业和收入也随之崩溃。

影响更为深刻的一个因素是，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之后，多出了很多国际边界，从而妨碍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业合作。产业网络变得更为脆弱、不稳定和低效，有的国家的工业甚至完全停滞了。（南斯拉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私有化改革催生了一系列所有权结构各异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价格与成本结构本质上是很随意的，缺乏计划性。在一个供应链中，如果有一个企业的盈利状况不足以维持生存，那么整个产业链很可能就会崩溃。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彻底崩溃，俄罗斯工业产值下降了40%左右，工厂关闭，工人没有工资，医疗和教育系统停止运作，住房与基础设施等领域基本投资也戛然而止。生活水平下降，死亡人数——尤其是暴力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男性的平均寿命从72岁左右下降到58岁。凡是能侵占国有资本的人，都会去侵占。政府无法征税，因此开始对内和对外发行债务，结果到了1998年，俄罗斯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当时，卢布崩盘，旧秩序被完全打破。一个新社会诞生了，这个新社会更加贫穷，更加不平等，依赖于有效开发剩余的自然资源。这就是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加盟国出现的状况。

如果这个版本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可能会问：美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吗？欧洲呢？日本呢？

美国也是一个固定成本很高的发达社会。我们为政府、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和各类公共服务（包括维护治安与环境保护等）付出了高昂的固定成本。无论银行是否对我们实际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做出任何贡献，我们都在为银行业付出高昂的固定成本。

美国国内曾经拥有丰富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我们根据资源优势决定工厂的区位（例如集中在五大湖附近），以更加高效地利用附近的资源。但选择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些年，我们从海底、墨西哥湾或阿拉斯加获取石油，或者付出高昂成本，利用水力压裂技术从坚硬的岩石中获取石油。

今天，如同苏联一样，美国也会从国外购买石油，比如，从加拿大进口石油（加拿大为了从油砂中提取石油，付出了很高的成本）。虽然我们肯定要为进口石油或者进口其他一切商品支付美元，但这种美元是以国库券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我们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出这些债券。从短期来看，债权国持有这些债券，是对美国未来生产力水平的一种信任，只要这些债权国不提出偿还要求，这种模式就能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是否愿意继续接受美国债券决定了这种模式的持续时间。如果美国对世界资源的胃口依然不减，而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债券的意愿却消失或者淡化，那么美国就无法逃避实际成本持续上升的影响。我们应对这种意外结局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提前思考和提前计划的能力。这个职能不依赖于一个规划机构，而是依赖于国会、白宫和华尔街。这些都无须多言。计划经济可能存在深度缺陷，但用政治手腕和金融逃离去替代计划经济，未必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

的确，美国比苏联更有效率，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比苏联好多少呢？尤其是近些年，美国的生产效率究竟如何？美国好在有商业竞争，因此，经济体系肯定会出现一定的过剩现象，而苏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美国许多最先进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微芯片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等，都是处在近乎垄断的状态。如果这些垄断企业失败了（比如没有研发出安全飞行的飞机），那么很快就会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没错，我们的确推动过技术变革，也享受了技术变革带来的好处，最近一次变革是通信技术变革。这些变革降低了商业成本。但这些收益足够抵消资源成本的上涨吗？是否会挤压利润空间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的国民经济距离亏损状态还有多远呢？那么苏联的遭遇很可能变成美国明天的遭遇。事实上，如果美国不是全球金融中心，那么苏联遭遇的事情现在可能已经发生了，或者很快就会发生。除了金融地位之外，美国与其他大型的工业国没多少区别，都面临着技术过时、企业僵化和外部成本上升的问题。

事实上，做这种分析是很简单的。早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就完整解释过这种分析所根植的基本理念。阿尔弗雷德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是一本适用范围非常广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的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报酬递增、垄断企业、信心和成本不确定性对于投资的影响，等等。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当著名经济学家、政策顾问和政治家们在谈论解决问题时，往往不会提到这些理念。

这是一个谜，可能是一个致命的谜。弄明白我们正在遭遇什么以及将要遭遇什么是改变不测事件的第一步，即便未来的不测事件无法改变，也可以做出一定的应对。这才是经济学界应该做的事情。可悲的是，现实却并非如此。当代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和爱莲娜·克雷娃（Earlene Craver）曾经就俄罗斯经济崩溃写过一些见解非常深刻的文章。他们这些总结性的文章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世界银行准备的，但由于世界银行的原因，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到2001年，他们才在其他资助下公开发表。其中一篇论文的开篇之语即便现在读起来也令人振聋发聩：

> 在20世纪末，俄罗斯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年前苏联行将崩溃之际的一半左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就职演说中曾表示，俄

罗斯人口一直以每年70万人的速度减少。很多报道都提到了俄罗斯新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与很多俄罗斯穷人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生动地描绘了俄罗斯教育、卫生保健和社保体系日趋恶化的图景……俄罗斯改革者们、他们的外国顾问以及西方观察家在1990年前似乎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即将遭遇的这场萧条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当时的文章普遍传递信心，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当然，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得到了完整的理解。因此，应该掌握好一般性的经济原则，才能理性认识到经济发展轨道……

然而，良好的经济原则并不足以预见到苏联的解体。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良好的经济原则并没有帮助我们预见到全球金融危机。也许问题在于经济原则，或者在于我们对经济原则的理解方式。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

1. 抑制性通货膨胀，又称隐蔽性通货膨胀，是指不以价格总水平公开上涨，而以物资供给短缺、黑市盛行、配售面扩大、黑市价格与国家控制价格差额扩大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通货膨胀。当一国政府以计划统制、资金控制、物资配给、票证配售、价格管制等经济措施压制价格波动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译者注